

目 录

文 献

- 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瞿秋白(1)
湘鄂边风暴 贺 龙(11)

回 忆 录

- 关于朝鲜开城停战谈判的回忆 解 方(24)
回忆投身西藏和平解放的历程 乐于泓(40)
晋察冀边区党组织在战斗中成
长壮大 刘澜涛(82)

人 物 介 绍

-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孔从洲(100)
何孟雄反对立三、王明路线的斗争 张祖柱(150)

XXXXXXXXXXXX
X 专题资料 X
XXXXXXXXXXXX

西藏和平解放始末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 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63)

新疆和平解放始末 朱培民(188)

湖西“肃托事件”

..... 中共济宁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212)

XXXXXXXXXXXX
X 中共组织史资料 X
XXXXXXXXXXXX

1927年至1937年间的中共陕西省委组织概况

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
.....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248)
陕西省档案馆

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瞿 秋 白

编者按：瞿秋白《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的讲演，原刊于1925年12月20日出版的《中山主义》周刊第1期（现藏上海档案馆），由秦邦宪、崔小立记录整理。据朱时雨同志考证，这篇讲演系瞿秋白应上海大学中山主义研究会之邀而作，《中山主义》周刊即为该会会刊。秦邦宪、崔小立当时均为上海大学学生。讲演的时间为1925年12月8日。这篇讲演，在历年出版的有关瞿秋白的著译目录、文选、年谱、传记、史略等著作中均未收录和提及，是一篇新发现的珍贵史料。杨之华在《一个共产党人——瞿秋白》一文中说：“秋白不仅用文字进行繁重的理论斗争，而且进行口头的共产党的政策和共产主义的宣传，他作过好多次有力的生动的激动和说服人的讲演……”可惜这些讲演多数未能记录和保存下来，因此这篇讲演的发现更有其特别意义。《上海党史资料通

* 文中错别字后面用（ ）注上正字；漏字用〈 〉补上；次序颠倒或重复的字已作订正。

讯》1989年第1期刊发了这篇讲演，并作了文字订正。本刊现予转载。

今天我讲的这个“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的题目，是现在我们大家所最注意的问题，也是全国人都注意的问题。而且这不单是学理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问题。有人说：国民革命是要各阶级联合的，这是不是事实。现在我们为什么发生这个问题，为什么主张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有赞成阶级斗争与反对阶级斗争的两派，这就不单是学理的问题，〈而〉是实际斗争的问题了。

在革命策源地的广东，这个问题尤其很明白的摆在我们面前：广东二三十万的工人，农民，与帝国主义者利害冲突，国民政府领导他们与帝国主义者奋斗。我们在（从）商团事体中，可以看出来，（，）因为商团所要推翻的不仅是国民政府，不仅是孙中山先生，而是要推倒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所谓商团，就是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陈廉伯与英国帝国主义者的香港政府互相勾结的一个攻打国民政府的工具。其次我们从五卅事件以来，可以明白的看出来：当我们一班学生工人在南京路上大流血以后，总商会不肯立即罢市，好容易磕头礼拜的求到罢市了〈，〉又不肯加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等到六国委员到上海的时候，马上把工商学联合会的条件修造了。这几点都是明白给帝国主义者知道：我们中国的高等华人，还很愿意受租界上领事的裁判，受武装海陆军的保护，更使帝国主义者屠杀不止，横行无忌；甚至如入无人之径〔境〕，开什么国际法庭重要的恶例。照以上的事实看来，我们试问国民革命，

是不是各阶级联合的？从总商会宣布开市，一直到总工会被封以后，学生会为查货的事，不知同他们闹了好久。总商会所豢养的保卫团，天天在压迫工人运动，禁止工人的集会。这是不是国民革命中的阶级争斗？有人说国民革命中是不应有阶级争斗的，那末我们更要问，譬如前天在闸北开市民反段大会，保卫队〔团〕以马队冲散游行队伍，甚至发〔开〕枪伤人，〔。〕从前外国巡捕打死我们的工人学生，我们就罢课、罢工、罢市反抗，现在保卫团来打我们了，难道我们可不反对，还要进一步说，这是对的吗？

国民革命是什么？我们先要问我们主张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是什么。我们国民党有狠〔很〕鲜明的三个目标：1、要把全中国〔从〕被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2、要把〔从〕横暴的军阀官僚的手里夺到代表人民真正利益的政权；3、便〔使〕占全国十分之八以上的农工群众得到生活的改良，〔。〕这三点都是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说得狠〔很〕明白的。这三个目标，就是我们总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一、民族主义 我们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并不是象国家主义把〔的〕封建时代落伍的幻想所可完成的，并不是象法兰西的革命就是第三阶级把他们的贵族僧侣赶跑就算了。我们要知道现在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的时代，中国的一切经济政治的状况没有不受国际的影响，所以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不期然而然的要反对世界上一切的资产阶级。孙中山先生所说：现在世界经济状况中所

发生的战争，不是人种间的战争，不是黄种人和白种人或白种人和黑种人的战争：〔；〕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强〔理〕与强权的战争，所以我们国民党虽然主张收回海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等，表面上看来是仅仅我们中国的问题，其实呢，我们如果达到这个目的，这个胜利就是我们全国民众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胜利。因为帝国主义者决不能以其失却市场或其他剥夺殖民地之权利，而不根本动摇。譬如英国若失去香港及中国之市场，还能安然立足吗？还有一点，我们国民党的民族问题，是要国内各种小民族一律平等，自由，联合成中华民国，所以我们国民革命，是站在全民众的观点上去反抗外国资本主义，而国民革命第一个目标——民族主义——就是代表全中国的民众与外国资本主义去实行阶级争斗。

二、民权主义 我们国民党是反对军阀政治，是要用全国人民的力量，造成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民主政治：〔；〕但这并不是党纲上这么写了一条就算了的事，一定要从实际上争斗的。这里我们就不能不想一想，到底是我们同那〔哪〕个去争〔斗〕。因为军阀不肯给我们政权，所以我们要反对军阀，试问这是不是阶级争斗？当然是的，因为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商团都一样的要摧残我们爱国运动。若果说我们要抛弃争斗，那就是抛弃民权。譬如以工会法的事体来说：广州已争到了可以获得工人自己的利益，而上海汉口天津等处还在争斗之中。一般大资本家，工厂主，大地主压迫工农阶级，我们就非去实行阶级争斗不可。若说这是共产党过激派的话，那我们就要问广州国

民党政府之下，究竟能不能允许工会的存在？许不许罢工的自由？若允许的，是不是允许阶级争斗？若是不允许的，岂不是违反民权？所以国民革命第二个目标也就是阶级争斗。

三、民生主义 民生主义的二大纲要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更明显更纯粹是一个阶级争斗了。孙中山先生说：资本主义之下，一定有阶级争斗，这争斗若要消灭，除非实行新共产主义。虽然孙先生也曾说中国患在贫而不患不均，但这是一方面的话，我们要消灭阶级争斗，就要实现民生主义。若说中国没有不均，孙中山又何必提倡平均呢？我们深一层说：国民党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是代表那〔哪〕一阶级利益的？当然是代表农工阶级的。那般资本家大地主平均他们的地权，节制他们的资本，他们肯不肯？他们一定要反对国民党，那就要发生阶级争斗。在这方面看来，国民党只有反对资本家大地主及一切特殊阶级，只有替农工阶级去实行阶级争斗，才能实行民生主义。所以国民革命第三个目标，本身就是阶级争斗。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国民革命是要站在阶级的地位上去实行阶级争斗的，三民主义就是阶级争斗三方面的表现。我们再举一二事证明就够了。譬如辛亥革命是反抗满清贵族的革命。但这个革命是失败了。他〔它〕何以失败呢？就是没有推倒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军阀士大夫阶级。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那时没有无产阶级参加。当时虽有无产阶级存在，〈但〉因为他们没有组织，没有党，农民也不知为自身利益而革命，所以在政治上，我们可以说没有

无产阶级。反〔及〕至五四运动，因为这几年来中国稍有工业的发展，所以也就有工人运动的发生，而国民革命就有新的发展。自从二七事〔件〕以至今年五卅事〔件〕。〔，〕中间经过广州商团之役，沙面的罢工，上海，汉口，青岛等处的罢工运动，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这种表现是不是破坏国民革命？绝对不是的。譬如青岛的罢工，引起上海的五卅事〔件〕，有了五卅事〔件〕，国民革命的力量，就有充分的表现。因为五卅的要求条件中，一方面要取消领事裁判权，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等，是反抗帝国主义，也是全中国人民的阶级斗争；一方面要求工人有集会罢工之自由，这当然是阶级斗争。〔，〕更是国民革命，因为没有工会，工人就不能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斗争。

近来工人都明了自己所处地位，农工也有好几处同大地主斗争。这许多阶级斗争在辛亥革命时〔是〕没有的，现在有了。在种种阶级斗争中明白了他们自己与帝国主义者买办阶级军阀官僚大地主相对的利害关系，使国民革命中工农阶级成为重要基础。所以中国革命党真正要实现三民主义，非领导他们去实行阶级斗争不可，〔，〕在实际上看起来：阶级斗争不但不破坏国民革命，而且使国民革命发展。在理论上我们如果反对阶级斗争，就无异抛弃三民主义，而又反〔对〕国民革命，〔，〕除非是以国民革命作口头禅的政客才会说不要阶级斗争。

我们国民党中为什么会分出两种现象？我们先要看帝国主义者侵略我们中国的方法，用不平等条约束缚我们，

用外交手段召集什么华盛顿会议，关税会议。但是这些方法大〔太〕明显了，还有很巧妙的利用中国军阀供给军火，或利用研究系及国家主义者，天天的反对赤化的论调。但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势力依旧高涨，显见得这些方法又无用了。现在就有一种最新最利〔厉〕害的方法，就是使国民党内部分裂，有反对阶级争斗反对共产的争执，这么一来，就使左派革命的力量分散了，要拿一部分力量来对付右派反动的行为。这是五卅运动的结果，也是国民革命的结果，这没有别的方法可解释的，因为这也是阶级争斗。

我们国民党是主张联合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及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者用什么方法可以打破这联合战线呢？最好就是〈反对〉阶级争斗的论调。因为这一来就可反对联俄，反对一切外国人，不管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使中国的国民革命，减少力量而不至于完全。虽然党中有一部分右派分子不曾有这样明白的表示，提出什么骗人的民族国际，而一样反对共产党，尤其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为阶级争斗是妨碍国民革命的。但我们试看广州国民政府，允许工人结社罢工之自由，人民入党的自由，共产党可以存在，因革命的手段相同，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因阶级争斗而国民革命有长足的进步，帝国主义自然很嫌恶了。而在上海就不然了，帝国主义者命令戒严司令部把工会一概查封，雇潘冬林这些人去做工人御用的领袖。这个热烈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就狠〔很〕容易的解决了。我们在这一个观点上来着〔看〕，反对阶级争斗，反

对共产党，除了帝国主义者和段祺瑞，张作霖以外，还是〔有〕谁得着利益呢？于国民更有什么好处呢？并且这些右派所谓反对阶级争斗，不但理论上站在帝国主义的观点上，而事实上完全帮助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他们居然在北京开了他们所谓中央执行委员会，我们且不就纪律上说：如中央执行委员会须由秘书处召集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须在国民政府所在地举行等等；且在政治的意义上说，在开会以前，林森〔、〕邹鲁电汪精卫谓广州执行委员，违反孙先生的联北主义，而他们现在居然联络段祺瑞在北京开会，这是不是实行中山主义？这不是表示反革命是什么？后来他们通电开除共产党〔员〕党籍，国民党如何可以越权开除共产党员党籍？又以中央执行委员开除中央执行委员岂非笑话？甚至开除汪精卫党籍，且不准在国民政府行政范围内，行施〔使〕职权。我们试问汪精卫那〔哪〕一点违背党纲？那〔哪〕一点对不起广东人民？他们都不曾说出。我敢说广州的工农群众没有一个要汪精卫走；要汪精卫走的是谁呢？是帝国主义者，段祺瑞，张作霖。照他们这种举动，事实上帮助了帝国主义者向中国的工农阶级进攻。他们谁〔虽〕然说反对阶级争斗，不知他们自身在实行阶级争斗，〔。〕

现在国民党的发展与国民革命之伸张并进。我们再试看五卅事件之阶级争斗中，国民党员在广州增加了二三十万的农工的党员。戴季陶说共产党破坏国民党，阶级争斗打破国民革命，岂非笑话。所以我们可以说真正要三民主义的实现，只存〔有〕在实行阶级争斗，领导全中国被压

迫的民众，与帝国主义者奋斗；（民族主义）在〔从〕军阀官僚及特殊阶级的手里，争到代表人民真正利益的政权；（民权主义）为农工阶级保障生活的安全与自由，与大资本家工厂主大地主去领导〔进行〕阶级争斗（民生主义）。

有组织的工农群众完全为国民革命主要的力量。在五卅事件中，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我们要把主义变成事实。如果没有这主要的力量，国民革命永不能发展而至完成。所以所〔我〕们要做真正中山主义的信徒，革命的国民党员，除了担负上述三种责任以外，又要加了一种攻击右派反动分子的责任。因为右派这种反对阶级争斗，开除汪精卫，开除共产党等政策，一件件都要使国民党失了工农群众的信仰。我们只简单的说，工农群众是否需要阶级争斗，改善他们生活的状况；〔。〕现在的阶级争斗，还只是加资减租等运动，国民党若反对阶级争斗，自然都象戴季陶所说去诱发资本家地主的仁爱，结果工农群众就是全失了同情。若以反对阶级争斗开除共产党，那共产党人一出外去宣传国民党反对阶级争斗的主张，抹杀农工的利益，国民党那〔哪〕里还有工农阶级的存在？国民党还有什么力量？所以为国民革命计，尤其为国民党前途计，不得不对右派反动分子宣战。我们更应该认定这也是国民党工作之一部〔份〕，是国民革命之第一步。

我们分析他们的政策，已完全表现了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他们的理论，尽管怎样高妙，说什么哲学基础；孙中山先生是继孔子之道统的；因为仁爱，所以不

主张阶级争斗。但我们试问孙先生革命，是不是争斗？创设同盟会，是不是要争斗？再问什么人可以施仁爱？对资本家，地主，军阀可以施仁爱吗？〔对〕压迫者可以施仁爱吗？在这点，右派居然把革命的中山主义与贤人政治相混淆，把中山先生〈当〉做封建时代的孔徒，使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变成劝圣主行仁政的保皇党。何等荒谬！中山先生确有种种道德，可是他是一个革命的领袖，绝不是希望他去行仁政。譬如上海小沙渡或杨树浦各工厂罢工的时候，一方面是资本家，一方面是工人，国民党如果反对阶级争斗，应该站在那〔哪〕一边呢？工人一边吗？赞成阶级争斗了；不然，那就被资本家利用去欺骗工人做了一个工贼。所以我们如果站在革命的地位而讲仁爱便是不通。

总之，我们要研究三民主义，要实现三民主义，就应当去实行阶级争斗；使全国的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国民革命才可以成功。对于党中的右派，我们就不能不取革命的行动，施以严厉的攻击。因为国民革命而反对阶级争斗，自己不但不是国民党员，而且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我们希望每个中山主义者，真正的国民党党员，去实行阶级争斗而发展国民革命！

湘鄂边风暴*

贺 龙

在石首焦山河会议以后，我们于1928年2月底到湘鄂边去。途经连云溪、毛草街、张家湾等地，那里都住满了敌人。我们绕过他们，到了澧县境内，在一个村子里搞饭吃，留一个人在外面放哨。来了二三十个敌人抓鸡，我以为是来抓我们的，跑出去一看，敌人一个排长立正向我敬礼，原来他是我以前的一个部下。我问他干什么，他双脚立正，规规矩矩地回答说：“报告镇守使（大革命之前，我当过湖南澧州镇守使），我们来搞点东西。”我说：“我就住在这里，你们给我放哨，要保证我的安全。”这个排长恭恭敬敬地执行了。我们在他们的警戒之下，安安稳稳地吃好了饭，睡足了觉。到了湖南石门后，住在张海涛家里。本来准备会合石门党组织，此时才知道，石门党组织已经分裂了，一部分坚定分子继续革命，一部分动摇分子投敌叛变了。石门军事部长罗效之带部队投降了国民党，后来搞了1000多人，同我们斗争了10多年，最后在湖南常德

* 本文系由杨秀山同志于1978年11月根据贺龙生前谈话整理而成。

被国民党搞掉了，这是叛徒的下场。剩下的少数武装部队由曾庆轩同志带领，在石门南乡坚持斗争。我们由石门过东洋关，到了兹利的江垩，次日又到了竹叶坪。我们住在钟镇吾家，钟劝我回桑植时不要过空壳树，因为陈策勋住在那里，并且派了队伍拦截。我们便绕路经麦里坪回我的家乡——洪家关。在我到洪家关之前，我家里的亲戚、朋友和旧部下王炳南、刘玉阶、李青云、钟镇吾、谷志龙及我姐姐贺英等几十股武装正在打仗，自相火拚。我来后，他们还彼此不信任，实弹持枪。我说：“你们退下子弹，再不许打，都跟我干革命！”周逸群同志也向他们作宣传。他们接受了我们的意见，愿意跟我们干。这样，共3000余人，打起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号。接着进桑植城，成立桑植县委，以李良耀为书记，打土豪，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成立苏维埃政权。

当时我们是有方针的：第一成立县委，发展组织；第二整编队伍。这两样都抓得很紧。此时，我的旧友王文轩来信要我去湖北鹤峰县走马坪会朱华生，搞了几千元钱和粮食。周逸群、贺锦斋留在桑植县。结果敌四十三军的龙毓仁旅来攻，在梨树垩、洪家关、苦竹坪等地打了3仗。我军由于刚刚集中，未来得及整理，所以没有打好，失败了。我和周逸群同志被敌人隔开，失去了联系。周逸群同志被迫转往石首、沔阳、江陵等地农村发动群众，搞武装斗争。他后来就在那里工作了，一直搞得很好。我从走马坪回来，会到贺锦斋、张一鸣、李良耀同志，经过商量，即往桑植、鹤峰边界的红土坪一带，收集失散的部队，集

中了三四百人，重新整理了队伍。当时部队上有些同志还骄傲自满，又受家族一条线的牵扯，很不利于我们武装斗争的坚持和发展。我对他们说：“要干就好好干，不干就走！”经过一番艰苦的工作，才挽救了局面。

桑植第一次失败，封建思想是主要原因。家族、亲戚、旧部下都是我个人号召来的，部队没有党的组织，不明白党的政策，不知道为谁打仗，很多人认为是给我一个人干的，想跟我升官发财。部队里若有党的组织和教育，有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就打不垮了。我们领导干部虽是共产党员，也代表了党，但很缺乏经验，部队中又缺乏骨干，因此经不起风波。

经过整顿，队伍就在桑植鹤峰边界一带活动。6月间敌龙毓仁部从桑植西撤，我带领部队在小埠头截住他的后卫部队，击毙敌参谋长张策，歼敌1个连，缴获了不少枪枝和辎重。按当时的环境，本来可以重新夺取桑植县城的，但因部队分散，不能迅速集中，所以没有占领县城。但打了这一个胜仗，对部队鼓舞很大，一些原来失散的部队又陆续回来了，还有我的旧部下文南浦等带着队伍来参加红军。后来贺桂如、贺佩卿也带着队伍来了，使工农革命军又扩大到1500余人，然后队伍就到达桑植县内继续休整。此时，湘西特委派陈协平同志带来了湖南省委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在红军中成立党的湘西前敌委员会，以管辖红军和红军所在地区地方党的工作。前委由我、陈协平、李良耀、贺锦斋、张一鸣等同志组成，我任书记。同时召开了大会，将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我任

军长，黄鳌同志任参谋长，下属第一师约七八百人，由贺锦斋任师长，张一鸣任党代表。此外还有文南浦、贺桂如、贺佩卿等人率领的几个支队、大队，约 700 人。从此我们的武装又出现了新的面貌。

红四军成立时，前委做了决定。我记得内容有：（一）将原有的部队逐步进行彻底的改造，加紧下级干部和士兵的训练工作，同时吸收进步士兵为党的中坚分子；（二）扩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发动广大农民起来斗争；（三）红军滞留在桑植，政治影响太小，待子弹补充稍足时，必须进至石门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同时向常德取包围形势。在上述原则指导下，各级同志都行动起来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士兵党员同志发展到 40 人以上，一般士兵对土地革命的意义也有相当的了解，各种宣传标语布告遍布桑植县的内半县。

党的工作虽然有了起色，但不良倾向仍然存在。红军宣传队张贴的标语和布告，有的同志竟公开撕毁，表示反对，对士兵高呼口号，并发表了许多违反党的政策的意见。一部分军官只愿拉队伍打土豪，捉肥猪，满足于有肉吃，不愿意做艰苦的工作、发动群众搞暴动，个别的甚至蓄意拖抢潜逃。我们对这些错误言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以达到教育的目的。对有的干部作了留党察看、撤销职务的处分，以后这些同志都改正了错误。为了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党的威信，大队以上都设有党代表，和军官一同工作。此时，虽然桑植农民斗争的情绪同湘西各县相比最为高涨，但因家族观念非常浓厚，过去没有一点组织和教

育，受豪绅、土匪的压迫又最厉害，一点不敢反抗，所以不容易被发动起来参加斗争，加上党的组织一点基础也没有，单靠外来的同志对农民宣传很不够，因此，桑植的农民运动竟然没有做好。

7月初，湘西特委通告我们南下牵制敌十四军向湘东红军的进攻，为此我们决定南下到石门西北乡去发动群众搞暴动，拖住敌人。但在红军开动时，有人企图拖枪潜逃，前委为了严申铁的纪律，决定将拖枪潜逃的最坏的首要分子执行枪决。此后官兵才知道军纪是不可违抗的。至8月中旬，红军才进到石门西北乡的中心区域——磨岗隘。

在此之前，石门党的组织曾在南乡组织农民暴动，开展武装斗争，并在湘西特委的领导下，建立了以太浮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但在强大的敌人的围攻下失败了，党的组织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红军到达石门境内，前委即与石门西北委的负责人曾庆轩、谭苏、吴协仲、郭天民等同志开了一个联席会议，决定：（一）以磨岗隘区为石门西北乡暴动的中心，在磨岗隘的四周如泥沙、镇街、子良坪、皂角市、石黄厂、石门垭等处，在最短期间恢复并发展党的组织，同时公开号召农民起来暴动；（二）暴动起来之后，立即在磨岗隘建立苏维埃政府，实行割据西北乡，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农民耕种；（三）同石门南乡的新安、合口等暴动区域联合起来，向石门县取包围形势，进而夺取石门县政权，尔后向桃源、常德发展。但由于西北乡同志的畏惧，群众没有很好地发动起

来，结果只在磨岗隘杀了几个最反动的土豪劣绅和清乡委员，并没收他们的财产，做了几天较大的宣传工作，其余决定没有能够实现。

石门西北乡的暴动既不能实现，于是改变计划，决定以较有农民组织的谍阳区为红军根据地，并消灭澧县大堰垱、王家厂两处的反动武装。8月22日，红军从磨岗隘出发，一昼夜行军180里，到王家厂。因为没有侦察好，加上士兵太疲劳，没有完全消灭大堰垱的反动武装，只组织了王家厂的暴动，发动广大农民起来，在群众大会上表決枪毙了5个反动分子，烧毁了反动税务机关的契约。红军的严明纪律受到一般群众的称赞，这是那次暴动取得较好的一点成绩。

几天后，我们转回谍阳。师部及大队驻新开市，我同前委住曾庆轩同志家里，与师部相距七八里。因为警戒疏忽，部队又万分疲劳，加上侦察员出去没有回来，结果次日早晨敌十四军教导师李云杰部来袭击，军部和前委的同志被冲散。情况很坏，我相当危险，只身跑出来，找到了贺锦斋，军参谋长黄鳌同志牺牲了。于是我们退到泥沙，准备再组织暴动。在泥沙，我们消灭了反动团防武装，铲除了唐姓和陈姓的两家大土豪劣绅。但第二天早晨，敌李云杰和罗效之等部又偷袭我们，敌人很多，分几路包围我们，在开始接触时，师长贺锦斋牺牲了，还有人打我的黑枪，企图谋杀我，部队受到很大损失，全军只剩下200多人枪，在南北墩集合，然后到鹤峰、桑植交界的堰垱等地进行整顿。

这次石门暴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到西北乡时，敌人对湘东的行动已经结束，所以能集中力量来对付我们；西北乡的党组织没有基础，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以致我们到磨岗隘后，连一个侦察员和向导都找不出来；石门党的基层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尚未恢复，以致暴动工作得不到党和群众很好的配合，成了一个单纯的军事行动。加上红军的力量非常单薄，战斗力很弱，原来 1000 多人的队伍，经过几次战斗，只剩下 200 余人、百余枝枪了，所以经不住敌人的压力。

石门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在政治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红军到达石门境内时，石门反动驻军非常恐慌，在瓜子峪、易家河等处，挖有很深的壕沟，以备防守。石门县内的军队，日夜不敢安宿；澧县的驻军也跑到城外过夜；澧县王家厂暴动，红军奔袭 180 里，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这使敌人认识到了红军的力量和英勇奋斗的精神。我们在西北乡杀土豪劣绅，在王家厂通过群众表决枪毙征收员，都取得了广大群众的同情，他们更加认识到我们党是真正代表群众利益的，并愿意为之奋斗！

失败后，我们比较虚心了，也比较实际了，思想上有了明显的变化，对敌人的警惕性也提高了，特别注意严防敌人的偷袭。打土豪也不是看房子好就打了，而是搞调查，讲政策。这时也知道一些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井冈山斗争的经验，这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决心按照朱毛建军的方式来建设红军，选好干部，建立好党支部。这一点当时我已报告过中央了。此时，我姐姐贺英给我送来许多白

洋、布匹，支援红军，大大鼓舞了士气。她跟我说：你们不是有 CP、CY 吗，要好好整顿一下，把组织恢复起来，要好好整顿部队，兵要精，不一定在多。过去我对姐姐的话根本听不进去。现在也听了一些，对部队进行了彻底的整顿：遣散老弱和动机不纯的分子，发展党、团组织，加强基层领导骨干和严格的管理教育。经过整顿，全军剩下 91 人，72 枝枪，共编为 9 个班，每个班都有党员，也有团员，组织健全起来了。整顿后人数虽然少了，但这些人觉悟较高，所以队伍很精悍。

就在这时，前委受湘西和鄂西特委的指示，湘西前委改名为湘鄂西前委，负责领导湘鄂边地方党的工作。我仍任书记，张一鸣、陈协平、李良耀、汪毅夫、罗统一等同志为委员。

正当我们遭到困难的时候，10 月间，收到了中央给我的来信，信中说：中央对你们孤军奋斗与牺牲的精神，首先表示十分的敬意。不过你们现在的实力并不很强，而你在那里的目标太大，只能引起敌人联合猛力的向你进攻，若你仍不离开，减小目标，这部分实力，恐怕终久不能保存而要被敌人消灭。中央现在很希望你来中央工作，务望接信后，立即在你们那里选出一位在群众中有马列主义信仰、有指挥能力的同志代替你的工作。中央还可以立即派一个军事干部来担任参谋，帮助计划工作。你即刻起程前来中央是为主要的。

中央来信指出：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已经召开了。六大对中国革命运动现时的形势和党的总政治路线，都有明

确的新的估计和规定。大会指出，中国革命高潮已经过去，现时革命高潮没有到来，不过这次高潮是快要到来的。因此，党在目前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宣传武装暴动的口号，准备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时，实行武装暴动。党的军事工作，自然也不能离开这个路线。党员军事化，农民群众游击运动的准备，以及建立红军，都是党在目前的严重任务。

来信还说：你们的工作，是一种农民的游击战争。必须有组织有领导，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计划的进行。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农民斗争的口号，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打倒土豪劣绅地主，建立农村苏维埃政权。发动更广大的农民群众到革命斗争的战线上来，特别是动员勇敢的青年参加游击队，扩大游击战争，分化民团、警察和土匪，消灭反动派的武装力量。目前你们在强大的敌人包围之下，欲图大规模的发展恐怕很困难。此时宜竭力避免与强敌作战，同时你们应极力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并注意将暴动的范围扩大到邻近的区域中去，这是你们的主要任务。

接到中央的指示信后，我们非常高兴。依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传达讨论了来信精神，感到中共六大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中央对今后怎样打仗，怎样搞斗争，如何发动群众搞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等问题，都做了明白的指示，我们的信心更足了。不过中央要我到中央去，当时我没有去。我分析过，中央这样做是对我的关心，但是，到中央去路途较远，交通十分不便。而且当时的形势

并不象中央所估计的那样严重。我们从石门暴动的失败中也取得了经验教训，摸到了军队建设、党的建设、群众工作以及暴动工作的门路。部队的人数虽然比过去 1000 多人少了，但动摇分子走了，坚定分子留下来了，部队纯洁了。留下的这几十个人，力量不是弱，而是强了，有这些人枪，我们就可以继续跟反动派干。而且我对这一带的情况很熟悉，如果我一走，局面反而不好。我虽然艰苦一点，目标大一点，危险一点，但留下来对党对革命有利。这样我就决定不到中央去，后来我们坚持下来了。

整顿之后，红军向哪个方向行动呢？我们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形势，认为与湖北五峰党组织会合是否有把握，很难预料。只有施鹤一带的环境较好，可以做争取神兵群众的工作，比较适合红军的发展。因此，我们决定将红军带到湖北咸丰县去，以咸丰的黑洞、狗耳石等处作为红军的根据地，掩护农民起来斗争，一有相当基础，立即组织暴动，实行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

施鹤一带的所谓神兵，本来是农民为反对苛捐杂税和贪官污吏而形成的组织。他们的基本成份是好的，但后来受到土豪劣绅的利用，领导权逐渐落到土豪劣绅的手里。我们同他们的来往，主要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吸收下层觉悟的群众参加革命斗争。

11 月底，我们到了黑洞、狗耳石。走前留下我的姐姐贺英所属的武装在毛坪、红土坪、梅坪一带坚持斗争，并派汪毅夫同志到鹤峰鄖阳关地区开辟工作。不几天，施

鹤部委书记杨维藩来到部队。杨是来凤人，他当了黑洞神兵王锡九的师长，已经满口皇帝腔了。他不实行党的暴动政策，只听王锡九的，以谋个人的生存，一切工作都充分表现出机会主义的色彩，以致施鹤部委没有一个县委的组织，过去的组织都与部委脱离关系了。部委也没有做群众工作，替群众解除痛苦。由于杨维藩对神兵只搞安抚利用，不搞教育和斗争，加上敌团防力量较大，又增加了一营清乡军队，这时如果红军还在此地逗留，必然受反动神兵的包围。于是我们决定寻找新的发展方向。杨维藩主张由四川石柱入黔江，当时这种主张是没有一点政治作用的。因此我们主张向有群众基础的地方发展，这一主张得到了多数同志的同意。

12月间，我们向湖北利川县行动，在汪家营将豪绅神兵头子李长青（铁拐李）解决了，并得了步枪20多枝，连枪2枝，随即起程，经南平进入四川的北洋坝和川鄂交界的板桥，准备举行暴动。进至湖北建始县的梭布垭时，从商人口中得知施南的马文清部张团倒戈，建始县城只有团防百余人枪，便决定放弃板桥的暴动，袭取建始县城。那天晚上起程向建始县进攻，因没有侦察和向导，次日上午8时才与敌人接触。敌团防战斗力非常薄弱，仅30分钟，红军就占领了县城，杀死反动县长陆祖质，缴获步枪、手枪百余枝。几天后，红军离开建始县，向鄖阳关行动。走时将县公署的一切文件税契全部烧毁，发了告别工农贫民书，宣传党的暴动政策和没收地主财产的意义，贫苦群众都表示热烈的同情。途中抵达城南的崔家

霸，相机解决当地的团防。这里是恩鹤地区著名的市场，因赶集群众太多，不便开枪射击，只夺得1枝枪、数匹马，没收反动豪绅的数百元财产，捉到施鹤所属禁烟副主任和利川禁烟局长张杰三，翌日处决。途中经五花寨，地势最为险要，而且团丁早已分头守卡，红军仍然冒险冲过，并缴获敌人枪枝数十件。尽管敌人在沿途设置许多关卡，我们仍然闯过来了。

12月31日，红军进到鄂阳关。此时，汪毅夫同志已经与在这里工作的陈宗瑜同志带领的一支农民武装取得了联系，并在鄂阳关附近组织了一批伐木工人。这两部分共300余人，编入了红军，大大充实了红四军的战斗力。接着红军开始进攻鹤峰城。首先在关卡极其险要的观音坡与田少孟的常练队接触。我军先头部队将敌三面包围，经过1小时激战，击溃敌百余人，反动县长唐耀庭逃走，我军缴获百余枝汉阳造好枪，鹤峰城遂为我军所得。

我们原来打算早些离开鹤峰，但当时徐锡于同志回来报告，冯、阎、蒋、桂诸军阀已经冲突，武汉也在打仗，敌马文德部已从鹤峰向宜昌开拔，便决定再在鹤峰驻扎。打听到唐耀庭带着残余的团防退守鹤峰的太平镇，我们便派出一部分部队到太平镇，而敌人又退到卒洞湾了。我军乘胜进攻卒洞湾，全歼了团防，杀死了唐耀庭和典狱官闵某，活捉田少孟及数名县署的贪官污吏，缴获了部分枪枝弹药。

肃清了团防，红军仍回鹤峰，立即开始建立根据地的工作。1929年1月13日，在鹤峰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宣

布成立鹤峰县委和苏维埃政府，选出了汪毅夫、陈宗瑜等7人为工农兵代表，公布了“苏维埃政纲”、“耕田农有法令”，取消苛捐杂税以及焚烧地主田契文约的法令。接着，前委又深入发动群众，捉拿反动分子，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和财产。鹤峰苏区很快发展到东至白果坪、西至毛坝、南达昌坪、北到红土溪的广大农村。至此，湘鄂边的土地革命运动又高涨起来了。

关于朝鲜开城停战谈判的回忆

解 方*

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以后，经过五次战役，打了很大的胜仗。到1951年6月，我们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已经歼灭敌军23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使美帝侵略者不得不停下来谈判。1951年7月10日，在战线西部我方一侧的重要城市开城开始举行停战谈判，历时两年零17天。从此，朝鲜战场上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互相交织，边打边谈，断断续续，经过了漫长曲折的过程。

交战双方为什么一下子就能开始谈判呢？这还得从头说起。志愿军入朝后，打了第一次战役，这一下就把敌人打慌了。敌人发动侵略战争时，并未估计到中国会出兵。直到第一次战役打响后，它才相信：噢，中国是出了兵！本来其先头部队已经到鸭绿江边了，但它挨了打，向后退

* 解方同志原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是朝鲜开城停战谈判中的朝中方面的代表。回国后历任军委军训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副教育长，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副院长，后勤学院副院长。1984年去世。此文是王金陵同志根据解方同志1981年3月15日的回忆录音整理而成的，题目为编者所加。

了一下，退到清川江一线。因为中国出的兵力很小，因此美国还继续组织灭亡朝鲜的侵略，这就是第二次战役的开始。敌人继续进攻，志愿军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方针，边打边退，让敌人骄傲，让它犯错误，利用它对我们的力量估计不足，让它大胆往前进攻。等它攻到德川——我们预定的反击线上，就来一个反攻，一下子把敌人退路切断了。然后，我们分割包围，抓住一股就消灭一股，逼得它仓皇失措，一直逃回到“三八线”。这时正值联合国开大会，他们耍了个花招，提出朝鲜问题应“和平”解决，实际上这是一个缓兵之计。它怕我们继续向“三八线”进攻，它守不住。同时，它决定在联合国组织一个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来处理双方停战问题，这很明显是一个花招。第一，它是不得已，不真诚的。第二，它想用联合国来操纵（本来应该是交战双方直接谈判）。第三，从主张上看，它是先停战后谈判。我们识破了它的阴谋，一方面揭穿它，一方面积极准备继续举行战役，这就是第三次战役。怎么揭穿它呢？除了报纸之外，我们派出了由伍修权率领的代表团到联合国去，利用联合国讲坛来揭穿它的阴谋，宣传我们正确、合理的主张，同时，让志愿军加紧准备第三次战役。经过第三次战役，一下子又把敌人从“三八线”打到“三七线”。进到“三七线”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汉城被我们收复了，这是很重要的。经过这次较量，敌人知道耍阴谋不行了，于是继续进行军事准备。他们想引诱我们南下，实际上要把我们引到洛东江一带，他们好来一个第二次登陆。中朝双方的领导和彭总识破了敌人的诡计，所以

到了“三七线”后马上停止了战役追击。第四次战役是敌人主动进攻，我们是被动的。这时候我们已经背上汉城这个包袱，收复汉城对敌人来说是个很大震动，对国际上爱好和平的人民来说是很大的鼓舞，朝鲜人民又非常高兴，能收复这么大一个城市确实不简单。但是，现在敌人又进攻了，我们连续进行了三个战役还没得到兵源的补充，新生力量没上来，可汉城又不能过早地放弃，因为收复这个城市后政治影响那么大，那么鼓舞人心，你要轻易放弃它压力是很大的。所以收复汉城之后参谋要出战报发表这个战果，彭总就说：哎，你们要控制一下呵，可不要过度地宣传这个胜利。按现在我们的判断，敌人不会轻易地就这样罢手了，不可能。另外，从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说，已经连续打了三个战役，敌人再来进攻，我们只能防守，迟早还得放弃汉城。彭总是有预见的。敌人果然来了，怎么办呢？一方面要抵抗，不能过早放弃汉城，另一方面又要积极地做工作。彭总亲自发电报向毛泽东、周恩来建议，要国内在舆论上做一点准备，我们不得已时要放弃汉城，现在没有力量也没有必要死守汉城。如果不作舆论上的准备，一旦放弃汉城就会处于被动地位。另外中朝两国军队高级干部会议开完之后，彭总亲自回国向党中央汇报朝鲜战争情况，顺便看看二线部队改换苏联装备究竟怎么样了，什么时候才能装备完毕，什么时候才能进入朝鲜，以便确定下一个战役在什么时候打。他回国后，给党中央提供了情况，使得党中央做出了更正确的判断。第四次战役打的时间相当长，从政治上讲，汉城那边要顶的硬一点，

付出代价也要打。我们限定了时间，要守多少天，守到哪条线才能往回退。另外还有一个季节的原因，我们过汉江的时候是封冻的，越打天气越暖和了，如果后面一解冻，部队撤都撤不回来。所以这一条也限制你到时候非退不行，要不就成了“背水之战”。因此到了汉江要解冻了，我们就放弃了汉城。这时，国内援朝准备加紧了，新生的部队陆续开进了朝鲜，这就转入第五次战役。第五次战役比第一、二、三次战役规模大多了。这次战役是我们进攻敌人，虽未取得预想的那么大的战果，但是意义是很大的。

经过第一、二、三、四、五次战役，使敌人认识到一个问题：中国是决心把朝鲜战争进行下去的，即使付出重大代价也在所不惜。这点敌人开始时不清楚，现在清楚了，他们想用武装力量来灭亡朝鲜是办不到的。在这样一个军事形势下，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美国一个广播节目里发表演说，建议朝鲜交战双方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他一提出这个建议，当时的“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同意进行停战谈判。他提议立刻进行谈判，地点是在丹麦船上。同时也讲到：交战持续一天，双方都会有损失，我们宁愿提早会唔，提早谈判。这看出他们有一种迫切的心情。这样咱们就从容不迫了，马立克提出建议，李奇微首先响应了。我们通过金日成、彭德怀作出答复，说可以谈判，时间在7月10日到15日期间，地点在双方接触线上的开城。他们也同意在开城，而且说他们的代表团将乘自己的车到开城来，同时在车上带个大的“臂章”——大白旗。二者态

度对比起来完全可以看出，谈判时机到来了。但是如果没有我们在战场上的胜利，没有武装力量的基础，他们是不可能同我们谈判的。

对于谈判的各项事宜，如会场的选择、布置、警戒等等，我们事先都做了准备。由于我们控制的地区还在开城以东几十里，因此我们特别抽调了一支经验丰富的部队——原三五九旅，以后是四十七军的一个师负责警戒。会场设置在朝鲜一个大地主的庄园里。他们每天来，一部分从公路来，其代表坐直升飞机来。他们每次来都跟我们先联络好，我们放他们过来。他们有一定的识别记号，原来的那种骄气，一下子受到我们的约束和控制，他们是很不舒服的。但是你要谈判，不遵守这些不行。就这样，7月10日开始了正式谈判。

双方由敌对的情况转入面对面的谈判，许多细节问题都要考虑到。首先碰到的问题还不是谈的程序，而是见面的程序。双方代表谈判前都先派出联络官，联络官可以谈得具体一点，如双方代表团来经过什么路线，所坐汽车停在什么地方，直升飞机降落的地点，来了后在什么地方休息等等都由联络官们具体商谈。因为双方联络官都接触过了，到时候就分别由联络官介绍双方代表，我们称为“朝中人民军队代表团”，他们叫“联合国军代表团”。我们这个代表团参加停战谈判还是头一次。一坐下，他们就抱上来一面联合国旗，这一下将了我们的军，我们事先没有准备旗子。在谈判桌上就是这一点事也不能让步，这是斗争，输一局都不行，于是我们马上回去准备。打什么旗

子？当然得打朝鲜旗子，开城那地方准备得还是挺快的，上午告诉他们，下午就抱来一面大旗，这个旗比他们的高得多，这下我们坐在那里就很安然了，而他们就有点说不出来的味道。谈判时就是在这些小地方也是不能叫他们轻视的。

发言的时候，我方均由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发言，发言稿都是我们准备的，一些重要发言稿须报我党中央和金日成批准。每次谈判前我们都对敌人会提出什么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回答，怎样提出我们的主张，原来准备的发言稿要修改什么，中央回电是批准还是不批准，有什么新的指示等等问题进行充分的研究，这是很细致、周密的工作，出一点漏洞都会被敌人利用。一切安排妥当后，会谈开始。谈哪几个问题呢？他们有他们的主张，我们有我们的主张，但是他们提出了三点共性的问题：第一个是分界线问题。第二个是停战问题，停战要有保证，停战由谁来监督，规定哪些限制等等，也就是保障停战的稳定，不增加新的力量。第三个是战俘问题，停战就应该交换双方战俘。他们提出这三个问题，当然我们也不反对，因为在议事日程上这几个题目都是要讨论的。但是具体的还有很多争论。我们提出加上第四点，就是撤退外国军队问题，也就是政治解决朝鲜问题。我们算外国军队，撤出。但是你们美国军队也要撤出。然而也就为了议程是四个问题还是三个问题就争论了十几天。为什么谈判进行了两年零 17 天？仅为这事就争了十几天，我们主张四个，他们主张三个，最后他们不得不同意谈四个问题，但他们不明显提出来叫撤退外国军队，而叫做政

治解决朝鲜问题。遗憾的是这一条到现在也未实现。1954年开日内瓦会议，周恩来亲自去，美国代表是杜勒斯，想在日内瓦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没有解决，到现在还是问题。

在讨论分界线问题、即在什么线上停下来时，美国一下子就提出来一个方案，并划出图来，要把分界线划到平壤、元山以北。事实上双方部队都在“三八线”附近停下来，他要划在平壤、元山以北，那咱们还得撤退几百里，这怎么行！他们一拿出这方案，我们志愿军几个代表脸都气黄了，简直太无道理了！而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这次作战，你们只有一军——陆军，“联合国军”是三军——陆、海、空军，海军把朝鲜全部海面都控制了，空军把朝鲜全部领空都控制了，停战时必须把双方实力体现出来，要得到补偿。实际上是要朝鲜部队从停战线撤退，给他12000平方公里土地。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要通过谈判得到，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在战场上拿不到的，在谈判中也休想拿到。志愿军出兵的时候，叫“爱护朝鲜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呵！12000平方公里怎么能够给它？我们马上就把他们顶回去了，我们的理由是：你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想在会场上得到是妄想。我们只有一军就把你们打到这般情景，我们要是三军作战你们早就完了。这一点他们是无法驳倒的。

对于谈判，其它方面怎样配合？带指导性的材料，主要是彭总的电报。彭总于1951年7月1日18时发给毛泽东一份电报，题目为“对目前和谈的意见”。他准备2日晚上到金日成那里去，去前先提出一些意见报给毛主席，其中有一项，要作两

手准备，一个是战争，一个是和谈，一个是战场，一个是会场，二者要相互配合。他是这样讲的：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我能掌握和平旗帜，这不仅对朝鲜人民而且对中国人民均有利。坚持以“三八线”为界双方均过得去，如美国坚持现在占领区，我即准备8月反击，在反击前，采取放他前进数十里，使军事上政治上与我更有利些，再争取一个两个或三个军事上较大胜利，将影响联合国在朝鲜和战问题上可能的分裂，美军战斗意志必然地迅速降低。这段讲的很短，但比较全面，就是要战场和会场配合，战争和和谈两手并用。并讲到要掌握和平旗帜，主张以“三八线”作为分界线，因为双方都停在“三八线”上，这个建议是合理的。另外还有个电报，是彭总于1951年7月16日10时发给李克农、邓华，我并报毛泽东、金日成的。第一项就讲，送来的两天会议记录和信均收到，我方坚持基本原则问题是名正言顺、理直气壮的，是取得对方士兵和坚持和平的人民普遍同情和拥护的，是可以打击美英军战斗意志的，是可以教育人民、孤立美帝、分化其所谓联合国军阵营的，如此作法可能使美帝国主义完全陷于被动。如果没有和平攻势（和谈）的政治斗争，只有单纯的军事斗争，想要迅速孤立美国，迅速结束朝鲜战争，是不可能的。我们坚持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是有理的，以“三八线”为界是有节的，争取早日结束朝鲜战争于朝中两国人民是有利的。有理有节有利，但和谈并不一定是顺利的，可能遇到很多困难，甚至曲折过程，可能还需要严重的军事斗争，再有二三次较大的军事胜利，才能使敌人知难而退。不管在谈判中有多少困难，坚持和蔼的、说理的态度，使破裂责任归之对

方。这几点都是政治性很强的，第二项又讲军事方针仍应积极做持久战准备，在朝鲜境内没有实现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以前，决不应有丝毫松懈和动摇，此精神已向全军传达贯彻。战略战役公路在修筑，野战仓库在修建，供应情况在改善，战术训练在进行，高干会是否一定要开，待你们（邓、洪、解）回来后再定。第三项讲到，敌前线袭扰仍如过去一样，特别是12日到14日，飞机更猖獗，似与休会有联系，拟于数日后开展一次和平的政治攻势，配合你们进行和谈，释放少数俘虏，以军为单位在火线上开5分钟停战会议等办法，去影响敌军的士兵，准备夜航机散发英文、朝文的传单。这是在停战谈判开始的时候，有这么两个电报。这两个电报都是带方针性的。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战场与会场，这两个方面相互配合，交替使用。

关于分界线问题，他们要12000平方公里，我们坚决反对。这时候会场上的斗争和战场上是如何表现的呢？会场上，首先敌人找茬儿，除了提出无理主张，什么所谓海空军优势论吧等等外，他们就找茬闹事。中午他们不能回去，就坐汽车在会场区转。当时规定会场区是不能有武装部队进去的，警卫部队也不能带武装进去。但恰好碰上咱们换防的部队错走进去，他们就抓住这个机会照起相来，在会场上提出我们违反协议，没有诚意，戴上大帽子，要求我们回答，在没回答前休会。于是谈判开始后首先在这个问题上休会了。这个问题我们向中央报告了，中央指示不要在这些问题上跟他们纠缠。我们是违反协议了，错走进去，承认这点之后会谈又恢复了。但他们还是采取这个办法——不提新方案，而我们仍坚持原来的主张。外交谈判就是这样子，哪一方面中止了就被动，你反对得有反对

的理由，你赞成得有赞成的态度。这个“球”要踢回去，不能放在咱们这边。他们的无理主张坚持一天，我们就驳斥一天，重申我们的合理主张。最后，他们采取耍赖的态度，我们提出主张后，他们不回答，象没听见似的，于是会场停顿下来，一停就两三个钟头。双方谈判，两三个钟头没说话，可是这个没说话的是他们，我们讲完他们不回答，现在“球”在他们那里。最后他们只好提出，现在没有进展，休会。

因为这个“球”在他们手里，于是我们就在报纸上写文章，揭露它，孤立它，会场内外配合，逼得李奇微不得不举行记者招待会，说他提这个主张怎么怎么合理，共军方面怎么怎么样。以后他还是这样继续坚持，最后他讲出这种话：现在看来你们是不可以理的，只好让飞机、大炮、机关枪到战场上去辩论。同时他采取很多挑衅手段，破坏谈判，要谈判停下来，他们好在战场上动手。挑衅之一是把我们的一个排长打死了。因为我们的一个警卫部队每天在对方代表团经过的地方警卫、搜索，他们就让伪军在路边设埋伏，把我们警卫部队的姚庆祥排长打死了。我们抓住了这个证据，寸步不让，抗议他们没有谈判的诚意，破坏谈判。挑衅之二是，当时规定会场区和对方代表团经过的公路飞机不能侵犯，结果不但美国的飞机来，而且趁那天电影散场汽车开大灯，人打着电筒，飞机就下来扫射。这完全是一种挑衅和破坏协议的行为。我们提出抗议，在他们没有答复的时候不能谈判。这样就中断了62天。他们不是说战场上见吗，不是机关枪、大炮去辩论吗，结果他就来了个夏季攻势，接着又来了一个秋季攻势。夏季攻势是在西线打的，主要打的是志愿军。但在西线他们没占什么便宜，四十七军守天

德山守得很好，邱少云烈士就是在这个时候牺牲的。这边打志愿军不行，接着他又来一个秋季攻势，主要打朝鲜人民军。人民军守了一个 851 高地，守得很顽强。敌人往那里冲的时候死了很多人，所以它管那个地方叫伤心岭，一提那个地方就伤心。当时美国三军联席会议的参谋长讽刺李奇微：按照你这样的进攻速度，要打到鸭绿江也得 20 年。我们说你 20 年也打不到。结果在战场上辩论也不行，还得谈判。美国自己内部也有压力，他们是死不起人的，机关枪、飞机、大炮都可以受些损失，消耗大也不要紧，可是人他死不起。美国最怕的就是死人，死了人军人家属可以向政府提要求，他们得给人家赔偿的。所以各方面的压力使得他们不得不恢复谈判。要恢复谈判他们也有他们的办法。他们先派飞机违反协议，这回不打代表团驻地了，而是在板门店扫射一个农民的牛车，这一扫射我们就抗议了。他说好，双方联络官会晤。原来双方都没有接触了，中断了，这下用违犯协议的办法来把钩挂上。我们后来开玩笑：你别看美国人个子大，他要弯腰的时候也很灵活哩！他们建议双方联络官恢复会晤，这当然好嘛，我们看出来，他们是想要恢复谈判，那我们当然要去嘛。去了以后，他们的态度就很好。我们的联络官对打牛车一事提出抗议，人证物证都摆出来，他们的态度空前的好，说这完全是误会，我们错了，对不起。当场口头上就道歉了，并建议双方代表团会谈时解决这个问题。就这样，谈判中断了 62 天后又恢复了。

恢复谈判之后，我们要掌握主动权，即彭总讲的要掌握和平旗帜，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代表团一上来就提出就地停战，原来我们提在“三八线”停战，当时我们有的部队超过了“三八

线”（西线），他们的部队东线超过了，成S形，弯的。我们建议调整一下以“三八线”为界，他们不干，硬要12000平方公里。那么这次我们提出来就地停战，现在谁占领的地方就是谁的，部队在哪就在哪停下来，在这中间划条中间线，各后退2000米，成为非军事区。这个主张是完全合理的。但他们仍然反对，说将来还有变化呀等等。他们的意思是：你占这个地方，将来我还让你再退。我们说，那么好吧，到停战协定签字的时候再校对一次。因为我们有充分的把握，到时候，究竟哪一方会有有利的变化，还得看将来的事实，我们就是用这个理由来驳斥他们的。这样，逼得他们不得不接受我们的方案，达成了分界线协议。

分界线问题达成协议以后，就转入下一个问题——停战保障和战俘问题。首先先提停战保障，然后才谈战俘问题。但是美国很狡猾，总想在谈判上占点便宜。他说咱们别一个一个来，两个问题可同时进行，这样可以把停战谈判加速一点。看来好象有点道理，实际上他是想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个不行我就谈那个，最后要达成协议他总要占点便宜就是了。他们同时提出，最好是采取小组会的办法，分两个小组谈，一个谈停战保障，一个谈战俘问题。分界线问题于1951年11月26日达成协议，11月27日开始谈停战保障问题，一直到1952年4月28日才达成协议。最初他们拿出来的方案还是想要高价，提出由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来监察，限制朝鲜修机场，如果有破坏协议的，还要派出检查小组到现场去。如果这个方案我们接受的话，那我们就等于承认我们是战败国，让他们到我们的区域里随便横行，因此我们坚决反对，提出公平合理的主张：你们

可以提名两个国家，我们也可以提名两个国家，但一定要是中立国，逼得他们没有办法。最后监察的国家是我们提的捷克斯洛伐克、瑞典，他们提的印度、丹麦。到1952年4月28日就停战保障问题达成协议。

关于战俘问题谈的时间最长，从1951年12月11日开始，一直到1953年7月27日结束，前后经过将近20个月。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坚持得最厉害，因为在前面两个问题上他们想占便宜没占到，所以一定要在战俘问题上抓一把，这一把要是抓不到的话，那他们整个都失败了。所以他们也是拚了命的，非争不可。而我们也是非争不可。争执的实质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主张全部遣返，他们主张“自愿”遣返。从字面上看他们也遣返哪，而且还要尊重战俘的“自愿”，这很民主了吧。实质上不是这么回事。战俘在他们手里，怎么去表达“自愿”呢！实质上是强迫扣留。所以这个争论就是全部遣返和强迫扣留的争论。这个时间最长，斗争也最曲折。开始我们驳斥他们的强迫扣留，而他们强调是“自愿”遣返，每次辩论发言的时间都很长，真是热战啊！以后慢慢的在会场上—见面三言两语就完了。每次见面都是他们提“你们有什么新的问题吗？”“你们有什么新的建议提出吗？”我们答复没有。没有，那好，建议休会。最初休会还是有期限的，3天、5天，以后越来越长，这叫“冷战”啊！到这时，就是小休、中休，一直到无限期休会。这个无限期休会是他们提出来的。我们逼得他们讲，他们不讲，那好吧，你休3天就3天，5天就5天，反正在实质问题上我们一点也不让步。就这样，谈判中断了6个月。

战场上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他们用了很多方法，搞细菌

战，搞绞杀战，破坏我们的交通运输，以后又狂轰乱炸，炸朝鲜的水库。后来又搞了个金化战役，咱们叫上甘岭战役。他们攻上甘岭，用的炮弹、炸弹超过了二次世界大战最激烈战役的那个密度，咱们依靠坑道跟他们反复争夺，结果激战40多天，一个阵地也没被夺去。以后他又想搞第二个仁川登陆，咱们就搞抗登陆战役，准备抗击敌人登陆。这么一来，整个朝鲜正面战场有坑道工事，东西海岸有坚固的抗登陆防御工事。部队采取轮番作战，力量一点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美国看来还不行，还是占不着便宜，他们又受到很大压力。这时候英国因为没参加谈判代表团发牢骚，说朝鲜战争中我们对联合国是有贡献的，英国是出了兵的，3个旅嘛，出的股份仅次于美国，结果谈判时他们没有代表，都是美国人，加上1名南朝鲜伪军代表（他们是4名美国人，1名伪军，我们是志愿军2名，人民军3名）。英国因为其本国的压力，出了这么多股份，又没有他们的代表，战争又停不下来，英国的消耗他们也受不起。于是，他们派了一个小组到朝鲜战场上了解情况，同时在报纸上公开要求参加谈判，给美国施加压力。由此看出，“联合国军”内部就有矛盾，对美国的压力是很大的。

美国在战场上得不到便宜，他不得不又回过来谈判。于是，谈判在中断了6个月之后又恢复。由此我们总结出一条经验：跟他们斗争必须针锋相对。他们提出无理要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比他们更强硬，他们要到战场上辩论，我们就在战场上做好充分准备。这回恢复谈判又是美国先提出。他们说：现在看来停战谈判什么时候取得结果还很难预料，但是双方越延长，战俘的痛苦越不能解除。他们建议双方首先将重伤的战俘

遣返。这一点我们是不能拒绝的，但要说明，不是我们首先接受你们这个建议，实际上我们的和平旗帜比你们举的还高，这是我们始终掌握的一条。我们再次阐明了关于战俘问题从停战谈判一开始我们是怎么主张的，我们是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而你们是不考虑这些的，所以使停战谈判受到阻碍。我们建议关于这方面的具体问题由双方派出联络官在板门店商谈。1953年3月31日在金日成、周恩来的共同声明下又恢复了谈判。

恢复谈判以后，美国还是不能一下子放弃他们的无理要求，他们还是主张“自愿”遣返（实际上就是想强迫扣留），而我们继续主张全部遣返。在谈判的同时，我们在战场上进行了夏季攻势，时间从1953年5月13日到7月27日，中间进行了3次。这个仗越打越大，我们选择的目标是看对方对谈判的态度，开始美国不是横蛮无理、操纵谈判吗，我们就首先选择打击美军，以后美国态度比较好了，我们就选择打击英国部队，英国和美国矛盾大，打击英国，可扩大他们的矛盾，一直打到美国、英国、法国的态度都比较好了，要接受我们的谈判了，这时南朝鲜头目李承晚跳了出来，他主张要单独北伐，你们不干，我干，一定要坚持“自愿”遣返。本来预定6月初要签字的，李承晚跳出来之后，彭总就根据当时情况给毛泽东提建议：根据现在的情况，我们是不能让步的，美国、英国、法国已经感到这个战争不能拖下去了，现在就是伪军在蛮干。美国是不是完全不支持李承晚？也不是。你闹一下也好，你要碰了钉子还得接受我的主张，你要占了便宜我也好，还是我的胜利，所以他也有点放纵。于是彭总建议还要彻底打过这一仗，

要把李承晚打痛了，这样停战签字后就可能保持比较稳定，否则你勉强接受了，他还会挑衅，后患无穷。这个建议是完全对的，事实证明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们的目标又是打李承晚的军队。他的军队恰好在东线排了一溜子，以后不是有个“奇袭白虎团”吗？就是在这个地方。金城战役打出了我们的威风，把敌人坚固阵地也拿下来了。所以在朝鲜战场上我们是即能守又能攻，守，就寸土不丢；攻，就能攻下来。我们既学会了阵地防御战，又学会了阵地攻坚战。一下我们又收回 240 平方公里。原来在分界线问题上美国不是反对就地停战吗，他说就地停战他们吃亏了，将来战线会变化的，我们说变化就根据变化的形势改嘛，这话我们又说应了，结果是他们退了 240 平方公里。这时候，“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上将克拉克不得不紧急出来说：好，我们同意你们的主张。1953 年 7 月 27 日停战协定签字了。克拉克在签字时哀叹：“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签字的将军”，无可奈何地承认了美国的失败。

回忆投身西藏和平解放的历程

乐 于 泓

(一)

投身于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事业，使我终生难忘。按我当时的身体状况，一个有严重的肺部病残的人，我不可能也没有想象到会加入到进军西藏的行列中去。但是，由于我同进藏的第十八军所具有的亲密关系，在战争年代我同这支部队所结成的战斗情谊，事情就不是偶然的了。

第十八军是抗日战争中在豫皖苏根据地成长起来的一支部队。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期间，我在这支部队里生活、工作了5年，担任过宣传部长，对这支部队感情很深。渡江战役后，我因病不能随军向大西南进军，留在南京筹备正式成立总工会的工作。

1950年1月30日，我突然接到华东局转来的中央军委电报，调我回十八军随军进藏，到西藏搞外交工作。10天后，又接到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的信，催我西上，并告知部队已奉命在川南一带准备进藏工作。我猜想，军委的调令肯定是张、谭提出来的。我很高兴回到这支部队，投身到解放西藏的伟大事业中去。

由于我身体不好，许多朋友都劝我不宜进藏。幼年时代，我患过肺结核。30年代初，在上海搞党的地下工作，1935年在青岛被捕入狱，在青州监狱斗争中，遭受酷刑拷打，身体连受摧残。国共第二次合作后，1937年9月从南京国民党“首都反省院”出狱。在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12年中，我一直在淮北（新四军四师）和豫皖苏边区的战火中坚持工作，当时没有条件检查治疗。接到军委调令后，我到医院透视和拍X光片，发现左肺已经干瘪，右肺上部有两处钙化点。我认为自己的肺病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在战争年代那样紧张激烈的战火里都过来了，进藏又何足畏惧。于是，便匆匆只身启程西上。

4月10日抵达重庆。谁知因为肺病问题，在山城竟滞留了整整1个月。西南局组织部、二野组织部和卫生部的领导，都考虑我身体不好，不适宜进藏，并让我3次进医院检查，检查结果都是：左肺萎缩，左胸肋膜肥厚，心脏向左侧移位，右肺代偿性向左扩张，并有钙化点，不适宜高原生活，不能进藏。我再三申述要求，同医生争论，表示进藏决心。后来张国华军长到重庆开会，二野组织部的陈鹤桥部长、卫生部的钱信忠部长同张军长经过磋商，特别是由于那位奥地利医生、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了12年的傅莱同志真挚地关怀和帮助，最后答应：“可以试一试，如身体不行，即速返回”。我的人藏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此时，部队已经开始进军行动，修路、运输任务正在加紧进行。刚到重庆时，陈鹤桥部长即告诉我，西南刚解

放，地方国民党土匪猖獗，现在是一边剿匪修路，一边进军。支前运输任务非常繁重，不但需运粮食，还需运送一般日用品和帐篷等等。二野每个军都抽出 1000 匹好马组成了运输团。以后，张军长又详细地谈了进军情况，西南军区组成的几个工兵团和汽车团，已担负修路、运输任务，进藏的先进部队已抵达甘孜。

5 月 20 日，我随张国华乘飞机到达成都附近的新津，军部就设在这里。

到了新津，我接任新成立不久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工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张国华告诉我，解放西藏问题，我们争取和平解决。和平谈判基于以下四个原则：一、驱逐帝国主义势力；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三、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不动，将来由人民协商解决；四、宗教信仰自由。总之，第一步争取入藏，入藏后政治问题也要慢慢来。考虑到西藏问题要着眼于整体和全局，我们一定要争取西藏上层大多数。因此，即使在个别问题上争取下层群众时，也不要伤害西藏当局。我们当前主要的任务是了解情况，提出政策意见。研究室在这方面要做大量工作，任务很重。其次是人人都当宣传员，向藏族上层和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再其次要有严格的纪律，关键是干部带头模范地执行政策。

他还告诉我，当前最大的困难是粮食问题。先进部队已到甘孜，如果再连续下半个月的雨，飞机不能空投粮食，几千人马的生命将要受到威胁。在这个时候，更要严

格纪律，严格执行政策。

一批对西藏有研究的专家、教授已聚集在研究室，着手对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他们也将随军进藏。

机关干部和指战员已开始学习藏语文，开展生活高原化活动。早操时，还进行高原行军演习，学搭帐篷。

9月5日，军部来到海拔3100米的甘孜。王其梅副政委率领的先进部队已在这里度过了3个月的高原生活。由于粮食运输困难，部队执行毛泽东关于“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不向藏民征收摊派粮食，在50天内，不得不挖野菜、捉地老鼠充饥。进藏部队纪律严明，严格执行民族、宗教政策的模范行动，赢得了广大藏族人民的爱戴。

9月8日，工委在甘孜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形势和任务，制定了解放昌都的计划以及昌都解放后的地方工作和部队工作。

几个月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告知西藏地方政府，希望他们派出代表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但是都未能得到响应，而且西藏当局变本加厉地勾结帝国主义，扩军备战，图谋所谓“西藏独立”，并部署重兵于金沙江沿岸，企图凭藉天险阻止我军进藏。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前往西藏劝和途中，在昌都竟被杀害。鉴于这种情况，我军必须强行渡过金沙江，武力解放昌都。这是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一个必要步骤。

进藏部队司令员、工委书记张国华在工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总结了从四川乐山开始进军以来4个月的工作，讲了解放昌都的方针和任务。

张国华在报告中指出：4个月来采取暂缓向金沙江以西进军解放昌都的方针是正确的，拖的目的是调查了解情况，做好民族团结工作，从而使下一步能更顺利地进军。由于部队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加强了藏、汉民族的团结，藏族头人已卖给解放军8000头牦牛，解决了运输工作的困难。先头部队在高原上经受了锻炼，生活高原化康藏化有很大进展，加深了同藏族人民的感情。同时还需要看到，由于历史上存在的长期民族隔阂，有一部分人对我们仍然怀疑较多，这是一时避免不了的。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张国华在讲到今后工作时指出：过金沙江后，拉萨当局如果态度不明朗，还是耐心等待，不能急躁，西藏问题要争取和平解决。过江后，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权不变，不用解放军代替，给拉萨当局留有余地，不要封闭与拉萨当局可能和平解决的大门。主要是依靠政策，团结西藏各阶层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反对分裂。目前是团结西藏上层，通过团结上层分子去联系群众，同时培养民族干部，发展新生力量。昌都解放后，召开各界僧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昌都解放委员会，昌都解委会是统战性质的协商机构，主要任务是协调军民关系，支援进军。今后补给工作是进军的关键，补给主要靠内地。公路、飞机不通，一要买点粮食，二要买些牦牛，不能摊派。要有克服困难的充分思想准备，只

要不饿死人就行。

根据工委扩大会议的决定，我代工委草拟了一份《关于昌都解放后的工作要点》，发到各部队。

会议结束后，一些干部分别下到各师、团和兵站，部队出发，继续向前推进。

在加紧部署昌都战役的同时，工委和军党委指示，学习西南局制定的《争取西藏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亦称十大政策）。经中央批准的这十项条件是：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里来；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三、西藏地方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喇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六、发展西藏民族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七、发展西藏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八、有关西藏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意志，由西藏人民及领导人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当时，《十项条件》暂不对外公布，由内部掌握。昌都战役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联合颁布布告，公

开宣布了这十项政策的内容。11月10日，新华社作了报道。后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举行和平谈判时，就是以这十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的。

机关里留下的干部不多，甘孜比往常显得清静多了，但工作却是紧张忙碌的。要立即组织人力上山打柴，保障越冬所需5个月的柴草；要抓紧时间，每天早晨学习政策，学习藏语文；要积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动员当地人力、畜力搞好支前运输工作；要尽量利用机会进行社会调查；要办藏族干部训练班，培养藏族青年干部。

9月19日，我和天宝（即桑吉悦希）骑马到离甘孜20里的白利寺，对该寺格达活佛为解放西藏奔走而被害进行慰问，带去两千块银元。白利寺是一个爱国的喇嘛寺庙，寺庙管家和铁棒喇嘛（负责治安的喇嘛）热情接待我们，对格达活佛被害，深感悲愤。他们向我们反映了许多金沙江以西地区的情况，畅谈至深夜，亲如家人。当夜，我们住宿白利寺。

还有一次，我和天宝随张国华去甘孜西北100多里的玉隆，看望大头人夏克刀登。玉隆海拔4100米，是个牧区，气候寒冷，10月初的早晨，已是白霜遍地。夏克刀登是西康藏区最有权势的上层人物之一，部队进军以来得到他的大力支援。我们谈到昌都战役中的运输问题时，他表示对由甘孜到金沙江边300多里雇牦牛运输的工作将全力支持，他可以出6000头牦牛。当时，我和张国华计算了一下，有他这6000头牦牛，再加上德格土司降央白姆的2000头，整个畜力运输问题可基本解决。

进藏途中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不懂藏语。不懂藏语，要到群众中进行社会调查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在与上层人士的交往中通过翻译了解一些情况；或者利用某些同群众接触的片刻时间，搜集一点粗浅零碎的材料。例如在风俗习惯方面，藏族死人实行天葬，给老鹰喂食，天葬禁止外人观看，所以我们严格禁止干部战士去看天葬。他们还有一种可怕的“风俗”，就是把孩子投火烧死祭祀神鬼。我们还了解到，甘孜寺上层喇嘛见了美女，即认为是“活鬼”，被关在寺庙内，实际上供他们奸淫蹂躏。我还调查了一个村子和一个农牧民自由交换市场的基本情况。由于语言不通，要更深入地了解情况就很困难了。

10月20日，前线传来我军解放昌都的胜利消息。10月25日，张国华给干部作了形势报告。他说，昌都解放打开了下一步向拉萨进军的大门，昌都战役在政治上对西藏将产生重大影响。全体指战员要戒骄戒躁，认真执行政策，努力争取和平解放西藏。

工委讨论了今后6个月的工作，提出以下任务：保障过冬生活安全，开展新解放区上层和群众工作，熟悉与锻炼生活高原化。我起草了《今后六个月工作指示》，经工委各部门讨论修改后，下发到各部队。

高原进入了冰封雪盖的严冬，部队进行休整。我们利用这段时间学习社会发展史，收获颇大。

12月14日至24日，工委连续开会，讨论西藏解放后前藏后藏区域划分问题，昌都各宗（相当县）解委会的组织问题，部队过冬问题，工委机关工作问题和干部问

题。同时，工委也讨论了调查研究问题。认为中央的基本方针政策已有了，但具体执行起来并不简单。干部战士对西藏情况不了解，部队又非常分散，问题多，遇事请示报告来不及，因此，只有应用具体材料进行启迪和教育。政策研究室要积极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编写政策教育材料下发部队。

研究室（同时也是办公室）根据工委会议精神决定分工负责，编写教材，内容主要有：一、社会情况、人物介绍；二、宗教（以三大寺为主）；三、达赖、班禅的关系；四、经济、贸易；五、边界、外交；六、特情。我负责编写边界、外交部分。这一工作争取在1月底基本完成。

1951年1月28日，接昌都电报，得知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谈判代表将到昌都，他们还可能到北京去。工委立即开会研究他们谈判的目的以及对待他们的态度。昌都战役后，达赖和噶厦（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都逃到亚东，拉萨只留下看守政府。2月2日，获悉西藏的另外两位代表已去印度，可能要见我驻印度大使，讨论赴京问题，来昌都的代表也一同赴京。2月8日，又接到昌都发来的几份电报，说拉萨当局对和谈提出了几个条件。工委认为，西藏派来谈判代表可能带有试探性，也可能是缓兵之计，决定等他们到达以后再说。后来证实西藏派到印度去的代表是企图向我表示“独立”的，到昌都的代表同样没有和谈诚意，和谈未能进行。

3月29日，又接昌都来电，西藏派出了以阿沛·阿

旺晋美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已从昌都出发。这个代表团是阿沛·阿旺晋美从昌都连给达赖喇嘛写了两封信，建议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请求派出代表团同中央进行和谈才促成的。代表团中还有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两位代表以及随员金中·坚赞彭措等 12 人。另有两位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且达以及藏文翻译尧西·彭措扎西（达赖的姐夫）、英文翻译桑都仁青等，经印度走水路前往北京。

3 月 31 日，工委开会讨论欢迎代表团问题，包括欢迎标语、住处、宴会、晚会、保卫安全工作等，由我和徐谈庐负责。工委决定由我陪同代表团赴京。

4 月 9 日，西藏和谈代表团抵达甘孜。晚上开欢迎晚会，我致了欢迎词。第二天，我便陪同他们由甘孜出发，赶赴北京了。

(二)

和谈代表团从甘孜乘汽车前往内地，沿途受到热情招待。

在康定，康定藏族自治州（后改为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组织了欢迎会。在雅安，西康省人民政府主席廖志高同阿沛·阿旺晋美等人进行了亲切谈话。廖志高问到他们沿途有何感观，土登列门说，对我们的宗教政策表示满意，不过希望能够贯彻下去，他担心我们不执行。阿沛·阿旺晋美接着说，他认为我们不同于过去的国民党，说到做到，而且能够贯彻执行，并以昌都和沿途见闻举

例。廖志高列举藏族在西康省人民政府委员中的比例以及凉山彝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情况等事实，向他们作了介绍。

4月16日，和谈代表团到达重庆，在重庆停留了4天。他们谒见了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首长。“西南党政军领导在胜利大厦宴请了他们，并举行了文艺晚会。

19日，邓小平政委会见了和谈代表团。阿沛·阿旺晋美在会见时说，争取达赖回来是上策。如果达赖不回来，也要打通取道印度的代表们的思想，求得藏军退回，人民解放军和平进藏，免得生灵涂炭，这是中策。邓小平讲了我们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一再说明我们是认真执行政策的，政策如不能认真执行，就不可能取得胜利。邓小平说，过去藏胞长期受到大汉族主义压迫，对我们怀疑是有根据的，我们一定要用事实取得藏族同胞的信任。要认识到达赖回来、和平进军的好处，希望他们把这些问题向取道印度来的代表讲清楚，谈判是能成功的。

在重庆，和谈代表参观了纱厂、毛纺织厂和西南土特产展览。

原定和谈代表团从重庆乘飞机经西安再飞北京。20日上午飞抵西安后，因北京风大，于当晚改乘火车，22日傍晚到达北京。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和中央各部委首长亲自到车站欢迎代表团，使代表们深受感动。

26日，取道印度的和谈代表也到达北京。

一到北京，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就告诉我，班禅额尔德尼也将从青海来京，谈判要谈班禅与达赖的团结问

题，要我向阿沛等代表说清楚，并通过他们说服取道印度来的和谈代表，并请他们在班禅到京时派个代表去车站迎接。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我思想上没有准备。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不和，班禅逃到内地已 28 年，现在是十世班禅和十四世达赖，十四世达赖统治着西藏，班禅转世的问题尚未得到西藏认可。我同阿沛·阿旺晋美谈到班禅来京时，阿沛提出了两点意见：第一、他们这次来京主要是和谈，不是解决班禅和达赖的关系问题。第二、如达赖出走，班禅回藏，达赖所辖地区仍由他们实行区域自治。至于欢迎问题，班禅是西藏活佛，他们藏民当然是应该去接的。

4 月 27 日，班禅到京。和谈代表经过商量，决定派最末位的代表桑颇·登增顿珠和两个翻译前往车站迎接。

中央非常重视做好各方面的团结工作。班禅到京的当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就为他设宴，做他的工作。第二天，周总理又宴请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和谈代表团。

宴请后，周总理告诉我们，一定要把团结工作做好。李维汉部长并就谈判的地点、方式、日期、步骤等问题，征询了阿沛的意见。

4 月 29 日，和平谈判代表第一次接触，地点在北京市军管会交际厅。出席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首席代表）、张经武、孙志远，张国华于 5 月 15 日赶到北京参加。西藏方面出席的有：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首席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我和平措旺阶列席会

议。当天仅就谈判程序、步骤问题进行了协商，听取了阿沛·阿旺晋美等代表的意见。中央印发了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即西南局制定的十大政策），供代表们参考和讨论。同时还研究了关于“五·一”节请阿沛和班禅上天安门主席台的问题。最后，阿沛提到新疆解放军在阿里地区向前推进，达赖能否留在西藏成问题，希望解放军不要向前推进，他们将代表团名义电告达赖。李维汉答复，可以请示中央。

5月2日下午继续谈判。西藏代表表示接受中央关于和谈的十项条件。阿沛提出进军问题是焦点，这个问题要是解决，再把十条中不清楚的地方提出来。李维汉部长指出，进军西藏是中央既定方针，西藏是我们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全中国都必须解放。人民解放军进藏对藏族有利，对全国有利。中央人民政府帮助少数民族解放，免受帝国主义侵略，西藏是我国西南国防的前哨阵地，更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军驻守。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有纪律、爱护各族人民的军队，并且一贯如此。进藏的人民解放军不要西藏地方供给，西藏人民没有负担。现在英国、印度和各国都承认人民解放军进藏是我国的内政问题，和英国、印度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承认达赖的地位，毛主席已祝贺他亲政，他要是去印度，就会失去现有地位。进军西藏是我们保卫祖国的权利和义务，是正义的。接着，李维汉部长又进行了如下分析：一般人可能有三种想法，一是认为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二是想拖一下看国际形势怎样，三是怀疑人民解放军进藏是为了整藏族，这些都是不实际

的。如果要整的话，用战斗打败了更容易整，不会有和平谈判。

5月7日下午，经过谈判，确定了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关于西藏和谈代表对中央十条提出的疑问，基本上是领导权问题。西藏代表提出第二条与第三条合并，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一条，与西藏现行的各种政治制度概不变更、达赖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的一条，加以合并。他们怕另成立什么政府。他们希望对有关西藏各项改革事宜的第八条，要说明中央保证不用强制手段和压力。藏军要发展到解放军的水平，自守国防，并由中央补充装备。5月10日谈判，李维汉部长对西藏和谈代表提出的疑问作了明确解答。但是在谈到设立军政委员会时，又引起了争执，西藏代表认为这与第二、三条有冲突。经过反复解释，再三协商，最后取得了一致意见。

关于班禅问题，西藏和谈代表不同意列入协议。他们说现在是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要讨论中央和西藏地方的问题，与班禅问题没有关系，要求班禅问题另行商定，否则他们要请示后再谈。李维汉部长指出，班禅问题不能从协议中去掉，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班禅即通电拥护，他们30年来没有勾结帝国主义，没有出国，这是一个界限。西藏代表推说这次来京谈判，西藏地方政府根本没有交代他们谈这个问题。最后，李维汉部长说，这个问题如不解决，所有已经达成的协议都不能成立。

整整一个星期，谈判陷入了僵局。5月19日下午，

中央和谈代表说明协议上要列入班禅问题，是讲对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是指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这样，西藏和谈代表同意了，终于达成了协议。

谈判过程中，有时体会一两天，安排西藏和谈代表参观游览，藉此在笑谈游憩中进行个别交谈，消除疑虑，增强和谐团结的气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经过 20 多天的耐心磋商，反复谈判，顺利地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5 月 23 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协议的签字仪式。

5 月 25 日，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和谈代表团，并设宴庆祝协议的签订，发表了重要讲话。

中央对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非常重视，对西藏和谈代表非常关怀。周恩来总理经常听取汇报，亲自安排次日和谈代表的参观活动，嘱咐要把协议的藏文本翻译好。

协议共 17 条；最主要的是：（一）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实现西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的统一。（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三）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四）对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五）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

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六）实现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统一，主要是达赖和班禅两方面之间的团结。（七）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八）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

阿沛·阿旺晋美为协议的签订作出了重大贡献。西藏地方政府发给和谈代表们的“全权证书”中写有“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的内容，但是暗中又指示他们不得许诺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在谈判中，阿沛根据全权证书上既已明确写有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内容，认为如果不同意人民解放军进藏，就根本无法进行和谈。于是他舌敝唇焦、苦口婆心地说服了所有代表，作出决定，同意了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这一条款。关于班禅问题，对达赖集团来说是最为忌讳的，达赖、班禅不和长达30年之久，隔阂极深，这次西藏地方政府根本没有授权和谈代表谈判这个问题。他们对这件事本来是感到非常敏感的，但在中央和谈代表对他们的意见作了解答说明之后，阿沛说服其他代表，也作出了决定。为使返藏后让达赖更具体而全面地了解谈判情况，有利于接受和谈协议，在和谈代表们每次商议问题时，阿沛都请达赖的姐夫彭措扎西参加。即使如此，阿沛和其他代表对签订的协议还是忐忑不安。直到5月28日，和谈代表团接到达赖来电，表示完全同意班禅问题列入协议，此时，代表团全体成员才松了一口气，欣喜若狂。

协议签订后，和谈代表们分两路回拉萨。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等仍随军由昌都回拉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桑颇·登增顿珠等经香港、印度、锡金返回拉萨。

张经武作为中央人民政府赴藏代表，带着毛泽东主席给达赖喇嘛的亲笔信，和凯墨等人走香港，取道印度、锡金，到亚东说服达赖同回拉萨。中央决定让我以十八军联络部长名义，随同张经武到拉萨。

我初到北京时，曾检查了身体，肺部旧病没有变化，可是医生仍然嘱我多休息，勿过于疲劳。事实上，紧张的谈判在进行，哪里谈得上多休息，只是在过于疲劳、头痛厉害时，一般电影晚会、文娱活动少参加。现在又忙着赴藏前的准备工作和办理出国手续，我的心又飞向那遥远的冰雪高原。

6月13日，我随张经武和西藏3位和谈代表两位翻译等离开北京，经广州去香港。

6月27日到香港，因为等飞机票，在港停留了10天。7月7日，飞往新加坡。8日，飞往印度加尔各答。10日，飞往印度孟加拉省北部的锡里格，中午改乘汽车，曲折上山，约4个小时，到达接近西藏的噶伦堡。西藏地方政府派来的官员雪康色（帕里宗本，宗本相当县长）迎接了我们。我们住在印度人的一个别墅里，抽空参观了一所华侨中学——中华中学，并到20多里外的大吉岭游览了一下，约阿沛的4个子女来吃饭，阿沛的这4个子女均在大吉岭学校读书。

11日，乘汽车到锡金首都甘托克，锡金王子派秘书来拜见了张代表。12日，在濛濛细雨中，我们骑马来到中锡边界喜马拉雅山脉南侧的达斯美里。我们从炎夏的热带来，没有多带衣服，到海拔4000米的群山中，冷得直打哆嗦。

13日，越乃堆拉山口，入西藏境内。下山，有噶厦（即西藏地方政府）派来的15名藏军打着小旗欢迎我们。

7月14日，我们到达亚东。达赖的代表和噶厦的代表僧俗官员数人出亚东10里欢迎我们，并献了哈达及侏子。这座海拔3200米的边城，是中印边界上的一个咽喉，气候温暖如春，山花如火，景色迷人，小街上散落着二三十家店铺，印度的商店最大。达赖住在离这山镇10多里外山脊腰上的东噶寺庙。

次日，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中的首席噶伦然巴·上登贡钦、噶伦索康·旺清格勒、朵噶·彭措饶杰、扎西林巴·钦绕旺秋来我住所拜访，谈到第二天和达赖喇嘛的见面仪式。他们提出的仪式是：达赖升座，百官傍侍，张经武代表进屋，达赖下座迎接，接毛泽东主席信后仍升座，安排张代表和我在达赖右侧就座。他们就此征询我们的意见。

我对他们说，张代表这次到亚东来，是在签订协议之后，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我们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并把毛主席给达赖的亲笔信交付达赖，这不同平常一般私人间的交往，而是体现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地方政府的关怀，这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我提出上山后，我们先在帐篷中休息，然后直接去达赖卧室会见达赖，并面交

毛主席的信件。

接着，我谈到西藏地方政府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和谈代表到达北京时，中央首长亲自到车站迎接；毛主席接见西藏地方政府全体和谈代表，都是平起平坐，亲切感人，跟过去满清、国民党反动派根本不同。我指着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说，他们都是在场亲身经历过的。他们点头附和。

最后，我们经过协商，取得了一致意见。

16日上午，首席噶伦然巴·土登贡钦来接我们上山去见达赖。我们骑马上山，大约15里路，走了两个小时。到东噶庙前，见了百官，被引进临时支设的帐篷，由噶伦们陪坐稍憩。

然后，噶伦们陪同我们去达赖卧室。达赖刚刚年满18岁，这年刚开始亲政。按西藏制度规定，达赖不满18岁前，需设立摄政一职主持政教事务。

我们走进达赖卧室时，达赖下座迎接，并与我们握手。张经武代表把毛泽东主席的信件递交给达赖，他双手接下，并合掌问毛主席身体健康。张代表也问候达赖喇嘛身体健康。达赖坐在较高的座垫上，张代表和我坐在达赖右侧的两个座垫上。

谈话中，达赖说，阿沛在藏历6月15日前可回到拉萨，他携带有和谈协议正本，那时再由噶厦讨论一些问题，达赖自己已准备于藏历当月18日回拉萨。他没有对协议表示态度。

这天，我向西藏和谈代表凯墨·索安旺堆提出关于利

用他们的电台给中央发电报问题，要我们机要译电员同他们电台联系。凯墨说电台发报时间可告诉我们，意思是不要我们与电台直接发生联系，因为电台报务员是英国人福克斯。

17日，我们请凯墨、土丹且达来住所，谈了噶厦对协议表态问题。凯墨说要等阿沛回拉萨与噶伦们见面后，噶厦再表示态度。我说协议内容阿沛在北京时已经电告噶厦，这次我们又带来协议抄本，噶厦应该表示态度，不一定等全体噶伦开会，早表态对达赖在全国的威信有好处。张经武又谈到班禅已经致电拥护达赖，为了团结，达赖也应表态。凯墨答应转告噶厦。最后，凯墨提到给中央发电报问题，我们机要译电员可以与电台报务员福克斯见面接头。

张经武给中央发了电报，报告抵达亚东见到达赖的情况。19日，接到中央回电。

20日，尧西·彭措扎西和达赖的三兄洛桑三旦来访。噶厦派人送来发给中央人民政府的电报，请我们机要译电员译发。电文中仍说待阿沛回拉萨后，接到协议正文，再召开会议讨论，对协议表态。

(三)

达赖于21日由亚东启程返回拉萨，沿途他还要接受群众顶礼膜拜，给群众讲经。

23日中午，我随张经武离开亚东，在噶厦接待官员雪康色及15名藏军护送下，向拉萨进发。

横越喜马拉雅山的脊背，荒无人迹，山风寒峭，空气稀薄，7月身穿毛衣毛裤，犹觉冷气逼人。大家都气喘不止，我这个只有半个残肺的人，呼吸更为困难。

经过艰苦的跋涉，我们到了雅鲁藏布江边，翻越海拔5000米的涅索拉山。山势险陡，我们迎面遇到一群骡帮，我的马惊了，突然飞起来，向陡峭的山崖边沿奔去。我急忙跳下马，摔在地上，背上的照相机压在后腰间，马的后蹄又踩了我的右胸。我一时昏厥过去，呼吸闭塞，足足一个钟头才苏醒过来。夜间睡在渡口边一个帐篷里，翻身腰痛难忍。不过这一夜睡得很恬静，也许是因为很快就要到拉萨了。我想着我们的目的地——拉萨，想着翻越重重峰峦，正在向拉萨进军的部队，一会儿就睡着了。

第二天乘坐牛皮筏子，渡过宽阔浩荡的雅鲁藏布江。

过江后，很快就进入拉萨河谷平原。一路树林片片，流水潺潺，村庄星罗棋布，青稞小麦丰茂。远远就看见高耸入云的布达拉宫金顶，护送我们的藏军吹号脱帽致敬。

8月8日，我们终于到达拉萨。我们是在达赖之前进入拉萨的。

我们到接官厅，留守拉萨的两个司曹（即代理司伦，达赖以下的最高行政官）的代表、噶伦拉鲁·策旺多吉及僧俗百官和500名藏军迎接我们，僧俗官员献哈达，藏军吹奏军乐。藏族群众艳装丽服，满街满巷。

到达拉萨后头几天，司曹、噶伦在大昭寺宴请张经武代表，印度、尼泊尔、不丹商务代表前来拜访。我在招待官员陪同下浏览市容，沿拉萨河一带贵族世家别墅、林卡

毗连，但市区里却到处都是贫民窟和臭水坑，粪便横流。人们说拉萨有三多：贵族别墅、林卡多，乞丐多，喇嘛多。

张经武召开会议，讨论了开展工作问题。决定由我对四品以上官员有计划地安排主次先后，分别走访，向他们宣传解释中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赠送《协议》；对各寺庙发放布施问题进行调查；将进入拉萨后的情况及沿途情况、同驻拉萨的外交人员接触情况，拟电报告中央。

我最先接触的是达赖出走亚东时任命的两个司曹洛桑扎西和鲁康娃，这两个人都是二品僧官。洛桑扎西 55 岁，曾任国民党时代西藏地方政府驻重庆办事处副处长，并任国民党二、三、四届参政会委员和立法委员，为人圆滑。鲁康娃 62 岁，身材高大，白胡须，曾任噶厦农牧局负责人，后升任孜本（人事审计局负责人），思想顽固守旧，妄自尊大，感情易冲动。

我同他们谈话时，洛桑扎西不谈政治，讲得最多的是解放军进藏部队先遣支队来后的住房问题。鲁康娃就进军问题大发议论，他说阿沛去京时给他的任务是和平谈判，未授权谈军事，这 17 条很突然，究竟怎么办待阿沛回来报告讨论后再说。他还说，西藏正谋求和谈之际，传来昌都解放的消息，人情激愤。西藏为佛国，爱好和平，宗教盛行，派军队来不如派聪明干练的干部来为得策。中国是大国，人口众多，力量强大，但做事应有限度。我反复用实例解释中央的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解放军纪律严明，并说明阿沛在谈判中就重大问题都请示了达赖。他还是不

以为然，十分傲慢。后来，据悉他还在上层中煽动把藏军集中在拉萨，同我们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

16日晚上，接中央指示，关于欢迎达赖问题须先研究地位、仪式，不失身分，如司曹不顾中央与地方关系，张经武即不去迎接，由我去迎接，这样主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张经武布置了欢迎事宜。鉴于张经武进城时，两司曹只派代表迎接；在宴请张经武的宴席上，两司曹又自己高居上座，毫不顾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因此，决定由我去接官厅迎接达赖。

8月17日，在我们到达拉萨后的第10天，达赖一行回到拉萨。达赖乘4人抬的黄色轿子到达接官厅，我代表张经武献哈达，旋即退去。拉萨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群众说，达赖去冬出走亚东是在深夜悄悄离去的，这次回来在光天化日之下，是吉祥之兆。

18日，接中央对张经武进藏初期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说，对达赖及拉萨上层，主要是接近，进行宣传解释，以解除其顾虑，尚不宜采取进步措施；宣传协助我们进军问题，只一般号召，具体工作待阿沛到后，再根据需要提出；关于发布施问题，以不少于国民党布施数为宜。

自进入拉萨后，我们即全力投入上层统战工作。上层对中央政策不了解，顾虑怀疑多，害怕我们同国民党一样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害怕解放军和满清赵尔丰的军队、国民党军队一样镇压藏族人民。一部分人“独立国”思想严重，反对协议，如鲁康娃、洛桑扎西等人。在我们接触中，普遍担心解放军进来太多，粮食问题无法解决；怀疑

中央的宗教政策，谈话中无人不谈宗教问题，有人表示不过问政治，只希望西藏宗教昌盛；对协议中成立军政委员会表示怀疑，害怕改革旧制度。

有一次，我同雪苦巴孜本谈话，他说西藏地瘠民贫，粮食不多，交通又困难，军队进来粮食不好解决。他还谈到过去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现在印度独立了，同中国又有邦交，印度在亚东、江孜驻了点兵，这是过去西藏政府与英帝签订的条约上有规定的。总之，似乎国防没有什么必要。我向他解释说，我国固然不进攻别国，但防人之心不可无。藏族和中国各民族是一个人身上的四肢十指，血肉相连，痛痒相关，而帝国主义总是时时刻刻搞阴谋诡计，总想分裂我们的肢体，这个界限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千万不要听信帝国主义的谣言。我说，历史上藏族受过歧视压迫，一般人有害怕心理，有民族隔阂，是可以理解的，被蛇咬过，见了绳子就害怕，这不足为奇。协议上已写了政策，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尊重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得到各族人民拥护。因此在过去4年中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武装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今后几个月，你们会很快从实际行动看出解放军是不是蛇？他说，要是蛇，藏族人民也无力打。我说，满清赵尔丰的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是蛇，咬了藏胞，藏胞无力打死它，可是各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是可以打死它的，今天终于被我们打死了。谈到最后，彼此感情上才渐渐融洽起来。

9月9日，由王其梅率领的进藏先遣支队抵达拉萨。

12日，阿沛·阿旺晋美也返抵拉萨。

对西藏上层的统战工作，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全面开展起来，即：张经武代表毛泽东主席给达赖喇嘛赠送礼品问题，争取达赖早日致电中央对协议表态问题，庆祝国庆节问题，给寺庙喇嘛发布施问题，解决部队粮食问题，班禅回藏问题。

9月17日，先进支队司令员王其梅给达赖送礼。送礼行列抬着礼品先绕大昭寺走了一圈，然后去达赖的夏宫罗布林卡。街上数千僧俗群众围观送礼队伍，而罗布林卡内却戒备森严。送礼时，达赖升座，王其梅献哈达，行鞠躬礼。达赖给他脖颈上挂了哈达。送礼完毕后，应达赖要求，他在殿堂楼台上检阅了我们一个排战士的分列式。

我于9月23日去噶厦，商谈张经武代表毛泽东主席给达赖赠送礼品的问题。我提出赠送礼品的仪式应遵守一个原则，就是政治上尊重中央人民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正确关系，宗教上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与习惯。另外，我谈了希望达赖尽早致电中央表示拥护协议，争取在国庆节前发出电报。还讲了举行庆祝国庆大会问题以及班禅回藏问题。噶厦答应第二天讨论，第三天答复我们。

到了第三天，噶厦派凯墨、柳霞来传达他们的意见。关于送礼仪式，同意我提出的原则，具体方式如下：达赖不升座，在宝座前设凳子，达赖坐在凳子上，张经武代表进入殿堂，达赖起立，接受礼品，送礼完毕后达赖即升座，左首为张代表设一个高座，比任何僧俗官员的都高，然后张代表再以个人身份给达赖献哈达。喝茶吃米饭后，

即由达赖的侍从引导进入达赖卧室谈话。我提出，张代表高座对面应空着，不设座位，司曹等席位应依次排设在张代表对面之下。达赖接受毛主席像时，应合十表示致敬，毛主席像应放置在高于达赖宝座的位置上。赠送仪式应由噶厦用书面通知我们。

关于庆祝国庆大会问题，噶厦考虑西藏没有开群众大会的习惯，不开为宜，怕发生事端。他们的意见是由解放军单独开，噶厦派代表参加。我提出国庆节市内应悬挂国旗，他们说新奇的东西少办，慢慢来。

关于班禅回藏问题，噶厦同意班禅在拉萨停留数日，同达赖会晤，然后回日喀则，并由扎什伦布寺（班禅所属主寺）派两人来与噶厦具体商定欢迎事宜。

关于国庆前后发电拥护协议问题，噶厦表示有困难，张经武又提出最好争取国庆节前发出拥护协议的电报。

9月28日，张经武代表毛主席给达赖赠送礼品。在这之前，收到了噶厦依照磋商决定的正式书面通知。

毛主席的礼品有：特织哈达1件，毛主席画像1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纪念刊1册，天安门彩色照片1帧，伟大祖国照片1套（523张），年画30份，象牙雕球1件，象牙白菜1件，象牙桥1座，象牙笔阁1对，玛瑙瓶1件，墨玉和平鸽1对，黄玉鸟1对，玉帆船1件，景德镇瓷餐具1件（光绪年造），景泰蓝花瓶1对，湘绣挂屏4扇，黄宫缎10疋，红藏袍缎10疋，幻灯机1具（附幻灯片9套）。

送礼行列以军乐为前导，腰鼓队相随。送礼队伍经过

大街时，上万群众夹道观看。到罗布林卡门口，僧俗百官列队欢迎，达赖卫队持枪敬礼。进入厅殿，达赖在宝座下面的凳子前站立，面带笑容欢迎张经武代表。镶着金色框架的毛泽东主席像被抬着送到达赖的左上首时，达赖转身手扶像框注目瞻仰，让记者摄影。随后，毛主席像放置在达赖宝座左上首的桌子上。张经武又以个人身份向达赖双手献了哈达，然后被接引到左边铺设锦缎的高座垫上就座，我们随行人员依次在张经武高座旁就座。坐在我对面的是两个司曹，然后依次是几位噶伦。

送礼结束后，张经武被引进达赖卧室交谈。谈话中达赖祝毛主席身体健康，问内地情况。当张经武谈到希望达赖尽早向中央发电报，对协议表示态度问题时，达赖说，正准备这样做。临走时，达赖送张经武到门口，握手告别。

可是，在国庆节前，西藏地方政府没有向中央发出拥护协议的电文。由于反动亲帝分子的阻挠，噶厦对发电问题进行拖延。阿沛回拉萨后向噶厦报告了签订和平协议的经过，他回答了一些人的质问，批驳了少数反动分子的责难和诬陷，他光明磊落、理直气壮地表示，愿以全体代表的身家性命和财产担保，签订协议完全是为了达赖喇嘛和全藏人民的利益，中央对协议有诚意。接着全藏僧俗官员开大会讨论了两天，同意国庆节前给中央发电报对协议表示拥护。以后，首席噶伦然巴和噶伦厦苏又来说，怕国庆节时间赶不上，内部有分歧，希望推迟几天给中央发电报。

阿沛告诉我，在亚东时，达赖身边的人有“出走派”和“回拉萨派”，主张出走的是索康、夏格巴、帕拉、郎色林、洛桑三旦（达赖三兄），主张回拉萨的有洞波（即噶伦扎西林巴·钦绕旺秋）、仲译钦波（即秘书长）大喇嘛土登洛桑、群丕土丹等。协议签订后，出走派仍然主张达赖出走，认为执行了协议，达赖就名存实亡。亚东会议上辩论了三四天，分歧无法统一，最后不得不借助求神占卜，占卜结果是达赖回拉萨为上策。英美帝国主义又采用 100 万美元收买索康、夏格巴的办法，让他们破坏协议，组织达赖赴美。

国庆节过后，噶厦又写信给张经武，提出在拍发对协议表态的电报以前，要求答复三个问题：一、军政委员会的职权问题，包括达赖的地位和职权问题；二、军队少来问题，包括改编藏军问题；三、全部藏族地区统一问题，包括昌都地区划归西藏地方政府问题，这三个问题，反映了他们搞分裂独立、反对协议的思想。

我随同张经武到噶厦对上述三个问题给予了答复。张经武答复说：军政委员会是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必须有的一个代理机构，西藏军区只是一个军事机关，它与西藏地方政府会经常发生关系，军政委员会可以管理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两方面的事情。人民解放军来藏只是一个军，2 万人左右，驻防江孜、日喀则、阿里、林芝等边防一带，拉萨只驻 4000 人左右。军用粮草不要西藏人民负担，中央用银元购买，其它由内地运输。全部藏族地区统一问题，要由川、甘、滇、青各省藏族人民投票表决，只

要他们赞成即可，但目前初获解放，一切尚未就绪，而且其它藏区解放早，工作进展快，现在还不能谈统一；关于昌都地区，经中央批准即可划归西藏，估计没有什么问题。

噶厦对张经武的答复进行讨论，当讨论到达赖任军政委员会主席时就热闹起来。达赖的座位怎么办？开会仪式怎么进行？达赖是否可以派代表参加会议？军政委员会的决议是不是也按西藏老规矩由噶厦噶伦、司伦逐级呈报批示？讨论了半天，莫衷一是，时间已经不早，就此收场散会，不了了之。

以后，关于就电文中是否写“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一句发生争议，有的说写这一句有刺激，反对写，因此这一问题又搁起来。直到10月24日，达赖才向中央发出拥护17条协议的电报。电文中说：“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自进入拉萨到10月中旬这两个多月里，通过上门拜访和会见，我同30多位上层人士进行过50多次接触，有些是随张经武一起去拜访的。其中有一位是在宗教上具有很高地位和威望的人，就是噶丹池巴·土登滚噶。噶丹池巴是职称，土登滚噶是他的名字。噶丹池巴本意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在噶丹寺讲经的法座，担任噶丹池巴的人就是继承宗喀巴讲经法座的人，即西藏佛教的法王。噶丹池巴的继承方式，不是象活佛死后转世，找个灵童来代替，而是佛教界推举对佛学有高深造诣的人来担任。所以，他在

宗教上具有很高的威信，他担任的噶丹池巴已是第 96 任了。我们见到他时他已 71 岁，但仍童颜鹤发，身体健康。他 13 岁进哲蚌寺学经，由一个普通喇嘛上升为宗教权威。他认为从宗教上说，中央是保护发展西藏佛教的大施主；从政治上说，中央同西藏数百年来就是领导和隶属的关系。宗教者应当爱国。这位噶丹池巴身居药王山上一个矮小陋室内，似被冷落，但他热情接待我们，谈吐风趣。

紧张的气氛直到 9 月 29 日，后续部队一五四团三营和团直属机炮连赶到拉萨，才开始有所好转。

此时，我们接到军部发来的电报：部队翻越藏东北海拔 6000 多米的冷拉山，积雪 1 尺到 3 尺，西坡为陡坡，长达 2 公里，人、马只能顺坡往下滑，非常艰险，骡马损失严重，牺牲 2 人，口鼻流血的人占部队的 2/3。看了电报，大家都非常担心。张国华军长在甘孜时即血压高，经常头痛、失眠，如今带领全军翻越大雪山，吃得消吗？大家心悬千里，东望云天，默默无言。许多人聚集到我房里来，同声高唱《歌唱二郎山》，心里遥念着在冰山雪峰上顽强进军的战友们。

10 月 26 日，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率领的进藏部队抵达拉萨。张、谭和司政部门的同志，脸都晒得黑黝黝的，显得神采奕奕，健康坚实。文工团大多数女同志腿脚浮肿还未消除。西藏地方政府隆重欢迎，开了欢迎大会，部队举行了阅兵入城式。

军部到后，使原来就存在的粮食问题更加严重起来。

噶厦已经知道进藏部队粮食问题不要西藏负担，主要依靠从内地运输，只在西藏用银元购买一部分。可是我几次去噶厦商谈购买粮食问题时，他们总说有困难，或者说明天日子不吉利不能开会，后天礼拜六不办公，大后天某家贵族请客也不办公，大大后天要去罗布林卡朝拜达赖喇嘛也不办公，想方设法拖延日子。事实上是隔岸观火，幸灾乐祸，他们想的是“打不走你们，饿会饿走你们”。

工委和军委开会研究粮食问题，部队自己带的粮食只能维持几天，面临的问题非常严重，我们决定从三个方面设法解决：一、江孜、日喀则、错那宗等地均有粮食，可以动用，部队立即分散，就地解决；二、大力组织牦牛运输，从西康方面日夜加紧运粮；三、抓紧督促噶厦筹措一部分济急，我们按市价用银元购买。阿沛告诉我们，布达拉宫前面仓库储放有五六十年来的积存的粮食 5000 克（1 克约 28 斤），估计除去霉烂不能吃的，可能还有两三千克。

我和陈竞波连着几天去噶厦专门谈粮食问题，把部队分散情况告诉他们，说明拉萨只留 4000 人，每天需要粮食 8000 斤左右，并谈了动用布达拉宫前面仓库里的存粮问题。他们说仓库粮食年代已久，能否食用要送我供给部化验。我们在两天里，督促噶厦将仓库面上和底层的粮食作了化验，化验结果都霉烂变质了，不能食用。

阿沛积极想办法，为部队解决粮食问题。他又提出，要噶厦马上把各寺庙负责人召集来，先行筹措部分粮食，以济眉急，由他担保，寺庙可以借给。

我和陈竞波再次到噶厦交涉，他们仍然强调粮食困难。经我们一再做工作，他们表示将设法筹办。噶厦拨出了拉萨河边一片乱石滩地，由部队开荒生产。这是一场经济仗，更是一场政治仗。指战员们冒着寒风大雪，挥舞铁锹铁镐，掘冻土，挖乱石，拣草根，从11月26日到12月12日的17天中，开荒2300多亩。解放军节衣缩食，开荒生产，在群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不仅没见过，从来也没有听说过，都奔走相告，纷纷来到工地观看。一些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收敛了，“解放军不走，俄也要把他们饿走了”的谣言也消失了。

当然，紧张的粮食问题并不是光依靠开荒生产解决的，噶厦解决了一部分粮食，牦牛队从内地运来了大批粮食，另外通过上层经济统战工作，由藏商从印度购进了一部分大米。部队节衣缩食，终于度过了这道难关。

关于发放布施问题，张经武到达拉萨不久，就告诉噶厦准备给三大寺和其它寺庙喇嘛以及拉萨市内的贫民乞丐发放一次布施，请他们告知寺庙喇嘛和拉萨贫民乞丐人数。噶厦开来一个单子：哲蚌寺8000人，色拉寺6000人，噶丹寺4000人，拉萨市内乞丐500人，市效老弱病残80多人。

西藏历史上五世达赖曾给三大寺规定了常年居住的僧侣人数，即哲蚌寺为7700人，色拉寺为5500人，噶丹寺为3200人。噶厦开列的人数为什么大于历史上的法定人数？而且又都是化零为整呢？我们无从知道，就按这个人数发放。但是我们认为噶厦开列的乞丐500人的数字肯定

小于实际人数，这个数字与拉萨市内乞丐成群、布满街巷的实际情况不符。于是我们决定多准备一些，按 800 人发放布施。

从 10 月 18 日起，到 11 月 11 日止，张经武在拉萨为三大寺、大小昭寺、上下密院、两个藏医学院（学员均为喇嘛）以及拉萨市内的乞丐发放了布施。

发布施金额为：普通喇嘛每人 1 份，1 份为藏银 20 两（折合银元约 2 元），寺内堪布、铁棒喇嘛每人 20 份，达赖喇嘛 1 人为 40 份（在三大寺各发一次），布施的金额比国民党的多。在西藏历史上没有为乞丐发放布施的先例，我们决定给乞丐发布施，每人 1 份，1 份藏银 5 两。

在给喇嘛发布施前，张经武均先同上层喇嘛座谈，各寺庙堪布对中央人民政府的布施非常感激，他们对协议规定尊重西藏宗教信仰自由、达赖喇嘛地位及职权不变、寺庙收入不变表示非常拥护。在三大寺发布施时，虽然有铁棒喇嘛维持秩序，我们还是发现有领过的又回来混入人群再领一次的，甚至有在那个寺庙领过又来到这个寺庙再领一次的。

反动分子害怕我们向贫民乞丐发布施，害怕我们接近劳苦大众。他们造谣说，领了共产党的布施要下地狱，甚至威胁不准领取布施。可是，当我们在拉萨一个广场上向贫民乞丐发布施时，来的人特别多，衣衫槛褛、蓬头垢面的人群，扶老携幼，络绎不绝。人群中有被牵拉着的瞎子，有拄着拐杖的瘸子，还有爬着来的残疾者。他们来到广场后，没有铁棒喇嘛的吆喝，却秩序井然，人们坐在地

上极为安静。我们发现人数众多，又立即多准备了份数。发放的结果，不是 800 人，而是 1500 多人，等于噶厦开列人数的 3 倍多。

(四)

12 月 1 日，从西北经青海进藏的部队（对外称十八军独立支队），在范明率领下抵达拉萨。班禅堪布会议厅部分人员也同时到达。

“独支”到达后，统一领导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组成，工委书记仍为张国华，我担任工委宣传部部长和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开始着手建立这两个部门的组织机构，调配藏、汉族干部，组织干部学习藏语文和党的政策，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各方面条件都很困难，面对的又是一个非常陌生和特殊的环境，一切都需从零开始，只能迈着艰难的步伐去开创。

就新闻宣传来说，先遣支队和军政治部都只有一台 15 瓦的手摇发电机，功率小，电讯联系极为困难，许多新闻稿件发不出去。先遣支队进入拉萨的新闻，在入城后第 4 天还未发出，新华社记者不得不把稿件送到张经武处，通过张经武同中央联系的内部台，用密码直发北京中央办公厅，再转新华总社。这种情况，在战争年代都是罕见的。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好不容易搞到了一台 50 瓦的发电机。

同样，要办报纸，没有铅印机，只能出油印小报。而

当时又没有办地方报纸的条件，我们又不得不暂时出油印《新华电讯》，刊登抄收新华社口语广播的时事消息，供干部阅读。我们在拉萨市委还办了一个油印的藏文《墙报》，很受藏族人民的欢迎。

1951年就要过去，大家都辞旧岁，迎新年。12月28日，我率从北京来的科学工作队，随同张经武和部分进藏干部参观了布达拉宫。1952年1月2日和4日，我带文工团和三营战士演出队，先后去布达拉宫（达赖冬宫）、噶厦、班禅堪厅、噶丹池巴·土登滚噶等处贺新年。达赖见到我们非常高兴，同我们亲切地再三握手，并观看了文工团演出的短小精彩的节目。

1月12日，西藏军区藏语文训练班在仲吉林卡开学。参加学习的有各机关的干部和部队连、排级干部共800多人。以后，有一批经这个藏训班培训出来的汉族干部成为精通藏语文的翻译骨干。

要发展西藏的学校教育，却不象办藏语文训练班那样轻而易举。过去，西藏只有极少数的贵族子弟学校（私塾），没有现代教育。现在要办教育，需从小学开始。即是办小学，也要经过长期的多次酝酿、协商，甚至遭到反对。必须慎重从事，急躁不得。

工委于2月13日和16日两次开会讨论办学问题，决定先以办小学为主，可设中学补修班。初小三年级以前以教藏文为主，可选修汉文；三年级以后同时教藏、汉文。学校必要的教学设备尽可能做到齐全。办学经费主要由中央拨款。

经过与上层人士的酝酿，我们于2月18日召开了“兴办学校”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上层人士50多人，他们纷纷发言，积极拥护办学。他们说，过去我们的子女不得不送到印度大吉岭英国人办的学校读书，花费很大，拉萨能办一所学校太好了。会上决定成立办学筹备委员会，阿沛宣布了筹委会委员名单。

以后，办学筹委会召开了几次会议，确定了租借校址、购运教学仪器、制作桌椅家具、编写和购买教材等事宜。

我们还召集了从大吉岭放假归来的藏族学生，举办晚会，座谈他们在大吉岭学习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

后来，阿沛反映，噶厦对办学问题都表示同意，其中恐怕有文章，噶厦要夺教育领导权，要求学校讲授佛经，增设宗教活动。他认为这样问题就会复杂起来。

这时，确实听到社会上传出对办学提出的各种问题：如学校是否开设“讲经”（指佛经）一课？学生毕业后是否能当喇嘛？办学筹委会开了两次会议讨论这两个问题，认为以后再考虑，目前暂不作出决定。

后来，接到中央电示：“办学校一定要广泛听取上层反映再决定，学生毕业后是否当喇嘛？应根据本人自愿决定。……教材内容，内地的课本只作参考，编审后，征求噶厦同意、备案。”

直到6月，办学筹委会才得以讨论了拉萨小学的开学日期，决定选择藏历的吉日良辰——藏历7月14日。7月，办学筹委会讨论确定了拉萨小学校长、董事会人员名

单。经过艰苦的努力和筹备，8月15日拉萨小学终于开学了，这比原来选定的开学日期提前了一个多月。

藏历新年过后，即公历的3月上旬，拉萨大昭寺前要举行一年一度的传召大法会，工委决定在传召期间给喇嘛发放布施，并成立了发放布施筹备委员会，王其梅为主任，我为副主任。筹委会还吸收三大寺代表及噶厦僧俗官员10多人参加。

我们召开了三大寺堪布座谈会，听取他们介绍过去发布施的情况。然后同筹委会研究决定：今年中央人民政府给每个喇嘛发布施为藏银10两、7两、4两、1两、4钱等几种，布施10两的共37600份，占喇嘛人数的绝大多数。中央这次发的布施金额大大超过以往西藏所发数字。别外还供应砖茶20块，酥油120克（每克7斤），盐20克（每克50斤），还有食碱、大米、烧柴等若干，大号哈达1条。

3月10日，在大昭寺周围分7处发布施，从上午11时一直发到下午3时。我们还带有藏文本《协议》、《人民解放军介绍》、《告喇嘛僧众书》3种宣传品，同时发给喇嘛。晚上，在军区司令部宴请了参加布施工作的三大寺堪布和僧俗官员。

从1月份以来，我们已经获悉拉萨有坏分子在群众和上层人士中进行挑拨，企图发动请愿，反对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工委也曾研究应付突然事件的措施。就在这次传召布施后，又听说三大寺喇嘛曾上山宣誓，并已化装进入拉萨市内，纠舍地痞流氓，密谋骚乱。

这些坏消息，使一些本来就有急躁情绪的干部更加难以忍耐了。我想起张国华有一次向毛泽东反映进藏干部的思想情况时说，一些干部认为在西藏工作象乌龟爬山一样慢。毛泽东说：“我看象乌龟爬还快了。”这就是要大家不能急躁，西藏工作只能慢慢来，对达赖集团一定要耐心地努力地去争取团结。当然，对极少数坚持分裂的坏分子也要给予必要的打击。

3月31日，工委召开噶厦僧俗官员座谈会，讨论《关于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条例草案》。就在此时，噶厦的秘书送来一份所谓“人民代表”的请愿书。这份请愿书是转交给中央代表张经武的，他们还要求张经武接见所谓“人民代表”。请愿书公开反对17条协议，要求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这天我们已获悉三大寺喇嘛下山闹事，发现市内有骚乱迹象。藏军第二代本已出动，准备参加骚乱。

因此，座谈会即转入讨论这个问题：噶厦推说对请愿和骚乱情况不知，无能为力。他们还说，藏军的军火库枪支被盗。张经武严厉指出：第一、噶厦既称无权，不能负责有效制止骚乱，那么当前情况紧迫，噶厦究竟能否维持全市治安？不然，人民解放军有责任维持治安；第二、藏军参加骚乱，噶厦晓不晓得谁是他们的幕后策划者？张经武最后指出，所谓“藏军军火库枪支被盗”的说法，揭穿了即是某些人给这些骚乱分子提供了武器。

会议开得很晚，没有结果。这时，我们已发现有人武装包围中央代表张经武住所和工委驻地的迹象，我军相应地采取了防范措施。当晚，张经武给达赖喇嘛写了第一封

信，紧急通知他，立即制止骚乱。

4月1日，噶厦几位噶伦又来到工委，转达伪人民会议代表请愿书的内容。同时，有三个所谓“人民代表”前来请愿，要求张经武接见。张经武会同全体噶伦接见了他们，对他们的要求给予了驳斥。

这天，拉萨市内情况紧张，商店纷纷关门。工委进行紧急战备动员，令我驻日喀则的炮兵迅即调回拉萨，各部门各自编成战斗序列。晚上，我从工委回来，把宣传部、总务科、卫生处等编成战斗单位，部署了岗哨警戒。

当夜，藏军五六人，爬登阿沛住宅围墙，企图进院，有3人被我守卫战士俘获，其余逃窜。

4月2日，市内情况仍然紧张，布达拉宫对面药王山上有藏军正在修筑工事，一部分藏军在布达拉宫前结队集合。另有一些藏军骑马闯进我藏训班，开了3枪。有3人被我俘获。

4月3日我们获悉，3月31日晚上，反动分子确有发动骚乱的计划，因我在军事上有所戒备，他们的计划未能实现。目前，所谓“人民会议”分子仍在密谋扩大事态，一部分反动分子在市内到处胁迫木工、石工参加所谓“人民会议”。骚乱幕后策划者，为首的是鲁康娃、洛桑扎西、索康等人。

张经武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又接连给达赖喇嘛写了两封信，敦促他下令制止骚乱，追查幕后策划者，将两个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撤职查办。张经武还亲自带着一个翻译两个警卫员，迎着满山荷枪实弹的藏兵，上布达拉宫见

了达赖。

在张经武的坚决要求下，西藏地方政府于4月27日宣布撤销了鲁康娃、洛桑扎西的司曹职务。5月1日，达赖喇嘛发出布告，宣布解散了所谓的“人民会议”。但实际上，这个伪“人民会议”仍在进行隐蔽的活动。

此时，我们先后接到西南局和中央分别于4月2日和4月6日发出的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重要指示。中央指示中指出，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目前还没有全部执行协议的基础，既无物质基础，也无群众基础，也无上层基础。勉强执行，害多利少。因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些让步，目前暂不改编藏军，也不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旧，拖下去，以待一年或两年后确有条件时，再谈这些问题。如果西藏地方政府觉得小学不宜办，则小学也可收场不办。中央强调指出：在西藏要靠两条基本政策。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以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第二条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人民生活不因我军进藏而有所下降。

4月28日，班禅额尔德尼和班禅堪布厅全体人员抵达拉萨。自1923年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不和，班禅逃入内地已近30年了。此次班禅返抵拉萨，对实现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我们和先期抵达拉萨的班禅堪布厅代表同噶厦进行了充分协商，关于恢复班禅固有地位和职权、接收被达赖

集团侵占的原班禅辖区等问题，已经商议妥当。班禅回拉萨后，一切都较顺利。第二天，班禅即去布达拉宫拜会了达赖。6月23日，班禅回到日喀则。

自撤销两个司曹职务、解散伪“人民会议”后，西藏的政治形势大为好转，上层统战工作进一步开展起来。

“五四”期间，我们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宣传 17 条协议和民族团结政策的活动。我们本着协商、自愿的原则，成立了纪念“五四”青年节筹委会、各族青年文化联谊会筹委会、《协议》学习委员会筹委会，先后举行了演讲会、纪念大会、庆祝晚会和球赛等活动，参加各次大会的都有三四百名藏、回、汉族男女青年，其中藏族青年 100 多名，回族（拉萨）青年 100 多名。这些藏族青年虽然都是贵族子女，但青年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思想活跃，因此各种活动进行得相当热烈，收到了良好效果。在 5 月 4 日的庆祝大会上，还宣布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藏工作委员会的成立。

与此同时，我们在机关中也成立了《协议》学习委员会，规定了学习纪律、学习制度和学习要求，并以团支部为单位组织学习讲演比赛。在庆祝《协议》签订 1 周年前夕，还进行了学习测验。

《协议》签订 1 周年纪念日很快就要到来。工委决定由西藏地方政府出面主持纪念大会和晚宴。

经过紧张筹备，5 月 23 日上午 10 时纪念大会开始。张经武、张国华讲话后，索康和班禅堪厅代表计晋美分别讲了话，这是达赖集团和班禅集团代表第一次同台讲话。

阿沛以西藏首席和谈代表身份讲了话。达赖和班禅未参加庆祝大会，由噶厦和班禅堪厅代表分别宣读了给毛泽东主席的致敬电。大会开得热烈隆重。

晚上，西藏地方政府举行庆祝宴会，宴会自始至终充满团结气氛。

7月下旬，工委决定组织“西藏致敬团”和“西藏参观团”，赴京向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致敬并参加国庆观礼和到各地参观。这是西藏和平解放后第一次派到内地去的致敬、参观团体，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两方面人员。为了做好团结工作，组织好这次活动，我们同噶厦和班禅堪厅双方经过了反复协商，确定了致敬团和参观团的团长、副团长以及团员名单。

7月25日，工委决定由我和张向明分别带领致敬团和参观团去北京。

一条漫长的旅程，一项新的任务，又摆在我的面前。

8月7日，我们一行30余人从拉萨出发。一路上风风雨雨，艰苦跋涉，到9月29日抵达北京。

在我完成陪同西藏致敬团和参观团参加国庆观礼和到内地参观的任务后，由于身体原因，组织上决定调我到内地工作。我想念西藏，但未能再回到高原。

晋察冀边区党组织在 战斗中成长壮大

刘 澜 涛

晋察冀边区党组织是在抗战的猛烈炮火中发展壮大的。它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坚持根据地建设，在八年抗战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领导边区人民战斗的坚强堡垒。

晋察冀边区党的建设，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抗战爆发至1939年1月初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后来改称晋察冀分局）成立。第二个时期，是从1939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召开党代会以后至1940年底。第三个时期，是从1941年至1943年底。这一时期，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也是晋察冀边区党经受严峻考验而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更加富有战斗力的时期。第四个时期，是从1944年初至1945年9月日本无条件投降。

一、根据抗战需要迅猛发展党员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向全国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长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年9月，八路军奉命开赴前线。9月25日，我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于平型关一带歼敌坂垣师团所部1000余人。此次大捷，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振奋了全国军民。9月26日，邓小平同志在五台东冶镇向赵振声（即李葆华）传达中共北方局决定，由王平、赵振声、刘秀峰组建中共晋察冀省委，同八路军一起，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同年10月下旬，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由林彪带领，经吕梁山南下，聂荣臻奉命率领约3000人留驻五台地区，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当时参加五台地区开辟工作的杨成武率领独立团，连续收复广灵、蔚县、涞源、易县、阳原等县，在这里成立了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以赵尔陆为首的党政工作团在晋东北地区开辟抗战新局面，成立了第二军分区。王平等领导的地方党工作团和刘云彪的骑兵团，以阜平为中心，在曲阳、唐县、完县、行唐等地组织起若干支义勇军和游击队，使北岳中心地区的局面迅速打开，成立了第三军分区。周建屏、刘道生率领的工作团和小部队，在地方党的配合支持下，大力扩军，建立了“平山团”和多支游

击队，在正太路以北的山地迅速开辟了晋察冀南部地区，成立了第四军分区。随后晋察冀省委便在晋察冀军区所属四个军分区范围内分别建立了中共晋察冀第一至第四分区特别委员会（后改称地委）。至此，在平绥、正太、同蒲、平汉四条铁路干线中间区域逐步形成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宣告成立，聂荣臻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成立不久，中共晋察冀省委在阜平正式成立，黄敬任省委书记，赵振声任组织部长，鲁贲任宣传部长，王平任军事部长，刘秀峰任民运部长。

中共晋察冀省委成立前后，根据敌后抗战形势急剧发展的需要，决定采取放手发展党的方针，特别是在工农基本群众中要大刀阔斧地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同时，对抗战前因遭敌人残酷镇压而失掉党的关系的一些同志要迅速恢复他们党的关系。因为他们过去在群众中有影响，通过他们发展党的组织，进展会更顺利。这样，在晋察冀边区所属的县、区的党组织，差不多都先后恢复和建立起来，其中象平山、阜平、行唐、灵寿、曲阳、完县以及察南的蔚县、晋东北的定襄、五台等县，在抗战前就有地下党斗争，所有保存下来的一些党的骨干力量，这时便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他们使党员和党组织成倍、成十倍、以至几十倍地增加。以平山为例，抗战爆发时，有确切组织关系的党员只有几十人，而在大发展的方针下，到了1938年3月底，党员数量就猛增到2984名，建立支部

256个，其中小党区一个星期就发展了500多名新党员。由于党的大发展和各项抗日工作迅速展开，党政军民等各部门深感干部奇缺。针对这种情况，晋察冀省委决定举办党的训练班（即省委党校），由赵振声同志兼任校长，重点培养训练党的县区级干部；晋察冀军区也开办了军区干部学校，主要训练营连级干部；接着一些地、县委也开办了训练区村级干部的训练班，或短期的半脱产的轮训班，训练基层党支部的支委和党员。这一系列的党校或党训班的开办，对当时加强党的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游击队、自卫军、游击军、义勇军纷纷出现。有的是在我党领导或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有的是地主武装；另外有的是土匪武装，他们各自打着抗日保家的旗号，自称“司令”或“主任”。其中有的是为了抗日，有的却不是真心抗日，而是想乘机捞一把。在这种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我们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对真正抗日的、有抗日愿望的，采取欢迎、支持、团结的政策；对那些打着抗日旗号实际不真心抗日的武装，争取他们站到真正抗日的立场上来，尽可能做些对抗日有利的事情；对那些欺压群众、鱼肉人民的土匪队伍或顽固派队伍，屡次教育争取无效的，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予以打击。党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是很慎重的、坚定的，效果也是很好的。因此使党的组织在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得到了新的发展、壮大。

正因为 we 坚定不移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了党的影响，争取了广大群众，争取了一切抗日力量的

合作，在各地县区政府初步建立和工农妇青等群众团体广泛建立的基础上，乃于1938年1月10日至15日，在阜平城举行了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民代表大会。会议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讨论并通过了政治、军事、财政、文教、司法、民运等各项决议案，选举产生了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即边区政府），宋劭文、胡仁奎当选为正副主任委员。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经阎锡山转报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成为合法的政府。它是华北敌后最早建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它的成立标志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对支持华北敌后抗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主席团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称之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模范区”。

中共晋察冀省委研究分析了党在根据地初创阶段中的情况，于1938年4月在五台金刚库召开了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以总结前期党的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彭真、聂荣臻同志分别做了形势和方针任务的报告。大会指出：目前边区党的一个最主要的任务，是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和健全党的领导。并对党的整顿做了具体规定，其中主要的有：（1）健全党的领导机关及其领导作用，确定报告、检查、转移组织关系、介绍党员和开除党籍、恢复党籍和重新入党等各项制度；（2）党员的重新登记与限期整理；（3）审查与鉴定干部，规定区党委审查到县级，地委审查到区级，县委审查到支部，对于被发现的叛徒和自首分

子，必须洗刷和调动；(4) 根据中央及北方局的决定，重新审查恢复关系的党员；(5) 开办党的训练班及规定党员教育的基本材料，采取多种方式轮训党员。晋察冀区党委所属各级党组织，根据此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和规定，先后进行了整顿。结果党的各项制度比较健全了，党的领导作用和战斗力得到进一步的增强，党员的素质有所提高，组织观念和纪律性有所加强。少数叛变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被洗刷，党的组织得到了进一步的纯洁。但是，在组织整顿中，有些党委又发生了一些新问题，如洗刷面过宽，把一些不应洗刷的人也洗刷了。

从八路军挺进五台山区，到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1年多时间里，在广泛的游击战争中，给了敌人一次又一次打击，使敌人在平津和华北占领区的统治遭到严重的威胁。因此，敌人在进攻徐州和武汉的同时，先后抽调数万兵力，对我新生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两次“围攻”，妄图摧垮边区，以巩固其华北占领区，放手进攻徐州和武汉。晋察冀边区刚刚建起来的党组织，基本上经受住了这两次敌人疯狂进攻的考验，但也有一些区村党组织和党员表现意志不够坚强，其中有的擅自离开战斗岗位，有的村支部垮掉了，有的党员跑散了，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这些现象引起了中共晋察冀省委的严重关切，深感前一段整顿党组织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有些问题尚未得到很好解决，认识到巩固党是一项长期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而需要进行全面的巩固。

二、为进一步巩固党纯洁党而斗争

1939年1月至1940年底，是晋察冀党组织进一步巩固的时期。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根据地的领导，根据党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下称北方分局）于1939年1月初在平山蛟潭庄成立，彭真、聂荣臻、贺龙、关向应等同志为委员，彭真同志任书记。同月，北方分局召开了党代表大会，传达和贯彻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总结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立的经验，确定了党在抗战相持阶段中的基本方针和任务。大会特别强调了加强党的领导和根据地建设。同年3月，北方分局发出了《关于晋察冀边区党委组成的通知》，决定以刘澜涛、赵振声、林铁、舒同、刘秀峰、赵尔陆、刘杰、栗再温等同志组成中共晋察冀边区执行委员会（后改中共北岳区党委），我和赵振声、林铁为常委，由我任书记。

同年8月底，晋察冀边区党委召开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大会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以及北方分局全面巩固党的指示的精神，认真讨论了晋察冀前期党的建设情况和问题，认为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中所指出的，组织上巩固党成为我们今天极端严重的任务，是非常及时、非常重要的。虽然晋察冀边区党委从第一次党代会以来，对巩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纠正了党在根据地创建初期大发展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党的整顿工作上也是存在问题的。有的地方对

整顿党的工作的深刻意义认识不够，抓得不紧，进展缓慢；有的则在整顿中出现了新的偏差，最突出的是洗刷面太宽，洗刷掉的人数太多。如有一个县原有 1800 名党员，在整顿组织中，一下洗刷得只剩 506 人，后经过晋察冀区党委发现，进行重新审查，恢复到 900 人。在一些盲目洗刷的地方，曾引起了个别支部的不安，党员思想发生恐慌、混乱，有的还搞成了冤案。这对党的巩固也是不利的。同年 11 月至 12 月间，北方分局在曲阳青山村召开组织工作会议（亦称“青山会议”），赵振声同志作了《关于边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彭真、贺龙、黄敬、马辉之等同志发了言，关向应同志作了会议总结。会议决定：目前边区党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党的组织，一般地停止发展，并克服过去发展党的工作中的不平衡现象。当时晋察冀边区的地、县、区的党委均已建立起来，农村党支部已达边区农村的 52%，67% 的行政村都有党的组织。边区的党员猛增至 20 余万人，其中冀中区就有党员 9 万人左右，为 1938 年 4 月冀中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时 8000 余名党员的 11 倍。由此可见，晋察冀边区从抗战初期至北方分局成立以后的 1 年多时间里，党经历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总的说来，党的这个大发展是符合客观需要的，方针是正确的，在其发展中其主流也是好的，这是需要肯定的。但是在党的大发展中，个别县区，有些党组织在发展党员中出现“拉夫”现象，许多党员就是登记进来的，并未经过应有的人党手续，因而有的叛徒、阶级异己分子也乘机混入党内，个别县区的领导权落到了他们手里，一部分村支部

被混进党内来的阶级异己分子、流氓、地痞、狗腿子所把持，他们继续在群众中为非作歹，破坏党的声誉。另外，边区有的地方党组织，对发展党的工作不重视，或者还沿用抗战前白区党的工作方式，对发展党过分谨慎，不敢在基本群众中放手发展那些具备入党条件的同志入党，致使那些地方党的力量较弱，工作跟不上抗战的发展形势。“青山会议”检查了各地党组织对北方分局在是年初发布的全面巩固党的决定执行情况，继续要求各地遵照先审查、鉴定县区级党组织，后整顿党支部的两步走的办法，把巩固党的工作抓紧抓好。

经过整顿，一些混进党内的叛徒、阶级异己分子被洗刷了，一些根本不够党员条件、经过教育等待仍无转变的，也洗刷掉了，党的组织成份比较纯洁了；在整顿中，还加强了对党员的轮训，加强党的思想教育和纪律教育，党员的觉悟有了明显的提高，党的战斗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在反“围攻”、反“扫荡”的激烈战斗中，不论军队和地方，共产党员一般都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他们英勇作战，涌现出来的战斗英雄和模范层出不穷。在1940年的百团大战中，边区子弟兵和共产党员们，前仆后继，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据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发表的百团大战战斗统计公报，总计大小战斗535次，克复据点61个，毙伤日伪军12500多人，生俘日伪军1100多人。我八路军牺牲与负伤3900多人，某团团长李和辉同志就是在百团大战中壮烈牺牲的。而象李和辉同志一样的战斗英雄人物，有许多是共产党员，其中大部分是参军不过一两年的

新战士。他们在党的教育下，热爱祖国，热爱边区，热爱人民，把热血洒在了晋察冀的大地上。在边区的各项建设中，在边区的民主选举运动中，在“双十纲领”的宣传和贯彻中，在壮大人民子弟兵的参军入伍热潮中，在历年的生产运动和救灾活动中，经过了党的整顿、训练、教育的共产党员，也都出色地站在各项工作和斗争的前列，这是有口皆碑的。在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晋察冀党组织对提高共产党员的文化素质是相当重视的。1939年党中央做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以后尤其如此。1940年北方分局把知识分子政策列入了《双十纲领》条文之中，彭真同志在《关于我们的目前施政纲领》一文中指出：“我们始终保护并培养广大的知识分子，我们尊重青年知识分子的小学教员，而力求其地位的提高与生活的改善，不遗余力地保护他们；我们同样尊重和爱护学者与专门人才，主张给以礼遇优待。”因此，不仅使边区的知识分子踊跃地参加了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而且沦陷区的青年学生、专门人才和大学教授也纷纷来到边区参加抗战。其中许多知识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骨干或领导干部，受到信任和重用。1939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央对晋察冀工作的指示》中就曾指出：晋察冀各方面的工作均有很大的成绩，堪称华北党的模范。在党中央的鼓励和指示下，晋察冀边区的党在敌后斗争中和根据地的建设中以及党本身的建设中，更加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奋勇前进！

三、党在艰难困苦中锻炼得更坚强

1941年至1943年冬，抗战仍处在相持阶段中，这个时期也是敌后抗战最困难最残酷的时期。1941年1月下旬，根据中央决定，彭真同志离开晋察冀边区，赴延安参加“七大”。彭真离开期间，由聂荣臻兼代北方分局书记，我任副书记仍兼北岳区党委书记。中共北方分局改称中共晋察冀分局。194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重新决定了晋察冀分局及军区主要工作人员：聂荣臻、程子华、刘澜涛、肖克、杜理卿、赵振声、刘仁为分局委员，聂荣臻为书记，程子华和我为副书记，聂荣臻赴延安参加“七大”期间，程子华代理书记。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克为副司令员，程子华和我为副政治委员。聂荣臻赴延安期间，肖克代理司令员，程子华代理政治委员，同时决定北岳、冀中两区党委取消，两区工作集中于分局。此时，分局本身组织机构作了以下变动：组织部由赵振声任部长，刘仁、林铁为副部长，宣传部由我兼部长，胡锡奎为副部长，姚依林为秘书长。

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政府原采取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日军占领武汉以后，改成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汪精卫在日本帝国主义羽翼下在南京成立汉奸伪国民政府。“曲线救国”的滥调一时甚嚣尘上，国民党反动派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进攻日益加紧。与此同时，日本侵略军对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

进攻更频繁、更疯狂。从1941年初到1942年底，敌人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所谓“总力战”，即以军事上的残酷“扫荡”、分割、封锁与烧杀，经济上的疯狂掠夺、封锁与破坏以及政治上特别是思想上的欺骗、宣传，妄图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摧垮我们，巩固它在华北占领区的统治，进一步在华北搜刮人力物力财力，支持它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在根据地缩小、对敌斗争更为残酷和复杂的形势下，中共北岳区党委（晋察冀区党委于1941年改称北岳区党委）于1943年1月下旬在平山温塘召开了北岳区党委扩大干部会议（即“温塘会议”），由我作了题为《一九四二年对敌斗争的估计和一九四三年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提出1943年北岳区的基本任务，就是进一步巩固我们的根据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北岳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半年的英勇奋斗，共收复和开辟了1600个村庄，建立了多块游击根据地和隐蔽根据地。这些地带的斗争是很隐蔽和复杂的。我们采用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方式，进行公开、合法的斗争，许多人名义上是敌人的村长、保长，实际上是我们的干部，他们宣传并执行抗日政策，配合边区军民打击敌人，扩大边区的影响，做得很出色。在这些干部中也有被敌发觉惨遭拷打的，但他们始终立场坚定，只字不吐，直至光荣牺牲。1943年秋季，敌人拼凑了4万多日伪军，对我北岳区发动了空前残酷的“毁灭性扫荡”，反复寻找我主力部队决战，妄图搞垮我主力部队和党政军民领导机关，施行穷凶极恶的“三光”

政策（抢光、杀光、烧光），惨绝人寰。在长达3个月的反“扫荡”中，边区军民广泛地开展游击战、地雷战、麻雀战，到处打击敌人，使敌人防不胜防，寸步难行。敌人不断遭到我军民打击，伤亡重大，终于被迫窜回它的据点；敌军在“扫荡”中虽然新建了一些据点，但我们在其它边沿地带和封锁沟外地区却逼走了敌人许多据点，使得一度缩小了的根据地又扩大了，并开辟了许多新的抗日村。到1943年底，北岳区军民共收复和开辟了2000多个村庄，并在此基础上先后建立了5个联合县。

1941年秋季和1943年秋季敌人发动的两次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对晋察冀边区是两次极其严峻的考验，也是对边区党的建设的严重挑战。但尽管敌人如此凶残和狡猾，我们的党仍然坚定地战斗在边区。哪里有我们的党组织和党员，哪里就有群众密切配合边区八路军进行着的如火如荼的游击战争。在地雷战、麻雀战中，战斗英雄（如邓世军）、爆炸英雄（如李勇）、神枪手（如李殿冰）、拥军模范（如戎冠秀）层出不穷。这些共产党人的战斗精神和优良品德，成为边区人民一致歌颂和学习的榜样。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党的整风运动的展开和深入对思想上作风上巩固党和提高党的战斗力起了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共中央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北岳区党委于1942年6月就进行了布置。7月1日，聂荣臻同志发表《全面开展“三风”的学习和检查》的重要文章，指出：我们要一面学习，一面工作，一面检查。从此，晋察冀边区的整风运动就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起来。北岳区的

整风学习委员会迅速成立，我任学委会主任，胡锡奎任副主任。这次学习运动是边区学习的新突破，从边区领导到一般干部都投入了这一学习热潮。学习是逐步深入的，由学习文件，领会精神实质，进而联系实际，联系思想，联系工作，实事求是，开展诚恳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并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改进工作和真正的团结之目的。在干部问题上，我们一贯坚持搞“五湖四海”，强调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的团结，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强调在干部的选择、使用和培养上注意德才兼备，让他们在斗争中锻炼成长；我们也强调爱护干部，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采取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不搞一棍子打死，只要他们认识了，改了，就继续信任和使用他们。

在这期间，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在平山寨北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亦称“寨北会议”），着重总结了边区反“蚕食”斗争的经验教训，以整风的精神，批评了对敌斗争中各种错误倾向和主力部队中忽视游击战争、坐等打大仗的观点；确定了以武装斗争为核心，配合各种斗争，向敌人开展全面攻势，变游击区为根据地，变敌占区为游击区，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伸展的方针。为此，在组织上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以使这个方针顺利地贯彻执行。此次会议以后，北岳区主力部队以1/3到1/2的兵力执行“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任务，逐渐恢复和开辟扩大根据地；冀中根据地的恢复工作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冀东，我党我军也有了新的发展。

与此同时，在贯彻党中央“精兵简政”、“一元化领导”

等指示中，北岳区党委还发出了《关于全面巩固组织的决定》，规定1943年第一季度的中心任务是全面巩固组织工作，包括党政军民各项组织的整顿和巩固。这次整顿的重点放在区、村两级。同年8月上旬，北岳区党委召开了组织宣传工作会议，总结了6年来敌后建党的经验，确定了今后加强思想上组织上建党工作的任务。林铁同志在会上作了《组织上巩固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这次会议，对北岳区的整风运动的进一步深入、精兵简政以及党组织的全面巩固，都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四、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不断 巩固党，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

1944年至1945年9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为边区党的建设的第四个时期。这个时期的前一段，边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继续深入整风，从组织上、思想上、作风上进一步巩固党，使党在扩大解放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及为迎接大反攻、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斗争中，更加发挥它的战斗堡垒作用。

1944年初，晋察冀分局作了《关于加强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县以上党委都要成立整风委员会，在全党造成普遍深入整风的热潮。同年秋季，晋察冀分局在阜平柏崖村召开了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主要内容是以整风精神总结7年来晋察冀边区的工作。与此同时，晋察冀分局在年初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由邓拓主编，全书约50万

字。这是我国最早出版的一部《毛泽东选集》，它对边区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 还要特别提出的是：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战特别是敌后根据地抗战的形势的迅速发展，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晋察冀分局在党的建设中，将分局原北岳区党委所属范围划分为冀晋、冀察两个区党委，由王平任冀晋区党委书记，刘道生任冀察区党委书记；同时，恢复冀中区党委，林铁任书记，将冀热边特委改为冀热辽区党委，由李运昌兼任书记。特别把城市工作提到了极重要的地位。边区各地区，从1944年起，进一步加强了对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县以上党委建立了城工部和敌工部，靠近交通要道和敌占城市的区委和支部都设立了敌工委员。按照中央要求，他们在党委和上级城市工作部领导下，专门管理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不兼其它任务。其负责干部应根据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当前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的原则来配备，要真正能负责指导争取城市和交通要道千百万群众，瓦解伪军伪警，以准备武装起义的艰巨工作。晋察冀分局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党重视城市工作，加强对城市的宣传，揭露国民党的欺骗，做好城市中的组织工作。同时，根据中央指示，把“满洲”工作的开展当成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在分局、冀中区党委和冀热辽区党委各组一个“满洲”工作委员会，负责动员和领导一切可能的力量开展“满洲”工作。这是当时边区党的建设中的一项重大任务。1945年4月12日，晋察冀分局给各区党委发出《关于积极配合苏联作战的准备工作的

指示》，指出4月5日苏联废除苏日中立条约，表示苏联要参加远东战争，估计苏日战争爆发时期不远，远东问题将发生重大变化。这个指示和《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把边区党的建设推上了一个新的斗争阶段。这一段时间的形势发展非常迅速，在这些指示发出不久，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9日，毛泽东同志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10日，晋察冀分局、晋察冀军区根据党中央指示和总部命令，向各区党委、二级军区发布反攻命令：以正规部队进攻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以地方游击队、民兵攻取小城市与零星据点。8月12日，贺龙、聂荣臻、吕正操、李运昌等部分头向绥远、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迅速进军，配合苏蒙军队作战。晋察冀各路反攻大军，分别逼近天津、北平、张家口、塘沽、保定、石家庄近郊，准备对敌展开猛烈进攻。后来由于蒋介石阻止我军反攻，竟发布让伪军“维持地方治安”的命令，斗争形势急剧变化。8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我军应改变以主力部队夺取大城市的方针，应以相当兵力在民兵配合下，继续围困城市，以主力部队转向着重夺取中小城市及广大农村，扩大与巩固解放区，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军委的新的斗争方针，及时调整了反攻部署，除挺进东北、热河和察哈尔省方面作战任务的部队仍按原计划行动外，要各区主力部队从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唐山、太原等大城市周围转移，立即回师内地和

解放区边缘，攻克日伪占据的中小城镇。同时，要求各区党委在新解放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清算复仇斗争和减租减息运动，发展地方武装，把新区变成保卫人民胜利果实和制止内战的新基地。

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撤消北方局，分别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察冀中央局。聂荣臻、程子华、刘澜涛、赵振声、肖克、罗瑞卿、刘仁、许建国、胡锡奎、朱良才、成仿吾、赵尔陆、李运昌、詹才芳14人为晋察冀中央局委员，聂荣臻、程子华、刘澜涛、赵振声、肖克、罗瑞卿6人为常委，聂荣臻为中央局书记，程子华、刘澜涛为副书记。1945年8月23日，我军解放北疆名城伪蒙疆自治政府所在地张家口。9月10日，晋察冀中央局在张家口正式成立。

在八年抗战中，晋察冀的党组织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大发展，整顿巩固、全面巩固和整风运动，始终坚持在抗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中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从而更好地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使晋察冀边区的党成为打败日本侵略军的坚强战斗堡垒。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孔从洲*

形势逼人

西安事变前夕，我已离开炮兵团在十七路军警备第二旅任旅长兼任西安城防司令，担负西安防区的城防任务。当时杨虎城先生仍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任十七路军总指挥。

这个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扩大，国难日益深重，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在此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投降媚外的蒋介石，却仍违背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继续坚持“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强逼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率东北军、西北军进攻陕北红军，镇压爱国进步力量，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

杨虎城将军早同中国共产党及工农红军建立了联系，

* 孔从洲系杨虎城部警备二旅旅长，西安事变时担任西安城防司令，是西安事变的重要见证人之一。

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我与杨先生长期相处，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杨先生与张学良将军，在国家民族危亡的重要关头，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促进国内和平与团结抗日局面的实现，决不是偶然的。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为国家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自我牺牲精神，永远值得人们钦敬。正象周恩来同志以后所指出的：“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介石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从人民公意逼成的。”“张、杨两将军是大有功于抗战事业的。”^①他们是值得人们崇敬的“千古功臣”。

1936年初冬的一天，杨先生把我叫到他的西安新城绥靖公署的住处，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

从他在谈话时的神情来看，心情是十分沉重的。这次谈话的内容比较广泛，主要有三个部分。首先回顾我们这个部队的历史。他从1924年我参加安边军事教导队起，直到眼前，提纲挈领地进述了一遍。他说：“现在日军步步紧逼，在民族危亡空前严重的形势下，蒋介石还专程从洛阳飞往太原安抚闫锡山，继又亲自飞往济南会晤韩复榘，并且还通过韩向宋哲元转达他的所谓‘剿共’方针。与此同时，南京方面张群和日本大使川樾茂进行了多次会见，高宗武和日本总领事须磨也接触频繁；据我得到的情报，驻

^① 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举行“双十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摘录）》，1946年12月13日《解放日报》。

东京的许世英大使和有田外相也进行了密谈。蒋介石自以为经过这些对内、对外的周旋以后，所剩下的只是最后的一次‘围剿’了。他的‘安内’大业很快就要完成了。最近，蒋介石大批高级军政大员要来，还准备调集他的嫡系部队约30万大军来西北，要在西安扩建飞机场，还要把刚刚从国外买回来的大批最新式飞机集中到这边来。花费这么大的力量，干什么？还不是为了用来向陕北的红军大举进攻吗？不仅如此，还听说蒋介石把什么前敌总司令哪，总预备队司令、副司令哪都内定了。现在他一再逼我们和红军开战，他满以为两个星期，最多一个月时间就可以消灭全部红军，就可以胜利凯旋了。看来，目前的形势日益严峻，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又说：“在我看来，抗日，国家有前途，大家有出路；打内战，大家完蛋，同归于尽。要抗日，就得停止内战。逼咱们打内战，咱们不干，坚决反对！”

最后，杨先生又谈到十七路军的处境和前途。他说：“民国初年，袁世凯以剿办白朗（亦称‘白狼’）为名，派陆建章率北洋军阀入陕。结果，对白朗倒没有怎么样，却把张凤 赶下台去，消灭了张凤翔原来参加辛亥革命起义的部队。蒋介石仿效袁世凯的故伎，以他的嫡系部队，乘尾追堵截红军的机会，进入四川、贵州，吃掉了不少杂牌军队；这一次蒋介石调集重兵到西北来，对红军进行‘围剿’，究竟能发生多大作用，我看很成问题。但对他的大军压境，企图一石三鸟的用心，不可不防。我们这么一点力量，所以能够存在下来，一是‘九一八’以来，蒋介石内

外交困，没有机会对我们下手；二是我们扎根自己家里，本乡本土的，除部队外，还有地方力量可以依托；三是我们北面有共产党、红军，蒋介石不能不有所顾虑，他怕搞得不好，会把我们逼上梁山。现在蒋介石已经抹下脸来，对外不惜任何屈辱，对内不顾一切舆论，要对共产党作孤注一掷的‘进剿’，大批中央军进入陕西之后，一纸命令，甚至几句话，就会把我们和东北军调到河南、安徽那些地方，三天一改编，两天一归并，很快就会被肢解消灭。你们必须注意，提高警惕，不要认为蒋介石的目的只是为了对付共产党，要看到这里头暗藏着蒋介石排除异己的祸心。现在，我们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你务必要掌握好部队，以防万一。东北军的命运，有和我们相同之点。张汉卿是可以合作共事的。我和张先生已有密切联系，我们总要想个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办法。至于我们同北边的关系，你可能也知道一些，千万要严守秘密。”

我听了杨先生这一席话，既感到事态的严重，又明确了整个的形势。我跟杨先生多年，深知他沉稳持重。他平日沉默寡言，但观察敏锐，分析精粹。听过他这次发自肺腑的谈话，我对蒋介石阴谋诡计的面目认识更清，对杨先生的意图领悟更深，从此就更抓紧了部队的整顿和战备训练工作。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36年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偕宋美龄飞往西安，部署东北军和西北军（十七路军）对红军作战；29日转道洛阳，以避寿为名住了一个月，部署中央军及军阀马鸿逵部队进攻红军。12月4日，蒋介石又到了西安，住在临潼华清池。他已觉察东北军、西北军官兵反对内战。张学良在洛阳曾经向他陈述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性，再次呼吁停战，遭到他的斥责。这次一到西安，就急急忙忙地分别找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谈话，要他们服从命令，继续“剿共”。西安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蒋介石准备在陕召开西北“剿共”会议，蒋系高级将领云集西安，准备调集嫡系主力部队约30万人陆续入陕，大举进攻红军。蒋介石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驻前方指挥“督剿”，樊松甫、万耀煌为总预备队司令、副司令。新的“剿共”大战迫在眉睫，如矢在弦。

12月7日晚上，杨先生又叫我到新城绥靖公署去。我一走进他的房间，就看到他正在房里来回踱步，两眉微蹙，显得心事重重。我轻轻说了一声：“主任，我来了。”他嗯了一声，停止了脚步，望了望我，便指着沙发说：“你来啦，好，好，坐下！”说着，他便在我旁边的沙发上坐下，

然后侧过身子问我：“部队的思想和训练情况怎么样？”我把部队的情况讲过后，他特别强调要我抓紧好夜间训练。随后，他又问道：“现在中央军在西安有多少部队，都住在什么地方，西安市区的交通要道警戒所需要的兵力，这些情况你都清楚吗？”

当时，我对杨先生突然提出的这一连串问题，毫无思想准备，一时也弄不清楚他为什么提出这些问题。以后我方晓得，这天张学良将军曾约他到官邸去商量停止内战的办法。自蒋介石来到西安，张、杨已经多次劝蒋放弃打内战的政策，向他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关系国家民族的存亡，也是全国军民的共同心愿，都遭蒋介石拒绝。这天张先生主张再去临潼劝蒋一次，蒋再不听，就“先礼后兵”，也算对得起他。杨先生本不赞成这个办法，他认为蒋介石是个死不回头的顽固家伙，哪能劝得过来。因张坚持这样做，杨只得答应，并且约定次日上午分别前去见蒋。杨虽接受了张的意见，但预料到劝蒋停止内战是无望的。这时他一面对见蒋的事预作准备，考虑自己应持的态度和措词，以免引起蒋介石的不满或猜疑；同时加紧部队的应变准备，以便随时能够投入捉蒋的行动。当时听了杨的问话，我迟疑了一下才回答说：“这些情况，有的掌握了，有的还不太清楚。”他对我的回答很不满意。说：“你这个城防司令是干什么的？你负责城防，不掌握城防的具体情况行吗？”我看他情绪特别急躁，和往常大不一样，就连忙补充说：“中央军在西安驻有宪兵团、公安总队、交警总队、保安团，这些都是公开的单位，情况我都掌握了。至

于那些没有公开的特务系统，有的还不十分清楚。”杨先生又追问道：“公开的都住在哪条街、哪些巷子？”我说：“西安的巷子很多，他们住的那些比较大的巷子，我能说得出来，住的那些小的巷子，我一下还……”没等我说完，杨先生截住我的话，略带几分不满的口气说：“当然啰，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北大街，不用你说，我也知道，我要知道的是：他们是什么部队，什么番号，都住在什么地方，哪条街、哪个巷子里的哪些院子。这些都必须搞得一清二楚，不能有半点含糊。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我点了点头说：“听明白了！”当时我领会杨先生的意图是，对中央军必须提高警惕，要准备随时采取防范措施，以免尔后遇事被动。于是，我便对杨先生说：“这几天我们部队要在城里连续进行几次夜间演习，通过演习，我保证很快把中央军的驻地、番号摸得清清楚楚，请主任放心！”这时，杨先生脸上微现喜色，高兴地说：“那好，抓紧时间，赶快去准备吧！”并叮咛说：“演习的时候，既要闹清中央军在西安城里驻扎的具体情况，又不要影响老百姓的休息，务必悄悄的进行，注意保持市内的平静。”

根据杨先生的指示，我回到司令部后，立即召开了连以上军官会议，部署了夜间演习任务。在会议上，除将杨先生对演习指示精神进行了传达外，并阐述了这次演习的目的和要求，明确了各部队的演习地区范围。最后向到会干部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演习部队必须摸清各地区中央军警宪特的实力和具体分布情况；二、演习地区内中央军驻地有几条街道、几个巷口以及封锁这些街道、巷口所需

要使用的兵力；三、部队行动要静肃，保持市面的平静，不得惊动市民，不要影响老百姓的休息；四、要严守机密。

会议刚刚结束，杨先生来电话：“命令演习从十一点钟开始！”放下电话后，我一面让参加会议的干部暂时留下待命，一面急忙赶到新城杨先生的住室汇报了演习部署情况，请示他对演习还有什么指示。他目光注视着我，严肃而坚决的说：“你们按中央军警宪特驻地配置兵力，他们有一个营，你就放一个营；他们有一个团，你也放一个团。分区演习，占领位置。”他还反复交待，演习部队必须严格遵守四条纪律：第一，对东北军千万别发生误会；第二、严禁走火；第三，部队行动中，如遇中央军巡逻队问起来，你们就说是进行夜间训练，是例行的演习；第四、要严格保密，不能走露半点风声。

回到司令部会议室，我再次传达了杨先生的指示，并命令参加会议的军官，必须以身作则，严格要求部队，演习结束及时上报，情况务必准确、具体。

凌晨5点，东方还没有透露曙光时，“夜间演习”结束了。操劳一个通宵，士兵们回到营地休息，司令部的参谋却更加忙碌起来。他们根据各个演习部队的报告，把中央军以及东北军在西安城内外的兵力、驻扎位置，详尽而又准确地标示在一份西安市区图上。

12月8日，又整整地忙碌了一天。早饭后我便亲自带领参谋人员和标好的地图，几乎跑遍了西安市区的各个角落。对敌方驻地、兵力等一一予以核对，同时察看了钟

楼、鼓楼等制高点及敌人主要兵力驻地周围的地形，并在图上补充注记。

这天晚8时，部队在7日夜间演习和8日核实情况的基础上，按着既定方案继续进行演习。

12月9日晚，张、杨在易俗社请南京来的文武大员观赏秦腔。当夜部队仍按预定计划，继续进行演习，不料因为十七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的失误，引起了一场虚惊。当晚9时，宋文梅到西安东城门楼上去看望东北军卫队第二营营长孙铭九。他们两人在此之前都曾亲自接受准备扣蒋的密令，都在待命行动。宋文梅来到东城楼时，碰见孙铭九正要率领卫士营一部分士兵登车出发。宋问他到哪里去？孙铭九向东一指说：“到临潼去！”宋文梅“听风就是雨”，未加细问，就妄作判断，认为孙是扣蒋的。于是他慌忙回来，因杨先生正在易俗社陪南京的大员们看戏，便马上驱车到西安东大街柳巷，报告给杨先生的机要秘书王菊人。王觉得这个问题极为重大，发生的又紧迫，需要立即作出决定，便打电话请杨先生回到新城，作了汇报。杨先生听到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又想到张学良此刻还没到剧场来，便立即采取相应措施，决定准备配合东北军行动，按照以前与张商定的十七路军任务（在西安城内解除蒋系武装，占领特务机关，接收蒋系各级机关并扣押蒋军政大员）作了部署。杨先生为了不使南京方面的人看出破绽，下了命令后，又去易俗社陪蒋系大员看戏。王秘书按照杨先生的指示，立即通知我说：“杨主任让你按照原定计划，做好西安城防的各项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随时与他

保持联系，待命行动。“听了这道命令，我感到很奇怪，是不是又出了什么问题？因为这个时候，参加夜间演习的部队已经出动了。我一方面命令分区演习的部队不要分散，不许乱动；一方面静候命令，准备行动。

可是，杨先生一回到剧场，就见张学良正在那里看戏，还同陈诚、朱绍良有说有笑，品评戏的好坏。原来张学良因为学生请愿的事，往返临潼、西安道上，到易俗社来得较晚。这时已是深夜，眼看就到散戏的时候。杨见此情势，心中大疑，不知张学良是否已有行动，又不便当着众人问他。杨先生就请在场看戏的几位陕西老绅士再点几出戏，借以拖延时间；随即赶回新城，查问真情。并一再交待说，部队行动时，事先必须向他报告，以便同张学良一起离开剧场。王菊人根据杨先生的指示，叫宋文梅赶快找孙铭九查问究竟。宋去找孙后回来报告时，已是深夜11点多了。宋说：“我去看孙铭九，他的警卫说，营长已经睡了。我大吃一惊，推门进去，孙已睡着。我把他叫醒，问他去临潼为了什么事？孙说：‘张副司令怕学生晚上又去请愿，遭蒋毒手，叫我去巡路，如果碰上学生去请愿，叫我劝回来。我刚巡路回来，睡了。’我看他若无其事的样子，很生气。来不及再说什么，赶忙回来报告。”这时，杨先生还在剧场，王菊人等听了，相对愕然。好在当夜下达命令是以夜间军事演习为掩护，王菊人便不等向杨请示报告，及时决定：迅速命令出动的部队，立即停止军事演习，限拂晓前完全归还建制，回原驻地。当时王菊人打电话给我，问演习怎么样？我说：“已经完了，没出什么

事。”他说：“那就赶快收兵回营吧！”

演习部队于凌晨3时许归还建制，回到驻地。在部队回收的同时，我去找了王菊人，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才原原本本地把这些情况向我说了一遍。由于宋文梅的冒失张皇，如此兴师动众地闹了大半夜，险些出了大乱子。虽是一场虚惊，如果沉不住气，鲁莽一点，捅出乱子，就麻烦了。幸而未出意外，否则贻误大事，把我杀了事小，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杨先生回到新城，已是深夜1时。听过情况报告后，非常生气，斥责办事人太鲁莽，把大事当儿戏。10日拂晓，张学良已得到报告，接连打来两次电话，要求负责这件事的人前去面谈。杨先生说：“还是我去谈吧。”杨对张谈了9日晚上发生事故的详情，同时告诉张说，看近日情况，学生、市民，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大部分中下级军官，对蒋十分愤恨，情绪激动，万一发生骚动，难以控制，扣蒋时间，不能再迟了，张也表示同样看法。他们决定加紧准备，迅速行动。

对宋文梅的失误，杨先生并未深究。但我回想起来，宋的这次行动，联系到他和孙铭九在整个“事变”中的表现，总觉得有点蹊跷。

事变的前夜

张杨10日已决定在11日晚行动，一切准备工作都在紧张地进行。不料这天下午，蒋介石又打电话将张学良召

去。直到晚8时许，张学良才由临潼摆脱蒋介石出来，到新城大楼去做宴会的主人。10点左右，方才席终人散。

当晚的宴会散场以后，杨先生打电话叫我去。这时已经10点多钟。一路上，我心里一直在捉摸着，这么晚了找我去肯定有紧急的事情要交待。我也知道蒋介石最近的一些动向，我的手里已经详细准确地掌握了全城中央军驻地分布情况，心中早有数了，因而当我踏进客厅时，心里是踏实的。杨先生一见面就问：“这几天演习得怎么样？街道情况都弄清楚了吗？”我回答说：“完全清楚了，演习还顺利，没出什么乱子，没有暴露意图。”说着，我顺手又从皮包里把西安城郊地图拿出来，摆在茶几上。他就走过来看，看宪兵团团部在哪里，营部在哪里，警察局在哪里，警察大队在哪里分驻，以及整个中央军、警、宪、特驻地、兵力和装备。他一边看，一边点头。仔细地看完了，他高兴地连声说：“好！好！很好！全城的情况，你们调查的很清楚，他们的位置一看就明白了。”

看完地图以后，他在沙发上坐定，又要我挨在他的身边坐下。杨先生把图再一次平摊在茶几上，又专心致志地看了好久。一边看，一边手扶着前额闭目思考。我静静地在他身旁坐着，心里也在不停地思忖：一定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不然他怎么会这样沉思呢？果然，过了一会儿，杨先生抬起头来，朝着我的周围瞄了一眼，随即严肃地说：“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竭力挑拨东北军和我们十七路军的关系。这次到西安来，表面上是要打共产党，实际是一箭双雕，也要消灭十七路

军和东北军。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也为了咱们部队的前途，必须停止内战，一致对日。我和张汉卿一起，多次向蒋介石痛切陈词，反复说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求他放弃打内战的政策，领导全国抗战。可以说已做到仁至义尽，当面建议，面谏，苦谏，甚至苦苦哀求，哭谏，他都不听。这些请求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还受到他的斥责。面谏不听，不得已，只好采取兵谏。我和张学良共同决定采取行动，把他抓起来，逼他抗日。如果他不答应我们的要求，就决不放他。我们和东北军有明确的分工，具体行动计划是：东关以东，由东北军负责，西安市内，包括火车站、西郊机场和西京招待所，解除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武装，扣留国民党的大员，扣留飞机，统由我们负责。我们决定，就在今晚动手。你的意见怎样？”

说到这里，杨先生目光炯炯地审视着我，等待我的回答。

捉蒋介石，乍一听不禁吓了一跳。不过，在我的思想上，早已有了这个想法。因为事关大局，不敢暴露。没有料到今天晚上就干。当我看到杨先生充满期待与信任的目光，就异常兴奋地答道：“坚决执行主任的指示，一切听从主任的命令！”他说：“叫你去捉蒋介石，敢吗？”我说：“敢！什么时候去？决不含糊！”他说：“好！好！我是打个比方，并不是叫你去捉！你的任务是西安城防，担子是很重的。”这时我向他建议说：“孙蔚如、赵寿山已由三原回到西安了，这样大的事情，他们是否知道？”他说：“那你不要管，你只管你，谁叫你操我的心？你先到副官室等着，等会儿

叫你再来!”

我便退出客厅，走到副官室。屋里电灯亮着，只有白子俊副官在那里。我朝他打了个招呼，就坐在木椅子上。思潮滚滚，想的全部是捉拿蒋介石的事。

这次行动的准备工作的极端保密，事前只有少数直接参与行动的军事负责人知道，调动部队下达的命令，也只是告以作某种必要的准备，真实意图丝毫不露。孙蔚如是十七路军十七师师长，赵寿山是这个师的主力第五十一旅旅长，杨已下令从前线把这个部队调回三原。

约摸 11 点来钟时，看到赵寿山匆匆忙忙走进门来。见我坐在副官室，惊奇地问：“半夜三更你来干什么？”因有白副官在场，不便向他明说，我只向他做了个手势。我把右手掌翻了一下，示意要造蒋介石的反了。他边走边笑着说：“咳！你跟我打的什么哑谜呀！”说着就到杨主任的住室去了。赵寿山进去不久，孙蔚如也到了，看样子他的睡意还没有消失，似乎是刚从床上叫起来的。他边走边说：“现在都半夜三更了，把人叫来干啥？”我笑了笑，对孙说：“当然是紧急的事啊！你进去见了主任就知道了。”

接着，我便跟孙进去了。等我们坐定，杨先生把刚才对我讲的话，大致又重说了一遍。他特别强调，这次捉蒋介石，不但东北军、西北军一致行动，还可能得到红军的支持。说罢，他转问孙、赵两位：“你们二位是什么意思？”他俩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张杨的主张。孙蔚如坚定地说：“为了国家民族，咱们干！”又说：“要干就干到底！”赵寿山紧接着说：“我完全同意，咱们干！”说罢，赵又转过身来问

我：“从洲，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我说：“准备好了。”他又问：“咱们有西安军队驻扎情况的标图吗？”我说：“有！”伸手便把放在茶几上的那张地图递给他。赵寿山仔细地看过地图，激动地说：“很好，主任你就下命令吧！”杨先生又照他和张先生早已商定好的分工原则，同我们一起研究了行动计划。由我汇报蒋介石集团在西安的兵力分布情况，又研究了十七路军的行动部署。

任务明确之后，孙、赵两位和我，不约而同地问杨先生：“谁去捉蒋介石？”杨说：“东北军去捉，他们已经有了安排。”又说：“我们负责西安城里，同时决定明日成立戒严司令部，任命孙蔚如担任戒严司令，并负责拟定十七路军所属各部队的布防及向西安集结的计划；赵寿山兼公安局长；从洲仍任城防司令，负责西安城防，指挥警二旅和炮兵团。”同时命令驻大荔的第四十二师冯钦哉部迅速袭占潼关；警备第三旅袭占咸阳，解除中央军第十三师两个团的武装。杨先生还对我指示：“要掌握好机动兵力，特别要注意国民党地下武装的扰乱破坏。”

最后杨先生说：“我和张副司令决定，部队在明天（12月12日）凌晨三时部署完毕，四时开始行动。你们注意，也就是今夜的后半夜动手，争取在明天早晨八时以前解决战斗，十时恢复城内外正常的交通秩序、社会秩序。”

在杨先生那里研究部署时，绥署参谋长李兴中没有来。从杨公馆出来，赵旅长说，咱们去找参谋长，把咱们怎么部署的情况跟他说一下。我就同他一起去李兴中的办公室等候，派人把他接来，将杨主任的指示和行动计划，

以及兵力部署等情况，都详细地告诉他。以后我们就匆匆回去履行各自的职责去了。

我们离开新城大楼以后，孙蔚如、赵寿山和王菊人等留在杨先生身边，等待张学良将军来共同指挥，与临潼方面统一行动。这时，张正在公馆与其高级官员开会。事后了解：当夜将到 12 时了，张学良还没有来，杨先生很着急，也有许多疑虑：他怀疑张学良会不会向蒋介石出卖他？东北军内部会不会走漏消息？孙铭九能不能担任起把蒋捉来的任务？张会不会又变卦？蒋是一个久于军事的极其狡猾的人，上次在临潼和张发生争执，以后又同他自己谈了话，蒋会不会起疑心，秘密逃向潼关？十七路军内部也有些特务，9 日晚间的军事行动，会不会向蒋报告，使蒋事先逃脱？孙铭九等年轻军人，有一股反蒋感情，会不会忘记大局，把蒋打死？……杨说，有三条路要作准备：（一）蒋如果跑了，孙铭九扑了个空，那时怎么办？（二）万一蒋被打死，那时怎么办？（三）捉来个活蒋介石，必然还得放个活蒋介石，既捉又放，该怎么办？杨又说，这回事情，政治上是成功的（他指主张抗日），军事上可能失败（指十七路军这个部队），我们的抗日主张会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只是在军事上，我们却处于蒋介石部队的东西钳制中，我们的部队，一时集中不起来，一旦要打仗，对我们是不利的。杨认真地思考了如果战事爆发应该作的军事部署，以防万一。又说，万一打起来，头一仗一定能打胜，也必须打胜，打胜才能稳定局面，促进南京内部和国内各方面的变化，可请李兴中参谋长准备三个方

案，一是同东北军、红军联合作战的方案，一是同东北军联合作战的方案，一是我们单独应战的方案，三个方案都要在咸阳、渭南阻击东西进犯之敌，以坚守西安为目的。主力放在东路，并以强有力之一部（最好由红军担任）进入商洛地区，以确保我右翼的安全。杨又慨然地说：“我进陕西后，没有象在山东时那样训练军队，步兵训练班的政治训练也做的迟了。十七路军这个团体，已是将骄兵惰。一些中上级官佐，置地买房，娶小老婆，开商号，做生意，发财的发财，享乐的享乐，到了拼命的时候，谁跟上我来呢？也好，借此机会，整顿一番，抗日的来，不抗日的走，这个团体当初还不是几根破枪干成的吗？整顿一下，走新路，会成功的，即使失败，为了救国，把这个摊子摔个响亮，也值得。”这时曾有人问：“把蒋捉了，其他实力派不响应，怎么办？”杨说：“其他实力派不响应，我们照样单独干。我们干的是百姓愿意干的事，百姓一定会响应我们，老百姓的力量比任何实力派的力量都大得多。”

直到午夜12时后，张学良才和他的10多名文官武将来到新城。张一踏进杨的内室，就开玩笑地高声说：“虎城兄，干不干？不干就取绳子，我将我的这11员大将都带来了，你赶快叫人去拴，拴了送往南京，给你升官领赏。”杨虎城笑着回答说：“当然干，不过领赏升官却干不了。”孙蔚如也在旁边笑着说：“副司令，我们这些人绝不会出卖朋友。”接着，张、杨相互交谈了准备的情况，就立即着手研究具体行动问题。他们组织了一个临时秘书处，负责管理来往机要文电，并着手起草通电稿。新城是西安绥靖公署

所在地，位于西安城内，原是唐代的皇城，后为明代的秦王府。城墙坚固，易于警戒。张、杨即将临时指挥部设在这里，张任总指挥，杨任副总指挥，一起在这里坐镇共同指挥这场伟大的壮举。

震撼中外的惊雷

1936年12月12日凌晨，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这次“事变”是中华民族命运转折的关键。

这天凌晨4点，我打电话问杨主任：“现在几点钟了？”杨说：“时间已到，发信号开始行动！”我放下话筒，命令司令部立即按规定信号，打出红、绿各一发信号弹。西安城内的行动和临潼华清池方面的行动，是在张、杨统一指挥下同时开始打响的。

西安事变的信号一经打响，我就指挥部队马上行动。由于这次行动极为重要，为便于指挥与掌握部队，胜利完成任务，我特意将指挥所设在市内西仓门户县会馆原炮兵团团部，这里位置适中。战斗是在我们事先经过充分准备、敌人完全意料不到的情况下打响的。由于部署周到，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发起猛烈的攻击，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战斗，便痛快淋漓地解除了城内绝大部分敌人的武装，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当我回到司令部时，东方已经泛白，玻璃窗上露出了朦胧的曙光。几部值班电话机的铃声，连续不断地响着，各部队指挥官，都以激动的语调，一个接着一个地向我报

告战况：

第四团占领公安局，解除了公安大队的武装，接管了西关飞机场，并扣留了全部作战飞机及飞行人员。

第五团除在西安南、西、北城（东城门由东北军负责）各设一个连担任城防守备任务外，其第一营一部已解除了北大街警察局、派出所的武装，另一部控制了中正门外火车站，并解除了护路队的武装；第二营一部已解除中央宪兵二团第二营营部及第四连的大部武装，另一部以机枪连占领钟楼，用重机枪封锁西大街，并支援步兵解除钟楼附近警察保安团第三大队的武装；第三营一部已解除中央宪兵二团第五连的武装，另一部解除了西大街公安分局、派出所的武装。

第六团已解除军警联合督查处以及保安团的武装。

旅直特务连，解除了公安第一分局的武装。

旅直属军士训练队以一部配合特务连解除公安第一分局的武装，其余解除了保安训练大队和长安县政府的武装。

炮兵团已解除了省政府常驻的宪兵连的武装。炮兵营两个连在北城门楼上，对付东来的火车，另一个连设在西城门楼上，对付西来的火车。

在各部报告战况的同时，特务营营长宋文梅也来电话说，他们已经按照名单将西京招待所的国民党军政大员都捉住了，就这样，从12日凌晨4时许起，不到4个小时，西安市所有南京国民党的军、政、宪、警、特的全部武装基本上被一网打尽了。这天住在西安城的军政要员，

全部扣留，缴获步枪 5000 支，手枪 1500 余支，毙敌 200 余人，我伤亡 60 余人。西安市的局面，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里。

这天的行动 8 点前就结束了。7 点 20 分，我到绥署去汇报，说城里敌人肃清了，没有枪声了。汇报完了，刚出门，车站跟前又有枪响。杨先生问我，这是哪里的枪声？我说，这声音象是北边的。杨说，还有哪个点，可能没有弄清楚！我说马上去看。出门赶到北城上，找到冯尔革的重迫击炮营。我问这是哪里打枪？他说刚听到枪响。到火车站一了解，原来是守金库的一个连，叫铁道警察队，我军夺了车站后，发现那里还有人，班长就打了几枪，那里就还枪了。对方不到一个连的兵力，守着四五间房子。我们喊话叫他们交枪，他们就是不交。不交枪怎么办？把我急的没法了。都打死吗？太那个；喊话，他们硬不交枪。我原想用迫击炮轰两下子，后来一想不妥，金库距火车站不到 1000 米，一轰就会轰坏火车站的房子。后来就拿绳子从房上系两颗迫击炮弹，一吓唬，他们怕得要死，就这样把问题解决了。

在金库的敌人解除了武装以后，我就急忙坐上车子，直奔新城大楼。

万民欢腾的时刻

当我匆匆忙忙地跨进大门，走到西客厅的门口时，看到厅内已有不少的人，全都是张、杨的高级将领和幕僚。

室内的气氛有些异常，完全不是我所想像的那样热烈欢腾的场面，大家都沉默不语，有的凝神思考，有的低头吸烟，有的来回踱步，有的对窗站立，客厅里鸦雀无声，寂静的出奇，只有那只落地自鸣钟，在那里咔嚓咔嚓的响着，使这里的气氛显得更加紧张。

我屏息静气地走了进去，正想找个熟人打听一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恰好赵寿山旅长迎面走来，在我的耳边轻轻地讲了一声：“蒋介石跑了，没有捉到。”听了这个消息，我大吃一惊，心想：真糟糕！捉蒋、捉蒋，要捉的就是蒋介石，怎么让他跑了呢？这时张学良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在室内走了几步，自言自语地说：“这就奇怪了，他会跑到哪里去呢？”杨先生说：“种种迹象说明，他可能躲在附近。被窝是暖的，假牙还放在桌子上，衣帽、斗篷也都在，他的座车也仍停在那里，证明他没有跑远。叫部队加紧搜索，是能够把他找到的。”张先生在等待临潼那边信息的时候，沉思着来回走动一会儿，忽然激动地站定说：如果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说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戴他为领袖；若找不到他，我割了自己的头，请虎城兄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总不能因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是如此，我张某便成千古罪人。

大家焦急地等待一阵，临潼仍然没有捉住蒋介石的消息。张先生蹙着眉头问杨先生：“他会不会自杀？”杨连连摆手说：“你怕他投了华清池？不会的。他这个人最爱惜自己，最怕死，我保证他决不会自杀。”当杨发表这一看法之后，在场的有几位，也点头表示赞同的说：“杨主任的分析

是对的。”张先生又问：“虎城兄，你说，假如他要逃跑，会朝哪个方向跑，因为商县有个交警总队，可以接应他。”又说：“看来咱们也得防他这一手，一边严密搜索，加紧寻找；一边派部队到兰田方向去堵截。”

说到这里，杨先生的目光向室内扫视了一遍，最后朝着我点了点头，我忙向前走了几步。杨先生说：“你立即带部队乘汽车赶到骊山以东，在临潼和兰田之间的油坊街一带布置警戒，严密封锁，决不能让蒋介石溜掉！”我应了一声，立即回司令部带一个营出发。刚刚赶到油坊街，我正指挥部队下车，准备布防封锁各交通路口，突然有我的电话，这是从杨先生总部打来的，说东北军已经把蒋介石捉到了，让我马上赶回西安。这时，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地了。

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时，全营官兵顿时欢呼起来。

在派出张先生的侍从副官谭海迅速去接蒋的同时，张、杨又在新城大楼会议室召开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干部会议。这时我已回到绥署，参加了这次会议。张学良首先宣布：“我和杨主任胆大包天，把天戳了一个窟窿，蒋介石被我们扣起来了，目前国家民族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里，我和杨主任负责，你们也负责。赶快筹划研究起草文件，打电报给陕北共产党，请派负责人来。”接着杨也讲了几句，他说：“我们为什么要胆大包天，下决心捉蒋，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今天，他已经被我们捉住了，值得高兴。可是，如何把下一步的文章做好，这是我们都必须严

肃对待的问题。”

就在这天上午9时许，白凤翔师长、谭海和孙铭九等人，把蒋介石押到西安城内。当蒋介石到达新城大楼的时候，身上穿着一件古铜色绸料夹袍睡衣，下身只着一条白色单裤，赤脚着鹿皮圆口便鞋，左右足踝处都有荆棘划伤的血痕。冻得哆里哆嗦，浑身直抖。他的面色苍白，战栗不已，腰弯脚跛，不断出声长吁。他因惊吓过度，不能行走，便由谭海等将他搀扶下车，把他安排在新城大楼东厢房。

事变第二天深夜，杨先生曾约十七路军的几个人，到他新城绥署住处的客厅，研究如何处理蒋介石的事。杨说：“昨天上午召集的双方高级干部会议上，我讲过，蒋介石已经被我们捉住了，现在就住在新城大楼东厢房。今天晚上约各位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大家说说下一步咋办？以后的文章怎么个做法？”

这时，与会者议论纷纷，各抒己见。有人主张立即杀掉，以免后患。理由是：蒋介石很顽固，他是一个死不回头的人，决不会改变反共政策，要反共就得打内战，打内战便无力抗日，因此不杀蒋便无法实现抗日；鉴于张先生过去和蒋的关系不错，不杀蒋，难免将来出毛病；杀蒋，共产党同我们合作将会更加真诚；十七路军内部有的人庇护特务，暗送秋波，为自己亲蒋预留后路，杀了蒋，就断了这些两面派亲蒋的念头，可以巩固十七路军内部。蒋介石搞了咱们这么多年，我们吃尽了他的苦头，这回捉住了他，不能放，杀了他，可以大快人心。

有人认为，杀蒋无用，放蒋危险。南京国民党政府，如果不按照我们的主张改组，不明确表示抗日态度，中央军不开到抗日前线，我们就不放他。即使南京政府对我们用兵，战事对我们不利，我们走到哪里，便把蒋介石带到哪里。估计南京政府内部会出现分化，打一下是可能的，持久打，他们也是打不下去的。咱们部队的士气比他们高，能打胜。蒋军即使要打，也不过是个姿态。

有人主张放蒋，但必须要有保证，有条件放。主要是保证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必须停止内战，坚决抗日，并且要有确实的抗日部署与行动，中央军要调到抗日前线，绝对不许蒋介石个人专权，要按照我们的办法成立联合抗日政府，满足了这些要求，才能放他。

当时我想，杨先生在两次会议上提出下一步对西安事变如何解决，对蒋介石如何处理，说明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国难当头，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这个大的全局出发。因此，我在这次会上发言时，反复阐述了自己主张放蒋，但是又要有保证、有条件才能放的观点。

最后，杨先生说：“今晚就议到这里吧。咱们既然扣了个活的蒋介石，还得放个活的蒋介石。杀是不能杀的，放是一定要放的，只要我们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蒋介石能够接受，切实保证实现，中央军能退出潼关，咱们便放他。”

护卫中共代表团

自从蒋介石被捉，直到张先生陪同他离开西安前往南京，对蒋介石怎样处理，是杀、是放？西安事变如何解决，是战，是和？一直是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张、杨日夜思索、反复探讨的重要问题。这个时候，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西北，关怀张、杨如何处理这些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问题，同时注视着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观点。当时社会各界人士都把中国共产党看作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真诚地寄予希望。

西安事变当天，张、杨就打电报给中共中央，邀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到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12月17日下午，一架从陕北延安起飞的飞机在西安西关机场降落，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终于来了，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有秦邦宪、叶剑英。张、杨以十分高兴、宽慰的心情，热烈欢迎中共代表团的到来。就在周恩来副主席到达的当天晚上，我因事到新城杨先生处，他对我说：“周恩来先生今天下午到西安了，这下事情就好办了。这几天，无论我也好，张先生也好，都同蒋介石谈过我们的抗日救国主张，他一点也听不进去。我们和他仍然有长官与部属的关系，说话不能没有分寸。蒋敌视我们，再劝他也是不会回头的。周先生就不同了，他是中共方面最高领导人之一，曾在黄埔、北伐时代和蒋介石共事，又有十年血海深仇，对蒋介石有深刻了解，同蒋斗争

有丰富的经验，他和蒋处于平等的地位，对蒋可以劝导，可以说理，也可以批评。蒋介石最怕的就是共产党，我们也就专请共产党的代表来参加谈判，直接和他交锋。我看他也不敢再那样装腔作势了，以后他就不得不放老实一点。”他接着问我：“西安那么多的国民党特务，事变中捉了一些，也跑掉了一些，但是大多数潜伏起来，没有暴露，现在还有活动没有？”我答：“还没有发现。”他说：“那就要特别注意啰！这些人肯定是要出来活动的，有时公开，有时隐蔽，你们的眼睛要死死地盯着他们。只要他们出来捣乱，就坚决镇压，不要手软。不这样，就会出乱子的。”他特别强调：“周恩来先生住在张先生那里，自然由他们担任保卫工作，但只限于城东南角一块地方，整个西安的城防治安是由我们负责的。寿山虽然兼任公安局长，但警察是马志超一手训练的，今天不仅没有用，反而成为我们防范的对象，况且他还有旁的事情。你是城防司令，指挥我们驻西安的部队，必须担负起全部的治安责任来，特别是对周恩来先生和代表团人员的安全要注意，不能有任何疏忽。他们没有任何自卫力量，还要到处活动，安全问题就全靠我们了。最近南京方面的动向很值得注意。何应钦正在加紧部署军事进攻，中央军的二十八师、三十六师、五十七师和教导总队，已经开进了潼关，还扬言要派空军来轰炸西安。他的真正意图是啥？是关心蒋介石的安全，想把他救出去？我看不见得，倒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这类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少见的。不过我们要作好防守的一切准备，有备才能无患嘛。我已将十七师从渭北调西安附

近，加强对西安周围的防卫力量。关于西安市的城防问题，你和暂沉研究一下。”又说：“过两天我也许会给你请个顾问来，你们再在一起研究商量商量。”根据杨先生的指示，我和总部军法处长米暂沉交换了意见，把军法处统辖下的执法队及各稽查所，统一于城防司令部的领导之下，加强了城防治安和中共中央代表团在日常活动中的各项保卫工作。

又过三天，红军副参谋长左权同志来到西安。杨先生叫我到他的西客厅里会见了左权同志。左权同志中等身材，穿一身整洁、合体的灰布棉军装，十分精干。杨先生向我介绍之后说：“双十二事变后，南京政府方面何应钦积极布置军事进攻，我一方面要作好防守西安的准备，一方面更必须保障中共中央代表团的绝对安全，你身兼西安城防司令，这些都是你的责任。为防有失，我请左副参谋长来视察城防部署和保卫工作，你要很好听他的指导。”这时左权同志紧紧握住我的手，态度十分和蔼地说：“哪里哪里，谈不上指导。我们一起共同研究、互相学习。”

左权同志和我互相问好之后，便一同乘车巡视西安城防情况。左权同志登上古城的城头，仔细地观察城墙内外的地形。经我俩共同研究商量之后，又在一起修改了西安的防卫计划。左权同志军事经验丰富，讲话简短明了，我深为敬佩。当我俩向杨先生汇报时，杨深感满意，一再向左权同志表示谢意。关于我对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保卫计划，经左权同志的帮助，作了更加周密的部署。从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一直到我奉命率部离开西安移住泾

阳，前后 50 天，都在异常紧张的心情中度过，所幸尚未发生什么事件，这和左权同志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周恩来副主席作为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不避艰险，亲率代表团前来西安和蒋介石谈判。在这惊涛骇浪的险恶环境里，经过 60 几天艰难曲折的斗争，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任务。为了实现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变变的伟大战略决策，周副主席废寝忘食，辛勤地工作，在谈判中发挥了杰出的作用。为巩固和平解决西安变变的初步胜利，他还不辞劳苦地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中级干部中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对部队的教育很大，影响极深，在两军广大官兵中赢得崇高的威信，得到真诚的信任和爱戴。我对周副主席忠心耿耿坚定不移地为国家、为民族的最大利益而艰苦奋斗的崇高品质、无产阶级革命家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以及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和革命胆略十分敬佩。

和平解决事变的消息传开，西安和全国各地爱国人士以及广大群众，热烈拥护张、杨的爱国举动，纷纷开庆祝会和举行游行等活动，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上上下下也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但是，也有少数人想不开，觉得没有把蒋介石杀掉，真是太便宜他了。

放走蒋介石以后

12 月 25 日张学良没有和杨虎城商量，个人决定放走蒋介石。只是在临行前，张才打电话请杨先生去。等杨到

了他那里的时候，蒋介石已从住处走出来上车了。张只低声对杨说：“现在就放他。”杨不好当着蒋的面和张争执，只好一道去送蒋。不料到飞机场后，张又说他要登机随行，陪蒋介石回南京去；同时交给杨先生一个手令，内容是在他未回西安之前，东北军由于学忠（甘肃省政府主席兼五十一军军长）统率，归杨指挥。杨没料到张会亲自送蒋，但在这个时候已经无法劝阻了。蒋在机场对杨说了几句话，大意是：不再打内战，过几天就叫张先生回来；并再一次重复了他的六项“诺言”，还说：西北交给你们了，将来设一个西北五省统一机构，由你们负责等等，全是一些骗人的谎话。张学良对于放蒋的事严守秘密，没有告诉任何人，连周恩来同志也没有通知。及至周副主席闻讯赶到机场时，送蒋的飞机已经起飞。

记得在放蒋的当晚，我震惊之余，即去见杨。杨当时精神极为沮丧，他对我说：“这样匆匆忙忙地放蒋，张先生事先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而他一定要陪蒋去，更加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张先生没对我说，一定会对周恩来先生说明的，及至我和周先生见面的时候，周先生说 he 事前也毫无所闻。你知道，我是同意放蒋的，但不能就这样的放啊！没有同周先生和我商量，这还有什么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张先生这次去南京，是凶是吉，是祸是福，还很难说。不过今后的局势肯定会更加复杂，咱们应该有足够准备。”杨先生要我回去严格控制部队，不管外界有什么风吹草动，都要保持部队的稳定，他表示还要去找周恩来副主席研究商量。

杨先生在这一时期，对我谈过他的苦衷。他说：“事变不是我们一家干的，我们不能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有周恩来先生在这里，随时可以商量决定。问题是东北军，上下既不一致，上层也各有各的打算。他们对周先生当面不肯多表示意见，但对我的说法，往往和对周的表示有所不同，这是我在和周先生谈话中发现的。现在张先生走了，东北军这个队伍谁也抓不起来。于学忠名义上是头头，那也只是名义而已。我这个代张先生行使职权的人，更是无能为力。但是就军事力量来说，他们又是最大的一方，也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究竟怎么考虑呢？那又很难说。我对张先生跟蒋走很不理解，现在他被扣了，我对他非常同情。我们两人共同搞了这么一件大事，现在要我一个来挑这个担子，力不从心啊！在东北军干部营救张先生的活动中，我怎么能漠然置之呢！我和他们一样也流了泪。但我又不能撇开上层直接对他们有所表示，我的这种心情，曾和周先生谈过，他不仅表示理解和同情，而且主动地替我出主意和解除困难，我很佩服他，也很感激他。目前只有加强同中共代表团的合作，挽救整个局势，我们对友军要忍让，一定要顾全大局。”

从杨先生的谈话中，我深感他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杨向来行动果敢，勇于负责，这时，他的内心却是非常痛苦的。因此，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共代表团最后提出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共同作战的决定，乃是迫于形势不得不采取的应急措施，也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体现，与和平解决绝无矛盾。相反地，正是由于预先有所准

备，使蒋不敢轻举妄动，终于实现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摆在面前的现实虽然如此，但在我的思想上仍然认为，张个人私自决定放蒋和亲自送蒋的做法，是极为轻率的，危险的，令人十分惊异，难以理解。他放走了蒋介石，我们手里也就没有抵押了。他亲自送蒋，不但丢掉了自己手中的抵押，反使自己成了蒋手中的抵押。现在提出了三方作战的决定，蒋迫于形势，一时还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我想，蒋介石决不会就此罢休的。从东北军的情况看，如果长此下去，无人统帅，势必陷于分裂。万一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杨先生也是难以维持的。因此，我对事态的发展，深感担心！

“事变”中的事变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向一个新的开端。但在西安，围绕着保卫西安事变成果，巩固已形成的“三位一体”，将西北变为抗日根据地和统一战线模范区问题上，各派政治、军事力量之间的斗争急剧展开。在半年时间内，风云激变，风波迭起，连续发生了我所担心的事情，局势顺着—面斜坡滑下去了。

蒋介石离开西安就背信弃义，蓄谋报复。张学良在12月26日到南京后，一下飞机即被蒋介石软禁起来。接着，蒋介石亲自导演了一场“审张”、“赦张”、“管束张”的丑剧。从此，张学良便失去自由，一直在软禁中生活。蒋介

石在迫害张学良的同时，又压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调防，移驻甘肃和渭北；陇海线由中央军接管，并设防西安。随后又公布了一系列任免令，对杨虎城撤职留任。同时，中央军积极向西安推进，造成大军压境的形势；还以政治分化手段相配合，从内部瓦解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团结，从而削弱西北革命势力。面对这种形势，西安方面最要紧的是加强内部团结。如果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紧密团结，在西北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军事上作有力的部署，政治上采取正确的方针，既可迫使蒋介石履行他抗日救国的诺言，也有希望营救张学良。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的同志，为此进行了艰巨的努力，谋求实现和平解决的途径。但在蒋介石的政治攻势下，西安内部发生了分化，各派势力围绕和战问题展开尖锐斗争，局势日益变得严重复杂。

西安事变前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关系很好，双方人员经常相互来往。2月2日，就在王以哲将军遇害的当天上午，王劲哉（十七师四十九旅旅长）对我说：孙铭九请我们到他家吃饺子。他说，同时邀请的还有警一旅旅长王俊，独立旅旅长许权中，以及我那个旅的副旅长任云章。孙铭九原是张学良卫队团的营长，这时已经升任该团团长，他家住在金家巷。我和任云章、李振西、王俊都去了。王俊旅当天清晨才从凤翔调到西安，是刚到西安火车站被拉去的。到了孙家，我们几个人被安置在西厢房里，坐下以后，没有人陪，也没有给饭吃。过了一会儿，进来一个人说：“我是孙铭九！”他的手里拿着七八个写有“反对

和平”红字的黄缎子袖章，往前边一搁，就开口说，他们反对和平，王以哲已出卖东北军，投降蒋介石；谁要不反对和平，我们就要首先除掉谁。他说：“你们十七路派人打王以哲去！”我对在这里看到的一切都感到奇怪。就说，我怎么能派人打王以哲？如果我去打王以哲，东北军、西北军不就冲突起来了吗？孙铭九继续对我说：“你派人去把王以哲杀掉！东北军派人去新城！”我一听他要派人到新城去，大吃一惊。新城是杨先生的总部，他们到新城去干什么？他让我们把“反对和平”的袖章戴上，同时还让我们在《反对和平宣言》上签字。因事出突然，我当即严词拒绝，别的人也以各种理由推托，没有签字，也没有戴袖章。当时西安城防由十七路军警备第二旅担任，我是该旅旅长兼城防司令，他坚持要我派人去杀害王以哲，纠缠不已。我说：你是团长，我是旅长，只有旅长指挥团长，那有团长指挥旅长的，你有什么权利对我下达命令？王以哲不仅我们士兵不认识，就是我这个旅长也不认识。如果我们杀死王以哲，这岂不是恰恰中了蒋介石挑拨离间，分化瓦解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奸计，破坏“双十二”和平，影响“三位一体”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大事了吗？我一看情况不妙，既看不见王劲哉，又不是吃什么饺子，知道上了圈套。因孙铭九说了“东北军派人去新城”的话，唯恐杨主任遭到不幸，破坏抗日大局，必须立即脱离险境。我就假借腹泻出去解手，闯过了门卫，迅速离开孙家。李振西也跟着我出来了。当时他的汽车停在前边，我的车子在后面，我就坐上李的车子一同离开了金家巷，直奔新城绥署。在

车上我对李振西说：“你负责新城防务，必须加强戒备，保证杨主任的安全，不准任何部队进新城！”这时何柱国在杨虎城家中，此后孙铭九真的弄两车东北军武装士兵来到新城南门口，企图杀害何柱国，被李振西的教导团挡了回去。

回到新城，我急忙奔向杨主任的办公室。经过副官室时，我对白子俊副官说：“任何人来，没有请示杨主任，都不许进去。同时我又给孙蔚如先生打了电话，我说：“主任有急事，请马上到办公室来。”孙刚来到一会儿，雷振启副团长报告：“刚才有两车武装士兵到孙公馆门口，被我顶了回去。”王劲哉诬陷孙蔚如，说孙投靠了蒋介石。我在杨主任办公室，正向杨先生汇报在孙铭九家里发生的事情，忽闻市内枪声，杨问：“哪里打枪？”我说可能是王以哲被杀害，杨对此大发雷霆。这时在坐的何柱国，听到我讲的这些情况，立即站了起来，惊惶不安。杨先生对他说，城防部队是我们孔旅长负责的，他是城防司令，跟我多年，很可靠，你不必担心。何听了以后，方才平静下来。事后，何柱国赠送给杨主任一个银盾，上书“再造之恩”四字，以示感谢。

当天下午，杨主任召集王劲哉、许权中、王俊、任云章、宋文梅、李振西和我去谈话。杨先生非常生气地说：“你们上午干什么去了，我打电话到处找不到你们！”王劲哉说：“孙铭九请我们吃饺子去了！”杨讲：“胡说，你还骗人！我和东北军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张副司令，并派李子刚代表去南京。你们这样干，不仅达不到逼

蒋放张的目的，而且适得其反，反会把事情搞坏，帮了蒋介石的忙，破坏了‘三位一体’，更加为蒋介石分化瓦解我们和东北军创造了条件。你们这些人真是愚蠢极了，一点政治头脑也没有。”这时，我方明白王劲哉、宋文梅他们也参与了孙铭九等人的阴谋活动，他们避开我在一起开了会。这天在孙铭九家“吃饺子”，是王劲哉告诉我的，在孙铭九家却没有看见他。可见他们事先已经同孙铭九等人在一块商量过。

据贾陶（当时是东北军警卫团副团长，中共党支部书记）回忆：“1937年2月2日早晨，孙铭九把我找到他家有说：今天我们召集住在西安市的东北军各单位首长开个会，研究一下当前局势的对策。东北军中的王以哲、何柱国准备投降蒋介石，据说杨虎城部队中的孙蔚如已投降蒋介石，他说：我们应该采取积极措施。话音未落，宋（文梅）营长和两位旅长都来了。孙铭九给我介绍了一下，见了面，我就出来了。不久，他们谈完了话。孙铭九又对我说：王（劲哉）、宋（文梅）他们告诉我，据他们得到的情报，十七路军的孙蔚如已投降了蒋介石，他们准备把他（孙蔚如）杀掉。并问我，东北军王以哲、何柱国也投降了蒋介石，你们怎么办？我答复说，我们也把我们东北军投降蒋介石的人除掉。我表示了态度，他们就回去了。……”

贾陶这段话是属实的，有人说孙蔚如投降蒋介石，实际上是有意诬陷，是在制造杀人的借口。可见2月2日两车武装士兵开到孙公馆门口并非偶然，可庆幸的是孙铭

九、王劲哉他们的阴谋并未得逞。

面对南京方面的高压

蒋介石扣张后，进一步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采取了军事威胁的毒辣手段，他指派其嫡系高级将领指挥 40 个师的兵力，分五路向西安进逼。一路由顾祝同率领第一集团军十几个师的兵力，从潼关、华阴、华县正面向西安推进；一路由陈诚率第四集团军九个师从渭北向西安压迫；一路由卫立煌率第五集团军四个师从商（县）、雒（南）向西安压迫；蒋鼎文、朱绍良率第二、三集团军 15 个师，分别从甘肃、宁夏向关中压迫。

蒋介石迫害张学良和派遣大军威胁西安的倒行逆施，激起了西安广大军民的无比愤怒，酿成了一致准备应战的呼声。最后，中共代表团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作出一致应战的决定，以防蒋介石的突然袭击。周副主席还同两军的高级将领，共同商定组成三方面的联军，拟定了联军的作战方案，并且调集部队，具体部署了迎战阵势，作好可战可和的两手准备。因此西安方面在周恩来副主席与杨虎城先生决定之下，在准备应战的同时，接连发出了 1 月 5 日的通电，2 月 4 日的《和平宣言》，2 月 14 日杨虎城领衔的致蒋介石的寒申电，抗议南京政府扣押张学良将军，揭露南京政府妄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由杨虎城领衔于 1 月 5 日向南京发出的电报中严正指出：“国危致此，总不应再有豆箕相煎之争，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

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令。若不问土地主权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诚意如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以同胞之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措词强硬，情真意切，博得全国人民的共鸣。

在蒋介石的军事威胁、政治分化与金钱收买面前，部队的思想显得混乱，有的人退缩了，有的人动摇了，有的人叛变投蒋。东北军炮八旅旅长黄永安、骑兵十师师长檀自新、一〇六师师长沈克公开声明投蒋。檀自新还将杨先生的母亲孙一莲老太太、警备第三旅旅长孙友仁及蒲城民团司令韩世本等扣留，并将民团的武装缴了械。十七路军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四十九旅旅长王劲哉、警备第二旅四团团团长沈玺亭、六团团团长唐得楹等人，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宣布脱离十七路军，投靠蒋介石的。沈玺亭、唐得楹这两个团长都是属于我领导的，事情发生后，我立即向杨先生报告情况，心中十分内疚地说：“狗大王（沈玺亭的外号）、唐得楹他们跑了！”这两个人原属张飞生领导的，是被红二十五军消灭所剩下的残部，我还没有来得及整顿就出了问题！

当我怀着惭愧的心情向杨汇报时，杨先生不但没有责怪，反而对我说：“你惭愧啥？土匪部队跑了好，跑了，部队更加纯洁了，没有啥可惜的。”我问杨先生：“要不要派部队去把他们追回来？”杨说：“算啦，不要追了，他们要跑，就让他们跑吧！这些人野性难驯，追回来有什么意思？王

劲哉跟咱们共事这么多年，他还跑呢，别说狗大王了。这些人政治上是近视眼，看不远，将来他们总有后悔的一天。”又说：“你也不要为这个懊丧，回去重新组织两个团，要比原来的更好。”杨先生的态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杨先生在挫折面前坚韧不拔、豁达乐观的精神，使我深受教益，深受鼓舞。当时我所表现出的那种沮丧情绪，被杨先生的话一扫而空，便高高兴兴地告辞出来，回到旅司令部另行设法组建新的部队。

张学良离开西安时，匆忙地委托杨先生代为指挥东北军。从此杨先生在名义上成了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支军队的最高统帅。但东北军毕竟不是他自己的部队，他的部队本身也存在着严重分歧。这时外有蒋系部队重兵压境，内有针锋相对的和战之争，既须同南京方面周旋，和战两派又都极力争取他站在自己一边。蒋介石为了分化瓦解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曾于1937年1月5日，一天之内发布了八道命令。其中主要的是，对杨虎城的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和于学忠的甘肃省政府主席兼五十一军军长职务均须撤职留任，特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2月8日，中央军宋希濂三十六师按照顾祝同的指示和平进入西安，接替西安城防；2月9日，顾祝同即以西安行营主任身份进驻西安；3月下旬，西安警备司令部成立，宋希濂任警备司令，马志超任副司令。杨先生在西安事变过程中日夜操劳，身心交困，蒋介石又如此步步紧逼，愤懑填膺，便在顾祝同到达西安之前，于2月6日愤而离开西安，移住三原县东里堡。东里堡是三原城北约有200多户

人家的一个富裕村庄，户主有好些是清末和民国初年经常下川（四川）的商人。靖国军时期杨先生为了老母方便，在这个村子里买了一院房子。当时他的家属就安置在那里。

转眼临近农历春节。农历腊月 29 日，杨先生突然叫秘书王菊人打来电话，说有事情要商量，叫我先到东里堡，随后再去一个营。当时我不知究竟，情况紧张，立即借了几辆卡车，叫陈应宝营乘卡车，我坐小车先去。到东里堡后，突然见到任云章副旅长（他已带来一个营），我就问他：你晓得叫我来干什么？他没有正面回答，有点惊异地反问说：“你也来了？”我说：“是啊，你什么时候来的，来干什么？”他说：“你见了王菊人就知道了。”进去找到王菊人，我还没开口，他一看见就说：“你来了，好，主任有事同你谈。”我问是什么事？王菊人说：“有人企图向杨先生‘兵谏’！杨先生把家眷已送到三原城里。”我听了很生气，到了这个时候，这些人还要干什么呢？西安事变是我们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而发动的，现已得到和平解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已经初步实现，他们还要干什么呢？他说：“你不知道，等一会儿，头家找你谈。”他说的“头家”，指的就是杨虎城将军。我进去到杨主任家，只见他在屋里走来走去，显得情绪不安。见我进来就问：“你来了！叫你带的部队到了嘛？”我说：“随后来一个营！”他说：“我得到消息，有人要搞兵谏。你来了，先把警卫营（特务营）的枪缴了！”听到这话，我很惊讶。当时这个营的营长宋文梅是共产党员，连长张希钦、李锦峰、姜树德、何

永安也都是共产党员，下面的排长，都是杨多年的马弁（卫士）。现在他们会怎样呢？能到哪里去呀？投蒋介石去吗，不可能；到陕北去吗，陕北红军不会因为这个营就不要杨虎城了吧！再说现在传来的这个情况，只是有人说听到这个营的人讲的，究竟是谁讲的？有什么凭据？我们还没有核对，没有真凭实据，岂能轻信这种传言！这样一想，我就向杨先生建议：特务营西安事变前后到今天一直担任警卫工作，日夜警卫，部队是很辛苦的。从“双十二”看，这个营不论对警卫工作，对执行任务都非常坚决。杨先生没有理会，还是态度非常严肃地说：“我叫你把他们的枪缴了！”我说：“你叫缴他的枪，如果他不交，硬要他交，就要发生冲突。冲突了就要伤人，或伤或死，都是打的自己人，都是跟你多年的部下，这样一来不但对整个部队的影响不好，对国内国外影响也不好。”他说，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我有不成熟的建议，请主任考虑。我看最好不要去缴枪，还是采取换防的方式，或者是我带个营接防，或任云章带部队接防。换防以后，把特务营调到卢桥镇休息整训。他又沉思一会儿，看了我一眼说：“噢，你去和王菊人商量一下。”在和王菊人一起研究时，我说用换防的形式比较妥当。假使以后他真的出了问题，咱们的部队也会阻止他。假如没有这个事情，咱们也主动嘛！可以对特务营说，特务营从西安到东里堡，担任警戒很久了，这些天来日夜警戒很疲劳，现在调到卢桥去整训，把警卫任务交给别的部队担任。

最后，杨先生接受了我的建议，在春节这天换了防。

特务营临走时，杨先生给他们讲了话，这样，就把这个事妥善处理了。后来杨先生没有彻底追查，不久他又被迫出国，此事就不了了之。

送杨虎城出国

顾祝同率领大军进驻西安以后，按照蒋介石的旨意，表面上把杨先生的一些部属安排在陕西省政府，如使孙蔚如主陕，杜斌丞任省府秘书长等，以示安抚；实际上，蒋介石嫡系军队源源开进潼关，在杨先生和于学忠被“撤职留任”之后，跟着而来的是强迫杨先生自动辞职和调东北军离开陕甘，一步一步地紧逼。

杨先生移住东里堡不久，东北军骑兵师师长檀自新叛变投靠蒋介石，返回蒲城老家的杨母安全受到威胁；杨先生派去蒲城驻防的几位高级将领，由于疏忽大意，也被檀自新扣留。杨先生面对着形势的发展，又遇到这些烦心的事，深感忧闷。周恩来副主席闻讯，特在2月中旬专程前往东里堡探望杨先生。杨先生见面后长叹说道：“周先生，我今遭此危难，真是一言难尽。”周副主席一如既往，亲切地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国家民族遭受极大灾难的时刻，你和张学良将军为国家民族建树的丰功伟绩，人民不会忘记你们，共产党永远支持你们。”接着又从当前形势谈到抗日前景，从个人处境谈到国家前途。周副主席诚挚的态度，精辟的分析，使杨先生心情舒畅，精神振奋，高兴地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我看没有什

么可悲观的。”

3月初，住在杭州的蒋介石，通过宋子文、顾祝同向杨先生授意，要杨主动要求去见他，以便“恢复感情”。3月28日，杨先生到杭州和蒋介石见面两次。第一次见面时，在座的有宋子文、宋美龄、邓宝珊、于学忠等人。这次蒋介石“指桑骂槐”，主要骂张学良，让杨先生听：“张汉卿常对我说，有他老子在，他跟他老子走；没有他老子，他跟我走，劝我搞法西斯组织，他服从领袖。现在他的行为如此！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张汉卿也没有军人品格，打不赢共产党，就投降共产党；他还讲打日本，如果打不赢日本，他还不是投降日本吗？这算什么军人！”蒋介石说到这里声色俱厉：“他的部队正在前线牺牲的时候，他秘密飞到陕北和敌人讲和，这怎么对得起部下，又怎么对得起长官！”蒋介石越说怒气越大，经宋美龄打圆场，气氛缓和以后，又说：“张汉卿是这样一个人，虎城竟跟着他走，真是我意料不到的。自己毁灭了自己的历史，也毁灭了部队的历史……。”第二天，蒋又约杨单独谈话，时间很短，主要谈了两点：一是问杨：对十七路军部队的安置有什么意见？杨说，没有意见。二是问杨：经过此次事变，你在这样环境中继续任职，感觉有什么不便的地方没有？没等杨回答，又接着说：“在事变中各方面是有对抗情绪的，他们对你的印象，一时转不过来，继续任职，在感情上会有些不方便。你不如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然后回来任职。出国费用，由政府负责。……”杨当面答应了。事后杨先生说，他当面只好答应，蒋的这一手，他是早就预料到的。

在杭州，蒋介石对杨先生表面上很“热情”，4天当中，两次盛宴。杨先生头脑是清醒的，对蒋不抱任何幻想。谈后曾对身边的人说：“蒋一贯对人没有诚意，不应对他有什么幻想。”果然从杭州回西安后，杨先生的处境越来越困难。蒋介石胸襟狭隘，始终不忘去岁西安之仇，把杨视为眼中钉。削职夺权后，仍不肯罢休。东北军东调以后，蒋介石在4月16日致电顾祝同说：“……总之虎城如磊落态度，听命辞职，则照中正（蒋自称）在杭所谈者，毅然行之，不应提出任何要求条件，示以至诚。则中央不能不体其善意，自能优遇。否则，一提条件，则无复可言矣。如其决然辞职出洋，并望其在本月内来沪，中正当派员为之筹划一切也。”4月27日，杨先生致电蒋介石呈请辞职，在电报中说：“思维再三，惟有恳请钧座俯鉴赤诚，恩准辞去本职，俾得退思补过，……”4月30日，蒋介石电复杨虎城：“接诵感（27日）电，情词恳挚，至深嘉尚。所请辞职一节，业已另电知照。并准派兄出洋考察军事，尚希即日摒挡，以赴事功为盼。”6月1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兹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此令。”

蒋介石如此步步紧逼，把杨虎城赶下台来，流放国外。杨于5月27日11时35分离西安前往上海，准备出国。这天一早，杨先生要离开西安的消息传遍了全市，驻在西安城郊的十七路军部队，西安各救国团体，各学校师生，各界市民，纷纷赶到飞机场送行，人人都想再看一下杨先生的风采。我在机场看到数以万计的群众，对杨先生

依依惜别，不少人热泪滚滚。场面热烈，盛况空前。自己参加这次盛大热烈的送行仪式，望着心力交瘁的杨先生，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周副主席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亲自为杨先生送行，同机前往上海，尤使大家深受感动。一些进步人士说：“这既是对抗日将军的欢送，也是对蒋介石的示威。”杨先生与各界人士在机场合影留念，并在次日《西京日报》等报纸上刊登出国启事：

虎城此以恳辞本取出洋考察。幸蒙中央体念愚诚，赐予照准。当于本月二十七日乘欧亚航机飞沪。渥荷我卿邦耆旧，各方友好，军政机关同仁，各校同学以及工农大众，辱赴机场欢送，感怀厚谊，弥觉依恋。伏念虎城救国心长，应时才短，半生虚度，殊有愧夫初衷；廿载治军，究无裨于建树。此际群公袒道，感故人之多情；他日孤篷归来，知山河之无恙。特此奉启，并申谢悃，敬希公鉴！杨虎城拜启。

杨先生5月27日到达上海，直到6月29日登轮放洋，前后在沪逗留1个多月。初到上海时，他和随员一齐住在新亚酒店，后偕夫人移住西爱咸思路宋子文公馆附近的一所西式寓所里。由于他要远离祖国，而且归期无定，各地的老朋友，旧部属，不少人都亲到上海送行。

1937年6月下旬，我专程从陕西赶到上海为他送行。一天晚上，我去看望杨先生，见面的时候，他一把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哎呀，想不到在这里还能见上一面，太好了。兄弟，真对不起，临走的时候，我把家当都

拆散了，分给了各个师，可没有分给你一个兵、一支枪，你不会怨我吧！”我说，没有什么。他说，在经费方面、物资方面虽然没有给你留下什么东西，但是我给你交了个好朋友，北边的好朋友，这才是最宝贵的，比给你几个兵，几支枪要有用多了。

我心里明白，杨先生所说的“北边的好朋友”不是别的，正是指的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工农红军，所以我笑着说：

“主任，你给我们交的这个朋友，胜过千军万马！”杨说：“对对对！”开始赵寿山同志在坐，谈话中间，于右任叫他吃饭去了，那里就丢下我。

这个时候，杨先生的思绪，又回到了遥远的陕西，回到了过去的年代。那一桩桩曲折惊险的历史事件，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一张张神情各异的人物相貌，似乎全都在他的记忆里交错叠现，使他的心情激动不已。沉默了好大一阵子，他才抬起沉思的目光，缓缓地说：“最近我常想起陕西军队的升沉变化，我们这个队伍的曲折经历，有许多的感触。你知道张翔初（凤翔）完结得早，是被袁世凯搞掉的；陈柏生（树藩）也没有搞上几天，就被人家消灭了；胡笠僧（景翼）、岳西峰（维峻）、李虎臣（云龙），都曾号称率领过十万之众，煊赫一时，可是到1930年前也都消声匿迹了。咱们十七路军，前身是辛亥革命以前，一部分被逼上梁山的穷苦农民组织起来的队伍。长时期内是一种合伙的弟兄关系。从民国初年建军，到靖国军时期，一直是这样。靖国军失败以后，我们退到陕北，与

共产党合作，并举办安边教导队，为后来参加北伐战争准备了条件。到了1929年，我们的部队开到山东集结后，经过几番整顿训练，才成为一支象样的军队。1930年重新回到陕西，取得了地方政权以后，队伍扩充到6万多人，成为陕军中硕果仅存的部队。这倒不是我有什么特殊能耐，或者象刘镇华之类那样，凭钻营投机把部队保存下来。在我今天被迫出国暂时离开你们的时候，回顾过去20余年的历史，我认为，我们能够存在下来的根本原因，是我们能够跟着时代的潮流前进，把自己放在国家民族的需要方面。辛亥革命是这样，靖国军时期是这样，坚守西安、响应北伐是这样，这一次发动西安事变也是这样。”

当杨先生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插了一句话：“主任还记得你在靖国军时期写的一首诗吗？我记得是这样写的：‘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杨先生听了立刻答道：“不错不错，写过这样一首打油诗。它确实表达了我当时的思想情感，就是决心跟着时代的潮流前进，做时代的弄潮儿。我认为正是这种精神，才使我们十七路军能够保持到今天。”接着又说：“靖国军后期，段懋功由我们团体中拉出去了，并和我们打了多年；到我们部队撤退至陕北的时候，任子杨又不跟着走了；西安解围后，冯华堂自动跟方振武，也去了；不久他们都完了。马青菀叛变，只落得只身逃跑，成为军统特务的一个小喽啰，杨渠统虽然不算叛变，但出去以后，我看情况也不妙，终有被蒋介石吃掉的一天。最近这次分

化，我也不感到意外和惋惜。冯钦哉也好，王劲哉也好，沈玺亭、唐得楹就更无论矣，我看他们都不会有什么好的前途。应该看到，他们走后，固然使我们的部队更困难，但也更纯洁了。”

讲到这里，杨先生不胜感慨地说：“这次事变，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扣了蒋介石，使他没脸，不可能再打内战了，所谓‘停止内战’这一点，大体上做到了。剩下的一半，‘救亡抗战’我能不能亲身参加还很难说，主要依靠你们了。我希望你们，一定要搞好内部团结。‘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团结起来，才有力量。蔚如、寿山和你相处多年，你们互相都比较了解，一定要真诚合作，团结一致。舍此，就有被蒋介石肢解、消灭的危险。同时，要在抗日战场上积极作战。我们是国民党军队中首先提出抗日的部队，应该言行一致，积极同日寇作战。我们只要在战场上有好的成绩，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我在国外也会得到安慰，蒋介石就不敢把我们怎么样。所以，你们一定要力争部队参加对日作战，共赴国难，多打胜仗，取得好的成绩。”

夜越来越深了，同他已经谈了三个来小时。以“不夜城”闻名的上海，也渐渐地沉寂下来。附近街道上偶有一辆电车辘辘驶过，远处的黄浦江面间或传来几声低沉的气笛，打破了夜的宁静。可是杨先生的谈兴仍浓。他喝了一口酽茶，点燃一支香烟，继续兴致勃勃地说：

“还想和你谈谈中国共产党和咱们的关系，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靖国军失败以后，部队来到陕北，在榆林结

识了魏野畴先生，我和共产党从此有了接触。我觉得他们是一些有识之士，爱国家，爱民族，有献身精神，并不象有些人宣传的那样，是些十恶不赦的歹徒。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我们参加了大革命的行列。你知道，咱们部队从榆林南下的时候，就是那么几千人，然而声势很大，打败了北洋陆军第七师吴新田的部队，以后又坚守西安，顶住了刘镇华 8 个月的围困和进攻。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一天天腐败，日益走向反动，我把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以及咱们部队的前途，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所以才有了在皖北的合作。皖北暴动失败以后，在一个长时间内，我对共产党并没有失望，只是对他们当时的某些政策接受不了，所以直到部队重回陕西，只能通过汉宸、斌丞、明轩他们作些抗日救国活动，并和红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的协议。‘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活动，一步紧似一步，而对内的法西斯统治，却越来越严酷。我几经试探，并亲自跑到石家庄见蒋介石，要求参加抗战，你们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说：‘哼！你那点本钱，经得住几下子折腾！’还说：‘不消灭共产党，就谈不上抗日。’我对他说：‘现在是国家民族存亡的关头，应该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团结对外！’他听了顿时火冒三丈，不耐烦地说：‘别说了，别说了，这些话我早听厌了。’从此以后，我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对蒋介石再也不抱任何幻想。可是，这时和共产党的关系，由于和红四方面军破裂而发生战争，还有张汉民的牺牲，使我非常苦闷。但我深信中国不会亡国，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绝不会长久。过去有一位

朋友告诉我：中国历史上各王朝的灭亡，不外乎三个因素，即外戚、宦官、藩镇，有一于此，就可以使一个王朝覆没。如今，蒋介石已经兼而有三，虽然名义上没有宦官，但是他周围的小人比比皆是，再加上外有强敌日本，内有武装的反对党——中国共产党，他还能支撑多少时候？我非常同意那位朋友的想法。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使我感到有了希望，及至毛泽东先生派汪锋带他的亲笔信来找我，要和我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觉得共产党的政策对头了，也和我们有了合作的条件。我曾经反复想过，毛先生之所以要主动地找我们，要和我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绝不是偶然的，他可能从我们以往与中共的历史关系考虑的，相信我们这个部队是主张抗战的。因此，又建立了这一次的合作，发动了‘双十二’事变，扭转了10年内战的局面，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喝采。我们这个烂摊子，纵然这次摔掉了，我也毫不后悔，摔得值，摔得响！”

说到这里，杨先生激动地站起身来，走到窗前，拉开沉甸甸的窗帘，眺望繁星密布的夜空，以及楼前高低明暗的灯光。

“啪”的一声，杨先生拉上了窗帘，敏捷地陡转身来，依旧激动地说：

“你要知道，中国军阀哪一个没失败在蒋介石的手里？我自己缠不下他，你们更缠不下他，能缠下蒋介石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没有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你在我们部队中历史较久，和野畴、汉宸都很

熟，也和汉民共过事，对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现在咱们部队内也还有炳南、揆要等人在，必须保持好和他们的联系。要记住：咱们部队的处境，北边是朋友（当时部队驻在渭北与红军毗连），南边（指西安）是冤家，北边是光明，南边是陷阱。到了蒋介石压迫我们，使我们的存在发生危险时，我们就断然倒向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这话我跟蔚如、寿山也谈过了。兄弟！你们负有更艰苦的任务，好自为之。我相信，十七路军的前途，你们的前途，都是光明的！”

话，越谈越深，情，越谈越浓。我俩都十分激动，禁不住热泪盈眶，相对唏嘘。谁知道这次长谈，竟成了他对我最后赠言，我和他的生离死别。至今思之，仍不免黯然神伤！不过杨先生的这些指示，对尔后我们十七路军部队奋勇抗日，直至回到革命大家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1937年6月29日，清晨，宽阔的黄浦江面笼罩着白茫茫的晨雾，大大小小的船只穿梭般地在江上行驶，岸边码头上人涌如潮。突然，一声浑厚低沉的汽笛响彻长空，在江面上久久地回荡。载着杨虎城将军和夫人谢葆真等一行的美轮“胡佛总统”号，终于缓缓地启航了。

当时到码头送行的亲友、部属、各界人士近千人，十分隆重。我和赵寿山同志以及其他送行的人伫立在江边码头上，眼里饱含着热泪，向渐渐远去的杨虎城将军频频挥手告别。

轮船越来越小了。最后，它的淡淡的黑影，完全消失在灰濛濛的雾霭里。

何孟雄反对立三、王明 路线的斗争

张 祖 柱

反“立三路线”

1928年至1930年，在我党历史上，继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后，又发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何孟雄为了党的事业，置个人荣辱于度外，挺身而出，在党的各种会议上，对立三的“左”倾错误公开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

早在党的“六大”前夕，江苏省委讨论党中央起草的“六大”文件（草案）时，何孟雄等人提出了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既非高涨，也非低落，而是处于由低潮向高涨转变时期的意见。这个意见由中共江苏代表团带到了“六大”，在预备会上虽然得到了多数代表的支持和赞成，却遭到了具有“左”倾观点的向忠发、李立三等人的反对。后经斯大林表态，才在决议中写上“当前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提法。“六大”决议的这是一提法，实际上是肯定了江苏省委的意见。但却引起向忠发、李立三对江苏省委

的不满，种下了“江苏问题”的根子。“六大”结束后，向忠发、李立三担任了中央领导职务，他们全盘否定江苏省委的工作，竭力主张改组江苏省委。“六大”前项英任江苏省委书记，在他赴莫斯科出席“六大”和“六大”后调中央政治局工作期间，由李富春、何孟雄主持江苏省委工作，李富春代理书记，何孟雄任农委书记兼军委书记。“六大”后，向忠发、李立三决定派广东工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担任江苏省委书记，江苏省委则主张选本省工人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徐锡根任书记。1928年10月29日，在李富春主持下，江苏省委常委专门讨论此事，邀请总书记向忠发出席。会上，何孟雄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摆事实，讲道理，认为江苏省委并无政治错误，在处理江苏问题时，“中央若能顾到事实，方能使工作同志安心”。李富春等人也对中央不从工作出发强行改组省委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在大家反对的情况下，向忠发放弃了改组计划。

12月，上海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工人，因要求资本家承认工会，改善待遇，缩短工时，连续举行两次罢工。中央决定由党中央、团中央、全国总工会、上海总工联和江苏省委联合组成“行动委员会”，领导这次罢工斗争。不久，中央又将江苏省委与行委合并，中央这些做法，引起省委不满，认为“简直中央可以代替省委”。向忠发、李立三非常恼火，强行决定撤销江苏省委，由中央直接兼管江苏工作。正当中央政治局准备将这一决定通知江苏省委时，周恩来解决“顺直问题”后回沪，反对中央兼省

委的做法，使这一决定未能施实。江苏省委得知这一消息，错误地召集各区负责人会议，传达省委与中央分歧的经过，进行反对中央撤销江苏省委的宣传，并向中央提出《江苏省委对中央工作的意见》，使矛盾激化。中央马上派罗迈（即李维汉）为首的工作组解决“江苏问题”。1929年1月31日，党中央改组了江苏省委，分别给省委成员以警告处分。指定罗登贤、任弼时、罗迈等6人为新省委成员。原省委常委只留下康生、徐锡根，其余被纷纷调离工作。何孟雄被调到上海沪西区委书记，4月又调任沪东区委书记，7月又调任沪中区委书记。

1929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李立三代表中央在会上作报告。何孟雄在小组讨论会上作了两次发言，与李立三报告中所持的观点展开争论：一、关于形势估量，何孟雄认为是开始复兴，不同意立三认为是成熟复兴和日益走向高潮的估量；二、在策略方针上，何孟雄认为应是准备进攻的策略，加紧日常斗争，由小的斗争发展到大的斗争，不同意立三的政治示威路线；三、上海工运方针，何孟雄认为应以米贴斗争为中心，采用适合革命主观力量的斗争方式，反对蛮干。本来在党的会议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正常现象，况且何孟雄的这些意见大部分是符合实际的，但却遭到李立三等人的横加指责，被扣上“调和派”的大帽子。大会在政治决议案中，不点名地批评何孟雄。但他从维护党的团结、遵守党的纪律出发，还是表示服从党的决议，只是申明保留自己的意见。大会选举省委执委时，何孟雄只被选为候补

执委。

当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已在实践中危害党和革命事业的时候，何孟雄不怕批判打击，一次又一次地公开起来反对。他先后在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江苏省委会议、沪中区委会议、市政委员会和上海活动分子等会议上，公开批判立三“左”倾错误。特别是在1930年8月20日上海区委、产委党团书记联席会上，何孟雄尖锐地指出：中央对革命日益接近高潮的估计是过分的，一系列决定是过火的，进攻长沙是没有前途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掀起世界革命，举行总同盟政治罢工是不可能的，再发展下去就要离开总路线，葬送中国革命。^①

9月1日，在李立三主持下，上海区委、产委党团书记联席会议再次开会，何孟雄当面批评立三的指导路线与国际路线不同，明确提出了“立三同志领导的路线”和“立三主义”的问题，并从各个方面批评了立三“左”倾错误，结果被当场禁止发言。最后李立三作会议结论时，干脆把何孟雄说成是“取消派的暗探”。会后，还提出要开除他的党籍。

何孟雄起来公开反对立三路线，完全出于捍卫党的正确路线，克服错误路线，发展革命事业的良好愿望，可结果却惹起一场灾祸，招至劈头盖脑的批判和打击。9月4日，根据中央意见，江苏总行委撤销何孟雄的沪中区委书记职务。9月10日，在上海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专门

^① 《何孟雄文集》第238—239页。

批判何孟雄，骂他是“一贯的调和主义”，是“隐藏在党内的取消派暗探”，并公开宣布撤销何孟雄担任的沪中区委书记的决定。何孟雄发言申辩，承认“谈话方式是错误的”，但不承认“一贯的调和主义”，更不能接受“取消派暗探”的封号。他进一步陈述自己的10点政治意见，结果被指责为“隐藏在党内巧妙的办法”，是“巩固的机会主义者”，“一贯采取在党内破坏党”。会后，《红旗日报》连珠炮式地发表了公开批判何孟雄的社论和文章，号召全党批判他。李立三之所以如此兴师动众对何孟雄进行批判斗争，撤了他的职，恰恰就在于何孟雄敢于带头坚持真理，击中“左”倾冒险主义的要害。

在受到立三路线打击的情况下，何孟雄无所畏惧，不屈不挠，矢志不渝，继续顽强地和“左”倾错误作斗争。1930年9月8日，他向总行委及中央政治局递交了《政治意见书》^①，提出12条意见，主要从6个方面批评立三路线：一、批评立三路线不承认世界革命不平衡的错误观点；二、批评立三路线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的错误观点和对形势的极“左”估计；三、批评立三路线组织大城市武装暴动的冒险计划，坚持当前的主要任务仍是“争取群众”；四、批评立三路线只要政治罢工，不要经济罢工的错误；五、批评立三路线合并党、团、工会组织，使一切日常工作陷于停顿的错误；六、批评立三路线搞过火的党内斗争的错误。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正是立三路线的

^① 《何孟雄文集》第175—186页。

主要特征和主要错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能够对立三路线作出这样的批评，确是难能可贵的。

一份被埋没的中央决议

何孟雄9月8日的《政治意见书》发表半个月以后，立三路线跨台了。

立三路线所制定的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左”倾冒险计划，引起共产国际的不满，于是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纠正其错误。1930年9月24日至28日，由瞿秋白和周恩来主持，在上海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批判了立三路线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日常工作。李立三本人在会上开始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六届三中全会对于停止立三路线的执行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三中全会对于立三路线的严重危害缺乏足够的认识，对于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没有加以澄清，而仅仅把立三路线错误归结为“在策略上犯了‘左’的个别冒险倾向的错误”。

何孟雄是我党“反立三路线最早最坚决的代表”。作为一次纠正立三路线的中央全会，本应肯定何孟雄在反立三路线中的功绩，摘掉立三路线强加在他头上的政治帽子，推倒一切诬陷不实之词，撤销错误的组织处分，恢复其名誉和工作。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

所作的报告中把“战胜了托洛斯基主义与陈独秀取消派”和“打击了何孟雄调和派主张”，并列为从二中全会到三中全会的两大成就。李立三在发言中不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指责说：“江苏何孟雄认为中央反国际，造谣言，来发表他自己的路线，他不是改正党的错误，而是乘机来攻击党的路线。”瞿秋白在最后作结论时也说：“中共中央最近有一点错误，决不是总的政治路线不正确，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利用来反党，我以为何孟雄的立场显然是这样的。”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发表的《告同志书》中公开点名批判，说“江苏的何孟雄……企图曲解共产国际和党的路线，而来进攻中央。”他们不满足以前撤销何孟雄沪中区委书记职务，停止其工作的决定，又于1930年10月28日在江苏省委扩大会议不让何孟雄出席的情况下，作出了开除其江苏省委候补执行委员资格的决定，剥夺了他仅剩有的一个职衔。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立三路线无情打击刚刚结束，六届三中全会的猛烈批判又开始了。何孟雄在这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没有屈服，没有退缩，继续坚持正确意见，反对错误作法。三中全会结束不久，他于10月5日第二次向中央提出《政治意见书》，12月15日他又给中央政治局写信，再次明确表示：“我现在唯一的目的，只要实质上一切策略改变过来，我个人怎样打击毫无问题，我还是要很努力很勇敢为党工作。”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啊！在信中，他对三中全会的错误做法理直气壮地提出批评：“既然承认是路线斗争，就要根据我的意见书和文件及记录上的

话，做理论上、思想上的斗争；不是一顿拳头打击何孟雄就算了事。”更可贵的是他既坚持真理，又修正错误，襟怀坦白地承认自己有时存在着方式不妥、考虑不周、上纲过高、提法不准的毛病和缺点，表示今后要在实践中加以改正。

三中全会的错误作法，引起共产国际的反对。共产国际东方部批评说：六届三中全会“主要的火力不是集中在克服党的一部分领导的托洛斯基盲动主义的路线，而是机械的了解右倾的主要危险，而把火力集中到何孟雄方面；这个政治上的手段，三中全会的领导者不但是用来掩盖托洛斯基盲动主义的错误，而且模糊了真正右倾在实际工作上的表现，以及假右倾表现（何孟雄）。”^①

1930年11月，瞿秋白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国际来信，先后作出了《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政治局十二月九日决议》，并发出了《中央紧急通告》，肯定了立三路线错误和承认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1930年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又作出了《关于何孟雄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何孟雄同志政治意见书一般是正确的，是合乎国际路线所要求的观点来反对当时中央立三路线的观点。二、何孟雄同志当时在党的各级会议上，在与同志谈话中，一般的说来，孟雄同志的意见多数是对的，当时江苏省委和中央代表以及在三中全会上、甚至国际来信后中央代表发言上，给孟雄同志以取消

^① 《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2期71页。

派暗探作用和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与攻击，是很大错误的，……当时江苏总行委停止何孟雄同志的工作，后来省扩大会议没有要何孟雄同志出席并开除其候补省委委员，这是严重的错误……。三、中央政治局特决议取消这些决定，并公布孟雄同志意见书与这一决议。”

可惜的是，这份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决议，迟迟未予公布。对何孟雄的工作也一直没有恢复。12月14日，何孟雄又致函远东局，要求公布他的意见书和自苏代会以来争论的记录，要求急派工作，参加斗争。同时，他再给中央政治局写信，要求召开象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以接受国际决议和改造中央领导机关。

反王明上台

在反立三路线的后期，以王明为代表的留苏回国的年轻干部，也曾与何孟雄等人一起协同作战。但是，王明和何孟雄不同。他不是帮助党清算“左”倾思想和“左”倾路线，而是以“左”倾教条主义反对立三路线的所谓“右倾”，企图以一个新的“左”倾路线来代替立三路线。何孟雄反对立三路线的“左”倾，是为了“将实际工作意见贡献于党”，使党的“工作走向正确道路，使工作有快的推进”。^①王明和何孟雄在反立三路线中的两种不同动机，是尔后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

^① 《何孟雄文集》第191页。

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后，在王明等人带动下，党内掀起一场反“调和路线”的斗争。何孟雄、罗章龙等人也积极参加。当时他们都认为瞿秋白继续坚持立三路线，犯了“调和路线”的错误。因此，他们一致主张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召开紧急会议，接受国际决议，彻底批判立三路线，改造中央领导机关。

他们的这些主张，反映了国际来信中“左”的思想影响，表现出一种过分的估量和惩办主义倾向。当时，中央政治局接受了他们要求召开紧急会议的意见，并于1930年12月9日作出召开紧急会议的决议。

不久，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华。他这次来华的主要目的就是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改组以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扶持王明上台。米夫来到上海后，首先找王明密谈。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是米夫的得意门生，在中共“六大”会议上，斯大林派米夫作指导，王明给米夫当翻译，米夫就想把王明塞进中央委员会，因遭到大多数代表反对，而未达到目的。这次密谈后，王明摸了米夫的底，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顷刻之间，就把召开紧急会议的主张，变为坚决要求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并翻过脸来打击坚持召开紧急会议的何孟雄等人。他为了上台，不惜出尔反尔，玩弄阴谋手段，制造党内混乱，挑起一场大的争论与冲突。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一手策划和操纵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会前，米夫起草了会议文件，圈定了出席会议的代表名

单，对有些持不同意见的中央委员不让到会，并规定列席会议的非中央委员一样有表决权。他还事先拟定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和补选的中央委员名单。开会那天，许多到会代表还不知道是开四中全会。米夫为了保举王明上台，不择手段，公然残踏党章，破坏党的民主生活，违背党的组织纪律。结果，会议一开始就争吵起来。罗章龙等人公开反对召开四中全会，要求改期召开紧急会议。何孟雄以列席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对如此召开四中全会也非常反感。他与王明围绕会议性质和议程问题发生了争执。会议上的意见分歧，在最后选举时达到了高潮。米夫以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名义，提出了政治局委员名单，罗章龙、何孟雄等人联合提出了不同的候选人名单。在米夫的强行压制下，会议以1票之差的微弱多数通过了米夫事先准备的名单。这样，王明一步登天，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实现了他长期以来夺取中央领导权的欲望。六届四中全会开了个违背党章、破坏党内民主的先例。这次会议不仅没有丝毫的积极作用，而且给党遗留下恶劣的后果。

何孟雄等人对米夫、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的丑陋表演十分气愤，会后给共产国际写信控告他们，并和罗章龙等出席会议的16位代表一起发表了《反四中全会代表告同志书》，进行了一场反王明上台的重大斗争。

为了扑灭反王明上台的大火，由米夫出面召集反四中全会的代表开会，对他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放弃反王明上台的活动，支持六届四中全会，并声言反四中全会就是

反国际代表，反国际代表就是反党，就要开除党籍。会后，何孟雄并没有停止反王明上台的斗争，王明便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他进行“无情打击”。他除了给何孟雄扣上一顶顶“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代表”、“右派领袖”、“反党”、“反国际”等政治帽子外，还一手推翻党中央《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说“何孟雄同志的政治意见书在四中全会上及四中全会后又和以前不同了，他现在主要是从右边来进攻国际与四中全会的路线。”王明还在他再版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里，恬不知耻地自诩为最早反立三路线的英雄，歪曲事实，攻击何孟雄是反立三路线中“最不坚决的分子”。可是，有力的历史见证人李立三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举行的会议上说：当时“一切火力都集中在何孟雄一人身上……中国党内只有他一个人公开起来反对我的错误。根据这一点来责备他右倾是没有理由的。”^①

王明为了扫除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最大障碍，对何孟雄除了开会批判、写文章诬陷攻击外，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扩大的全体会议告全体同志书》、《中央政治局关于一月十七日全党团会议与江苏省委报告的决议》、《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书》等中央文件上，公开点名批判何孟雄，妄图一举把他批倒批臭，置于死地而后快。

经过反立三路线考验的何孟雄，又领受了王明的“残

^① 《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9期。

酷斗争，无情打击”。但他立党为公，光明磊落，不怕高压，不怕诬陷。就是后来被敌人逮捕入狱，他还继续坚持和王明“左”倾路线作斗争。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何孟雄在这场斗争中，也存在着情绪偏激、反对面过宽等缺点。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能保持清醒头脑，并未跟随罗章龙等人走向分裂党的道路。据王克全说：江苏省委“在分裂的前一天，在中山旅馆开了一个会，我曾不同意组织第二省委，与孟雄、资平、蒋云同此主张。”^①至于而后罗章龙正式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与中央分裂，那是何孟雄被捕半个月以后的事，与何根本无关。

无数事实证明：无论在反立三路线还是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中，何孟雄不愧是我党一位坚持正确路线的杰出代表。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小组讨论会上，谈到何孟雄两次挺身而出反对“左”倾路线时说：“谁敢反？立三有权的，王明还有个米夫，反他们是很不容易的。”并号召全党向何孟雄学习。

^①，《王克全声明书》，1971年5月3日。

西藏和平解放始末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全国除西藏、海南岛、台湾等地以外，都已获得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宣告成立。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中央作出了解放西藏的决定，命令人民解放军积极准备向西藏进军，同时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京谈判。当其采用军事和政治手段进行对抗后，1950年10月，人民解放军举行了昌都战役。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和谈代表到达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一年冬天，人民解放军分别自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开进西藏首府拉萨和日喀则、察隅、噶大克等边防重镇，西藏全区和平解放，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里，实现了全国大陆的统一和国内各民族的大团结。

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疆，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西藏地区与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和缅甸等国接壤，国防地位十分重要。解放前的西藏是一个封建农奴制社会，实行“政

教合一”的上层僧侣与贵族专政，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悲惨痛苦。临解放时，西藏约有120万人口，藏族占94%，基本上都信奉佛教，藏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无不深受宗教的影响。西藏与祖国内地关山阻隔，交通极其不便，处于几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

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远在公元七世纪时，唐朝就与吐蕃王朝通好，文成公主与藏王松赞干布联姻，密切了相互的交往。元朝中央政权统一西藏，建立行政机构，委派官员管理，西藏地方正式归入中国版图。在以后的数百年间，西藏同祖国的关系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到了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向西藏地区伸进了魔爪。英国在1888年和1903年两次武装入侵西藏，虽受到藏、汉各族人民的英勇抵抗，但腐败的清朝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关于西藏的有损我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①帝国主义者还在西藏上层集团中培植亲帝分裂势力，挑拨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关系，策划所谓“西藏独立”（实际上是使西藏成其殖民地或附庸）的阴谋活动，造成了西藏地方同祖国关系的严重危机。

西藏独特的地理、历史、社会情况，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成为世界上一个神秘而又敏感的地区。

1949年秋，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由亲帝分裂势力控制的西藏地方政府，竟然以“独立国”自

^① 指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1893年《中英会议藏印续约》、1904年英藏《拉萨条约》和1906年的《中印续订藏印条约》。

居，采取政治、军事的手段，自称为“文武两手”对抗即将到来的西藏解放；组织“军饷局”等应变机构，由噶伦等政府主管官员直接掌握“军饷局”以及“外交局”，^①藏军司令部的活动；在广播中妄称“西藏从来就是独立国家”，诬蔑祖国人民解放西藏地方是“侵略行为”；并于7月8日下令，驱逐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及其他汉人（当时称“驱汉事件”^②），妄图断绝中央与西藏之间的隶属关系；11月9日决定：派出官员到美国、英国、印度等国乞求军事援助（当时称“亲善使团”，^③由于中央人民政府及时揭露和警告未能实现），将藏军14个代本（相当团，编制500人）扩充为17个代本，加强藏北和金沙江一线的防务。西藏当局还通过印度驻拉萨代表理查逊等，在印度购买了“可装备一万多人”的枪支弹药。^④在西藏负责电台工作的

① 1942年西藏地方当局成立的“外交局”，要求外国有关事务与其联系，当时国民党政府就拒绝承认，它是帝国主义策划“西藏独立”的产物。

② 1949年7月8日，西藏地方当局以“遣走一切可疑的共产党秘密工作人员”为借口（解放前西藏并无中国共产党组织活动），下令驱逐了国民党驻拉萨办事处及其他一些汉人。新华社于9月2日发表社论，揭露帝国主义幕后策划的阴谋。

③ 1949年底，西藏地方政府拟派出官员向外国求援，美联社对外透露时称之为派“亲善使团”，1950年1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提出警告，使英美等国不接受西藏派出的官员，西藏的代表团未能成行。

④ 理查逊，英国人，原为英国后是印度驻江孜商务代理兼驻拉萨代表，参与幕后策划“西藏独立”活动，为西藏当局策划军事部署、筹措物资等。1950年6月16日，理查逊回答西藏“外交局”官员：“已交藏方的枪支，可以装备一万多人”。

英国人福克斯，为藏军军事部署出谋划策。美国人汤姆斯也进入西藏活动。

但是，具有反帝爱国斗争传统的西藏人民，对亲帝分裂分子损害祖国统一的行径是坚决反对的。1949年10月1日，在青海省的班禅额尔德尼^①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希望早日解放西藏。11月，原西藏热振活佛堪布益西楚臣，在西宁控拆帝国主义破坏西藏民族内部团结的罪行。1950年1月，在北京的藏族知识分子集会，斥责拉萨当局背离祖国的行为。2月，康藏地区上层知名人士格达活佛、夏克刀登、帮达多吉等派代表到达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表示：将同当年“博巴”^②政府支援红军北上抗日那样，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为粉碎帝国主义策划“西藏独立”的阴谋，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满足西藏人民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愿望，毛泽东于1950年1月初指示：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为主，在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的配合下，准备进军西藏，要求迅即调查西藏情况，作好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中共中央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接受并迅速部署了这一任务，确定以十八军为进藏之主力，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并抽调10余个工兵团、运输团，组成支援司令部，提出了在进军中

① 九世班禅因与十三世达赖失和，被迫于1923年逃到内地，住青海省湟中县塔尔寺，1937年病逝。班禅额尔德尼是第十世班禅。

②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过甘孜等地时，帮助建立的革命政权（“博巴”即藏族人民的意思）。格达活佛任副主席，夏克刀登、帮达多吉任部长。

“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重要原则。1月24日，经中央批准，组成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张国华（军长）为书记、谭冠三（政委）为副书记，王其梅（副政委）、昌炳桂（副军长）、陈明义（军参谋长）、刘振国（军政治部主任）、天宝（藏族政协代表）为委员，负责统一筹划进军和经营西藏的工作。2月15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发出《解放西藏进军政治动员令》，号召进军部队充分认识解放西藏的意义，忠实地执行各项政策，亲密团结康藏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克服一切困难，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

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决定，由青海和新疆部队派出少量骑兵，配合西南部队的行动。

刚参加了成都战役，已受命驻防川南并兼地方工作的第十八军，在接受进军西藏任务后，积极进行了政治动员和物资准备工作。广大指战员迅速扭转在川南安家的思想，迎接向康藏高原进军的光荣任务。2、3月份主力投入川西地区剿匪，扫清进军途中障碍。4月开始以一部兵力抢修通过二郎山以西的公路。同时，由副政委王其梅和第二参谋长李觉组成的前进指挥所，率领一支精干的先遣部队，进驻西康甘孜、巴塘（旧称巴安）地区，为后续部队进军作准备工作。云南、青海和新疆军区准备进藏的部队，也进行了思想动员、物资准备，并修筑道路等。

中央在调查研究了西藏的历史与现状、深入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以后，于5月初明确提出对西藏准备军事行动的同时，积极争取实现和平解放的方针，使西藏问题得到

和平解决，以利于加强藏汉民族团结和西藏社会安定。1950年5月17日，中央在给西南局的一份电报中，在分析了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度、民族宗教问题突出等特点后，指出：基本的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中央要求西南局起草一个与西藏地方当局进行和平谈判的若干条件。西南局据此精神，迅即拟定了十条政策，经中央5月底批准，由进藏部队内部掌握执行。十条政策的内容是：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里来；

（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喇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

（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

（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

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

(十)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以上十条政策，体现了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原则，是进藏部队开展政治争取工作和指导进军行动的基本依据。

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制定后，为促使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谈判，党中央、西南局、西北局以及进藏部队，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

一、扩大政治影响。由于历史上形成的藏汉民族隔阂、反动派对共产党的造谣诬蔑，以及语言不通等障碍，给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带来许多特殊困难。为此，中央要求进藏部队必须执行好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以实际行动来搞好团结，消除隔阂。4至7月份，十八军先遣部队到达甘孜、巴塘地区后，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民族、宗教政策，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行军中不进寺庙、不住经堂，修路时不损害“马尼堆”、经塔等宗教设施，不在寺庙附近打猎捕鱼，不触动其“神山”、“神水”。由于运输困难，一段时间里，先遣部队供应严重不足，广大指战员喝稀面糊、吃马料，甚至捕鼠雀充饥，也不妄取群众一粒粮食。部队领导大力进行对上层人士的团结教育工作，宣传党的政策，调解部

落之间历史纠纷，用协商的办法解决采购和运输问题，而不征粮款、不派“乌拉”（无偿差役）。部队上上下下都做群众工作，为藏族同胞做好事，帮助生产劳动，给予免费治病等。从巴塘等地入伍的 200 多名藏族青年以及中央派出的数十名藏族干部，在上述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部队秋毫无犯的纪律和真心实意为群众服务的精神，很快赢得藏族人民的理解和信赖。藏族同胞称赞解放军为“嘉沙巴”（新汉人），热情欢迎、积极支援解放军进藏。这种影响逐渐传播到金沙江以西，传播到全西藏，对后来西藏的和平解放起到了良好作用。

二、开展政治争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央就通过电台广播，声明西藏地方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1950 年 1 月，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给西藏当局写信，宣传中央的方针政策，信通过商人传到拉萨后，西藏当局曾开会讨论并复了信。5 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办少数民族藏语节目后，即播发了在佛教界颇有声望的喜饶嘉措大师的讲话，他谈到共产党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希望达赖喇嘛勿听信帝国主义的谣言，这个讲话在西藏上层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进至金沙江东岸之邓柯、德格、巴塘的十八军先遣部队，也向当面之藏军主官写信，阐明形势，晓以民族大义，要其迅速作出抉择。新疆独立骑兵师进藏先遣连，于 8 月下旬进至阿里地区改则后，在当地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了西藏阿里总管派代表前来联系，商谈了人民解放军在当地开展活动的事宜。在红军长征时担任过“博巴”政府副主

席的甘孜白利寺活佛格达，要求去拉萨为和平解放西藏尽力，受到了中央的赞扬和支持。格达于7月10日自甘孜启程赴藏，沿途宣传中央的政策法令，劝说土司头人、藏军官兵勿与人民解放军为敌。7月24日格达抵昌都后，被西藏昌都总管扣留，8月22日遇害身亡。在此前后，西北局派出了“青海寺院赴藏劝和代表团”。该团于10月中旬行至西藏黑河（现那曲）附近时，被西藏当局所阻拦，代表团的夏日仓活佛等人去拉萨被监视；工作人员迟玉锐等被押送至乃东软禁（直至1951年初和谈前才解除）；其团长当才·土登晋美诺布经亚东逃亡国外。1950年4月，中国与印度建立外交关系，8月，驻印大使馆临时代办申健到达新德里后，会见了在年初到达印度、声称要同中央谈判的西藏代表团官员夏格巴·汪秋德丹等，^①传达了中央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要他们迅速至北京谈判。9月17日、23日，新到任的袁仲贤大使又两次敦促他们务必尽速至京，“否则将承担后果”。而夏格巴等以种种借口拖延，企图延缓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时间。在中央对西藏当局的争取作到仁至义尽仍然未得到响应时，才不得不开始了军事行动。

三、进行昌都战役。昌都地处川康入藏的咽喉通道，

^① 1949年底，西藏当局决定向国外派出“亲善使团”的同时，也向中央派出一个代表团，由堪穷（四品官员）土登结波任团长，孜本（噶厦中负责财务与人事的官员）夏格巴任副团长。该团于1950年2月抵印度。6月15日准备乘飞机赴香港时被印方阻止，后与我驻印大使馆联系好，9月6日同大使馆申健代办会见。

是藏东政治、经济中心，西藏当局在此部署藏军 10 个代本约 4500 人的兵力，另加民兵 3500 人，妄图依仗其军事力量并凭借金沙江之险，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为打破其以武力抗阻的企图，促使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人民解放军决定举行昌都战役。8 月下旬，雅安至甘孜段公路通车，运输部队完成紧急抢运物资的任务。9 月底，参战各部队进至战役展开位置。10 月初，在规定西藏代表赴京谈判的限期已过 10 余天后，西南军区下达了战役开始命令。10 月 6 日，部队横渡金沙江，十八军一五四团和由玉树南下的青海骑兵支队，迂回昌都以西之类乌齐、恩达一线，截断藏军退路，十八军参战部队主力和由云南丽江北上的一二六团，从南北两翼包围和正面攻击。经过一些战斗，10 月中旬各部逼近昌都。10 月 12 日，藏军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率部 380 余人在芒康（旧称宁静）起义。18 日昌都守军撤离。19 日我军进入昌都城。21 日到达昌都西南之竹阁寺的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在派人同解放军取得联系之后，下令总管署及藏军 2700 余人放下武器。24 日昌都战役结束。由于在战前明确规定了各项政策，强调在战役过程中对藏军的政治争取，尽量避免对民兵作战，切实优待俘虏等，从而争取了藏军 1 个代本起义，以及溃散的近 3000 名藏军和民兵携械来归。这一胜利，解放了昌都广大地区，打开了进藏的必经通道，粉碎了帝国主义及西藏亲帝分裂势力妄图以武力顽抗的迷梦，震撼了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促使其迅速发生分化，为和平解放西藏铺平了道路。同时还使中央的方针政策直接

同藏族人民见面，人民解放军以完全不同于旧军队的形象在藏区出现，荡涤了一切反动派的造谣诬蔑，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

四、外交工作配合。外国势力一直觊觎着西藏，妄图阻挠中国的统一。昌都战役之前，印度政府曾要求我对西藏不要“使用武力”。中国政府答以：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希望印方促使西藏代表团迅速到北京。印度则以中国停止进军西藏，作为代表团赴京的条件。人民解放军解放昌都后，印度政府又连续三次照会我国政府，公然干涉我国内政，称“中国军队入侵西藏，是可悲叹的”，要求保持他们在西藏设商务机构、驻军及邮电通讯等特权。中央人民政府明确表示：西藏问题是我国内政不容外国干预，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军西藏保卫国防，印度在西藏地方的商业、外事等方面问题可同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循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印度在进行外交干涉的同时，派兵进一步侵占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1950年11月8日，滞留在印度的西藏代表团，在外国的唆使下，向联合国发出“呼吁书”，妄想由联合国来干涉中国人民解放西藏。11月15日，美国指使萨尔瓦多政府向联合国大会提出“西藏问题”提案。在辩论中，该提案遭到多数代表的冷落，“联大”总务委员会决定延期审理此案。所谓“西藏问题”提案被搁置起来，帝国主义的阴谋再次破产。

昌都战役后，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进一步加强。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颁发藏汉文布告，在藏区公布了十条政策的基本内容。入藏部队派出宣传队，向广大群

众进行宣传，还把宣传品发给过往客商、释放的藏军官兵以及去拉萨等地的朝佛者，多方扩大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影响。对被解放的藏军官兵，都发给路费和马匹，释放回家；对其中代本（相当于团长）以上的官员，则按原来的品级特殊优待，从生活上给予照顾。部队负责人同他们座谈，反复谈话，帮助他们解除顾虑，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开始有所认识，逐渐转变了对中央的态度。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较快地接受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站到了维护祖国统一方面。11月9日，他和在昌都的40余名官员联名写信给达赖喇嘛，陈述中央和谈方针的内容，建议迅速派人与中央谈判，并说解放军已不再继续前进，“目前汉藏和谈是个时机”。阿沛派亲信官员日夜兼程将信送往拉萨。

解放后的昌都，实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社会秩序安定。1950年底，组成了有各界代表参加的统战性质的政权机构——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王其梅任主任，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罗登协绕、邦达多吉、降央伯姆、平措旺阶、惠毅然、德格·格桑旺堆任副主任。

西藏统治集团在昌都地区的武力对抗失败后，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以摄政大扎为首的“主战派”为其失败辩护，一面扣留从青海入藏的劝和代表作人质，并夸大形势的严重性，称“拉萨危在旦夕”；一面加紧同外国联系，准备逃跑。原不赞成打仗的以三大寺为代表的“主和派”，则追究在印度的西藏的代表团未赴北京的原因，主张另派代

表去昌都同解放军谈判。西藏地方政府许多官员都明白，只有“和”，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产。这一场争论，动摇了主持西藏政教事务的摄政大扎的统治。内部斗争的结果，执政 10 年的摄政大扎被迫辞职，十四世达赖喇嘛于 11 月 17 日亲政。

在急剧变化的形势下，达赖喇嘛亲政后的西藏统治集团仍弥漫着慌乱不安的气氛，一些官员陆续将贵重物品运往国外，不少人在准备后路。各地向西藏地方政府报来的假情报说：“共军 800 名骑兵从玉树出发”，“改则一带大批共军接连到来”，引起了上层人士的惊慌。此时，阿沛等 40 名官员的信从昌都送到了拉萨。信上说解放军已停止前进，建议派人和谈。统治集团在内部紧急密谋后，决定一面派四品官员土登列门与桑颇·登增顿珠前往昌都，同人民解放军谈判；一面准备立即前往亚东，伺机逃往国外，并通知夏格巴在国外作好安排。12 月 19 日，达赖喇嘛任命罗桑扎喜、鲁康娃为司曹（即代理摄政），留守拉萨；达赖本人及索康噶伦等 30 余名官员，于当晚深夜出走。达赖离开拉萨，引起了人心浮动，三大寺认为这是达赖受骗，途中也有僧人闻讯阻留。

土登列门和桑颇代表，于 1951 年 2 月 5 日到达昌都，他们带有达赖喇嘛写给王其梅的信，信中说：“这次根据昌都总管噶伦阿沛及其下属的报告，此处已派出和谈办事人员”。同时指定阿沛为负责谈判的代表。达赖另信告阿沛，要他根据“五项条件”进行谈判。这些条件未涉及“西藏是中国领土”这一原则问题，基本上是为“西藏独立”

进行辩解的。西藏当局派出较低等级的代表和提出这样的条件，实际上带有试探性质，并企图通过谈判，延缓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行动。

达赖喇嘛一行，于1951年1月2日到达亚东后，随即召回在印度的西藏代表团和商务代办机构的官员。1月上旬连日开会，研究外国对西藏地方政府支持的程度。夏格巴等人报告了美国、英国、尼泊尔驻印大使及印度外交部的态度，陈述这几个国家都认为不能采用战争办法对付共产党，只有谈判才是上策，至少表面上也应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现在难以对西藏当局进行军事援助，等等。对此，达赖喇嘛等许多官员均感到意外和失望。看来靠外国支持搞所谓“西藏独立”的局面已难以维持下去，而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则殷切地期待他们归来，并保证其职权、地位和财产不受损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能不面对现实，作出关系其前途和命运的抉择。1月11日，西藏官员会议建议，西藏方面派出的代表应去北京，正式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1月18日，达赖派人到印度，向袁仲贤大使送交了请求谈判的信。袁仲贤及时上报了这一情况。中央于1月29日复电表示欢迎，并嘱袁仲贤代表毛泽东主席祝贺达赖喇嘛亲政。袁仲贤照此复函达赖，使达赖受到很大鼓舞。2月17日，达赖喇嘛分别写信给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称，除已令阿沛等立即经昌都前往北京外，另派出三品官凯墨和土丹旦达经印度去北京谈判，并期望“达成好的协定”。

在昌都的阿沛·阿旺晋美等和谈代表于3月29日起

程，经甘孜、雅安、重庆、西安，于4月22日到达北京。他们在途中和抵京时，均受到热烈欢迎。由亚东派出的凯墨和土丹旦达，于3月初离藏，转道印度赴京。他们在新德里，曾拜会了印度总理，听取其对和谈的“指教”。此二代表于4月26日抵京。两路代表在北京会合后，研究了如何以原来的五条和后来补充的条件进行谈判问题。达赖喇嘛还委托担任翻译的彭措扎西（达赖之姐夫）私下转告阿沛，无论如何也要把谈判搞好。

在西藏和谈代表到达北京的前夕，中央指定了李维汉等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谈全权代表。

班禅额尔德尼也于4月27日到达北京，积极支持和配合有关和谈的工作。

1951年4月29日，在首都北京正式开始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

中央人民政府方面的全权代表是：首席代表李维汉（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代表张经武（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国华（西藏工委书记、第十八军军长）、孙志远（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

西藏地方政府方面的全权代表是：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西藏噶厦噶伦），代表凯墨·索安旺堆（藏军总司令）、土丹旦达（秘书长）、土登列门（四品官员）、桑颇·登增顿珠（四品官员）。

4月29日，举行首次谈判，实际上是预备会议。双

方就谈判的程序和步骤等问题交换意见。在会上，李维汉说：“我们是一家人，大家商量把事情办好”。他建议大家学习《共同纲领》和“十条公约”。谈判的气氛是融洽友好的。接着，中央邀请了西藏全体代表参加“五一”节的庆祝活动，阿沛登上天安门城楼，中央同时邀请了班禅登上天安门城楼。班禅和阿沛进行了友好会面，他们一齐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5月2日，举行第二次谈判，集中商讨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问题。李维汉首先就西藏是祖国的一部分，为保卫国防安全，防止帝国主义侵略，详尽地阐述了必须进军的道理。阿沛发言说，西藏方面承认它是中国领土，但不赞成解放军进去。理由是：西藏的东面、北面都与内地相连，只有西南面与印度毗邻，印度没有侵略西藏的意图；如果边境有事，再请解放军进去；还可以把藏军扩大并编成解放军的一部分，对外讲西藏已经有解放军了。中央代表指出，帝国主义侵略西藏是不可否认的，而印度继承了英帝国主义的特权，西藏地方政府过去没有国防（藏军是向着内地部署的），现在要建设国防也不容易。西藏交通不便，一旦有事，军队很难及时开进去。至于藏军改编成人民解放军，那是不成问题的。谁都知道，藏军战斗力不强，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又不欢迎强有力的人民解放军去保卫国防，这岂不是个矛盾！中央代表还就人民解放军的性质、纪律、入藏后的供应等问题作了说明。此时，西藏代表已承认上述的矛盾，但又称代表团没有决定权，并对进藏人民解放军的人数、时间、入藏路线、驻防

地点等提出询问，要求中央明确下来，以便向西藏地方政府报告。

休会期间，代表们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观看了体育比赛和文艺演出，双方代表在友好接触中，对许多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

5月7日的第三次谈判，围绕着进军人数、驻地、藏军改编等问题展开讨论。西藏方面希望军队进去的人数要少，在拉萨不能多驻军，藏军不立即改编等。中央代表当即明确表示：进藏部队是一个军左右，驻守在国防线和交通要道，拉萨只驻少量部队，藏军的改编将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有关这方面的事情，中央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加以照顾。为表明中央方面的诚意，还商定了《关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若干事项的规定》，由双方内部掌握。对此，西藏代表表示满意。

随后，转入对“十条公约”内容的讨论。西藏代表在谈判前，已根据中央的建议，对“十条”进行了仔细研究。他们表示对一、四、五条没有什么意见；对第二条（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和第三条（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概不变更，达赖的地位、职权不予变更）的精神是否一致提出疑问；对第八条（改革西藏旧制度问题）提出可否改为先由西藏地方政府提出来，再和人民商量？

5月10日，举行第四次谈判。中央代表发言，详细解释民族政策，强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一项基本原则，而西藏的政治制度不变则是根据目前情况来决定的，如果西藏人民愿意有些变动，那由西藏方面自己去作。因此，

这两条并不冲突。中央代表表态赞成对第八条的修改意见。西藏代表听过解释后，表示对“十条公约”再无意见。

后来，在谈判设立军政委员会，特别是恢复班禅固有地位问题时，曾一度出现了僵持局面。西藏代表认为“十条公约”中无此内容，这次谈判是解决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提出解决班禅和达赖之间的历史积怨问题不能接受。中央代表建议，双方各抽出两人，进行专门研究。5月16日，李维汉对此作了长篇发言，就军政委员会的作用、职权、人选等回答了西藏方面提出的问题。在谈到班禅问题时，又详尽阐述了西藏的历史和中央的民族政策，揭露了帝国主义的阴谋，并针对西藏部分代表在这一问题上的疑虑与偏见，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开导。经过反复协商，西藏代表又发电请示了西藏地方政府，终于推动了谈判的进展。

5月20日，举行第六次谈判，顺利达成协议。协议条款由原来的十条增至十七条。

5月21日最后一次会议，研究协议的汉藏文表达等技术问题，气氛已经十分融洽。

和平谈判能够获得圆满成功，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在中央人民政府方面，一是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关怀与指导，二是中央所提条件公平合理，三是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在谈判中能够平等协商，以理服人。在西藏地方政府方面，由于其内外政策四处碰壁，“和”已是上策，达赖喇嘛殷切期待“把和谈搞好”。阿沛等和谈代表深明大义，反帝爱国。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出现的中华民族强大的民族内聚力。当他们识破帝国主义的分裂阴谋后，就坚决地维护祖国的统一，使西藏回到祖国的怀抱。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正式签字。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主持了签字仪式。双方全权代表在协议上庄严地签字盖章后，李维汉、阿沛·阿旺晋美致词，朱德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

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设宴庆祝协议的签订。双方和谈代表及班禅应邀参加，各方面人士180余人出席。毛泽东致词说，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

5月28日，协议正式公布。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社论，指出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民族从此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是西藏人民从黑暗和痛苦走向光明和幸福的第一步。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的消息公布后，全国许多地方群众集会或游行，热烈欢庆祖国大陆全部得到解放。班禅额尔德尼于5月29日发表声明，表示愿为正确执行全部协议，为西藏与全国各民族的团结和西藏民族的内部团结而奋斗。

在亚东的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官员，通过电台与

在京谈判的代表保持联系，对重大问题作出决策。随着协议签订结果的电讯传来，他们一面觉得由此可以免除战争灾祸，能够结束流浪在外的生活了；同时又感到协议的一些条款难以接受，想等着看到协议的全文以后再表示态度。

为促进协议的贯彻执行，中央委派张经武为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前往西藏工作。6月13日，张经武等自北京启程，西藏和谈代表凯墨、土丹旦达、桑颇同行，经香港、新加坡，绕道印度，于7月14日抵达西藏亚东。两天后，张经武代表同达赖喇嘛会晤，转交了毛泽东主席给达赖喇嘛的信和协议的抄本。毛泽东在信中肯定了达赖亲政后派代表来京谈判“是完全正确的”，希望“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达赖随即表示将返回拉萨。7月20日，达赖及随行官员自亚东启程后，张经武等也于7月22日离开亚东，8月8日到达拉萨。

达赖喇嘛于8月17日返回拉萨。达赖的返回，使反动分子策划的政治阴谋破产。但是，西藏上层中不少人仍有疑虑，顽固的分裂分子在暗中破坏捣乱。张经武在拉萨致力于稳定上层，开展统战工作。他普遍地访问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宗教界上层人士，进行座谈、赠送协议、宣传品，解释中央方针政策，还给寺庙僧尼发放布施。9月9日，王其梅率十八军先遣支队到达拉萨，积极配合了上述活动。西藏地方政府参加和谈的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于9月12日返回拉萨。阿沛抵拉萨后，首先向达赖

喇嘛报告了在北京谈判的情况，随后在9月24日召开的西藏官员扩大会议上，就谈判的经过和协议的内容作了详细介绍，并出示了协议的正本。会议经过两天的激烈争论，总的认为“协议本身很好”，但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对此张经武、王其梅又作了大量的工作，就协议的条款进行了反复的解释。经过这些工作后，西藏上层中多数人已表示初步理解和赞成协议。1951年10月24日，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对协议的拥护，愿“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毛泽东主席于10月26日复电表示欢迎。

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订后，军委主席毛泽东正式发布派必要兵力进驻西藏的命令。人民解放军西南、西北部队，分别自西康、云南、新疆、青海向西藏开进，正式开始具有历史意义的和平解放西藏大进军。

由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率领的十八军机关一部，于7月1日自甘孜出发，17日抵达昌都，在此作进一步的准备后，于8月28日离开昌都继续前进，10月26日到达拉萨。五十二师一五四团也同时进抵拉萨。该师师部率一五五团，10月7日进驻工布江达（旧称太昭）。

由范明率领的西北西藏工委，于8月22日由青海香日德出发，12月1日到达拉萨。西北西藏工委（进藏时命名为十八军独立支队）由西北局、西北军区根据中央的指示，于1951年初在甘肃兰州筹建，任务是参加解放西藏的工作，护送班禅进藏。2月17日，西北军政委员会

任命范明为驻班禅行辕代表，牙含章为助理代表。6月7日，西北局正式通知西北西藏工委组成人选：范明为书记，慕生忠、牙含章、白云峰为委员。在此前后，陆续调集干部及警卫部队1100余人，筹措了大批物资和上万头骆驼、马匹。7月底，人马由西宁等地向香日德集中，后分为两个梯队于8月22日、28日出发进藏。因中央已决定班禅额尔德尼暂缓进藏，班禅行辕派出约200人的先遣工作队，由计晋美率领与西北西藏工委同行返回西藏。

新疆独立骑兵师于1950年8月派出先遣连进入西藏阿里地区改则后，又在1951年5月派后续部队280人人藏，于6月29日进驻普兰，8月3日进驻阿里首府噶大克。云南进藏部队一二六团，于1951年9月12日自门工出发，10月1日进驻察隅。随后，十八军进藏部队11月15日分别进驻江孜、日喀则，1952年1月进驻山南地区隆子，7月15日进驻边防重镇亚东。至此，各路人藏部队已进驻了西藏各边防要地，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完成了全部统一祖国大陆的历史任务。

各部在进军西藏途中，发扬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的精神，爬雪山、穿草原、趟冰河、渡急流，克服了高寒缺氧、供应不足等重重困难。广大指战员恪守政策纪律，宣传执行协议，坚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和影响群众的工作。部队所到之处，均受到藏族人民的欢迎，取得了各阶层人士在售粮和运输等方面的协助。

根据西藏地方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低以及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等实际情况，中央正确规定了“进军西藏、

不吃地方”的方针。在全国刚解放不久，国民经济正在恢复，接着又开始抗美援朝的情况下，中央十分关心进藏部队的物资供应问题。朱德总司令对此作了具体指示。西南局、西南军区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修筑康藏公路，在物资方面，进藏部队“需要什么就给什么”，西南地区投入了大量的物力人力修路，使康藏公路短期内通车甘孜以西，把一批批粮食等物资源源前运，基本上保障了部队的供应。邻近西藏的四川、西康、云南、青海、甘肃、新疆等省区，在筹集粮食、组织运输、修建道路等方面也进行了大量工作。各地一批医务、畜牧、气象、矿产、社会学等专家教授如李濮、林耀华、李安宅、于式玉等也随军进藏，为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巴塘等地入伍和由中央、西南、西北派去的一批藏族干部，在进军西藏的任务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后来逐步成长为西藏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级领导骨干。

进藏部队执行毛泽东关于“生产与筑路并重”的指示，除多数在后方修筑公路外，少数进入拉萨、江孜、日喀则、察隅等地，一方面在生活开支上严格实行精打细算，一方面大力进行开荒生产，开展上层统战和影响群众的工作，并逐步打通与印度的贸易关系，使部队在十分复杂困难的条件下，终于在西藏站稳了脚跟。

1951年12月19日，中央同意西藏工委与西北西藏工委会合后的组成名单：张国华、范明、慕生忠、牙含章、谭冠三、王其梅、昌炳桂、陈明义、李觉、刘振国、平措旺阶为委员。1952年3月7日中央通知，为加强党

在西藏的统一领导，确定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兼任书记，张国华、谭冠三、范明任副书记。1952年1月中央军委批准，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张国华任司令员，谭冠三任政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任第一副司令员，朵噶·彭措饶杰任第二副司令员，昌炳桂任第三副司令员，范明、王其梅任副政治委员，李觉任参谋长，刘振国任政治部主任，陈明义任后方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藏军区于2月10日在拉萨成立。

和平解放西藏协议，恢复了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职权。达赖喇嘛于1951年9月19日致电班禅，欢迎他回藏。12月9日班禅及其堪布会议厅全体官员，在牙含章等人的护送下，离开西宁，经过长途跋涉，于1952年4月28日到达拉萨，同达赖喇嘛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见，实现了西藏民族内部的大团结。

1952年9月，根据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精神，设立了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外事帮办，由中央统一管理西藏地方的一切涉外事务，取代了西藏地方政府原“外事局”的活动。到1954年，我国政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又同印度签订了有关协定，结束了印度在西藏驻军、设立邮电、驿站等机构的特权。

西藏的和平解放，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完成全国解放事业之壮举；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说，解决复杂民族关系问题的成功范例。西藏的和平解放，完成了祖国大陆的真正统一，实现了全国各民族的空前团结，揭开了西藏历史新的篇章，它将彪炳史

册，光照千秋。

(执笔：黄可)

新疆和平解放始末

朱培民

1949年9月25日和26日，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先后通电起义。为什么陕、甘、宁、青、新西北五省，只有新疆能够实现和平解放？新疆和平解放的进程怎样？中共中央有哪些重大决策？为了使大家对这些问题有一基本了解，本文拟对新疆和平解放作一概述。

探讨新疆和平起义发生的原因，必须从张治中将军主省新疆说起。1944年11月，新疆发生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伊犁、塔城、阿山三区革命，鉴于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国民政府采取了政治解决的办法，派张治中赴新谈判，在苏联驻迪化总领事的调停下，国民政府与三区达成了成立临时联合政府的协议，制定了施政纲领，张治中兼任新疆省主席，在新疆奠定了和平局面。但后来由于张治中实行了某些错误的做法，让宋希濂当新疆警备总司令，大土耳其主义分子麦斯武德当省主席，激化了与三区的矛盾，1947年8月，三区代表撤回伊宁。

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战略决战，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大吃败仗，张治中曾多次向蒋介石建议实行“和共”、“联苏”政策，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因此，张治中转而利用他作为西北军政长官的权力，想在西北一隅实行和平解决。为了争取和平解决新疆问题，他作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是1948年8月，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将反共好战的宋希濂调离新疆，让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陶峙岳兼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张治中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受张治中爱国思想的影响很深。陶峙岳去新就职前，张治中在兰州私邸向陶出示他迭次建议蒋介石力主国内和平的一些函件和谈话记录，并谈到一些今后的安排，因而对新疆将来的出路问题有了共同的默契。^①二是于1949年1月撤换麦斯武德，任命和苏联以及和三区关系比较融洽的包尔汉任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在上任之日发表《告全疆民众书》，宣布今后仍将执行张长官的“和平、民主、统一、团结”的政治主张，“誓为执行和平条款，实行施政纲领而努力”。^②2月7日，张治中在与包尔汉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十一项条款和政治纲领要全面实现，一定要加强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同伊犁要尽快地和好。在整个西北范围内我们一定要维持住和平局面，要制止战争。”^③当时包尔汉也表示：“新疆环境特殊，人民复

^① 陶峙岳：《导致新疆和平解放的历程》，《文史资料选辑》23辑第3页。

^②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第336页。

^③ 包尔汉：《日记片断》，《文史资料选辑》87辑第36页。

杂，民族有他不同的语言、风俗、生活方式，但是人民的希望是一致的，就是希望和平。”^①

张治中认为维持和平局面、制止战争“在新疆有相当把握”，^②因为张治中在新疆留下了一个以国民党民主派为核心的领导集团。在军队方面有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等；在政府中有新疆省主席包尔汉，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新疆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省府委员兼迪化市长屈武，外交特派员刘泽荣等。这个领导集团坚决执行张治中制定的政策，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我们虽然一向在本着南京政府的正朔，但实质上我们并不完全遵从南京政府的政策，例如南京政府反苏，我们都坚决的亲苏；南京政府要战争，我们都坚决主张和平。”^③这个领导集团的存在，为新疆的和平解放打下了基础。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辽沈、淮海、平津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④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就解放祖国

① 1949年9月28日《新疆日报》。

②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785页。

③ 陶峙岳：《关于新疆问题和平解决意见书》，1949年9月21日。

④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14页。

边疆的问题同王震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勉励王震，要继续发扬英勇奋战、不怕艰苦的革命精神，准备带领部队进军新疆，去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在这以后不久，毛泽东又明确指出，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①4月1日，张治中作为国民政府首席代表率代表团参加国共和谈，屈武作为代表团顾问同行。4月16日，在屈武、黄绍竑带着《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飞回南京前夕，周恩来同屈武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询问关于新疆部队将领的情况，特别是陶峙岳的政治态度。周恩来对屈武说：“国内实现和平的希望很小，如果决裂了，你要赶紧回到新疆去，策动那方面的部队起义，尽量使人民不受或少受损失。”^②国共和谈破裂后，张治中留在北平，屈武返回新疆。

二

1949年5月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会议决定免去张治中西北军政长官职务，5月18日，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这件事在西北地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马步芳是一个坚决的反共分子，他曾经扬言：“那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共产党人打到底。”^③国民政府

^① 新疆军区党委：《把五星红旗插遍天山南北》，1977年10月8日《解放军报》。

^② 屈武：《在历史转折的年代里》，《文史资料选辑》73辑第16页。

^③ 包尔汉：《日记片断》，《文史资料选辑》87辑第35、36页。

抵挡不住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就想依靠穆斯林保住西北，而马步芳则幻想依靠国民政府所供应的一切，在美国的支持下，成立他自己的穆斯林国家。当时美国人对马步芳、马鸿逵很重视，“如果两马在西北地区失败的话，打算退入新疆”，在南疆成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①

马步芳上台，给新疆一小撮国民党反共好战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以巨大的鼓舞。陶峙岳虽是新疆警备总司令，但兵权不在他手里。陶赴新上任时只带了一个副官、一个炊事员、两个警卫员，他与新疆部队没有渊源关系。新疆的部队分属两个系统，一部分是马步芳的（整编骑一师），大部分是胡宗南的（整编七十八师、四十二师）。警备总部和他们的关系只是一种象征性的隶属关系。军队中整编骑一师师长马呈祥、整编七十八师师长叶成及七十八师所属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坚决主张反共战争，他们结成反动联盟。马步芳上台后，马呈祥准备在新疆大干一场，办起了《新新报》，大肆吹捧马步芳的“拚命保命，破产保命”的战略，吹嘘马步芳之子马继援的八十二军在陇东的“战绩”，他对财政厅长贾尼木汗说：“我们都是穆斯林，要联合起来，要同心协力反对共产党”，“需要的话，美国能帮助我们。”^②6月，哈密专员尧乐波斯去兰州，策划在新疆建立亲马政权。随后大土耳其主义分子艾沙在马呈祥支持下，组织了一个所谓“向马长官致敬团”，去兰州

① 包尔汉：《日记片断》，《文史资料选辑》87辑第35、36页。

② 包尔汉：《日记片断》，《文史资料选辑》87辑第43页。

向马步芳献礼。艾沙扬言能组织 10 万维吾尔青年为马当兵，要在西北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伊敏、艾沙等人还到南疆 6 城进行反动宣传，企图把他们的势力集中在南疆，等待马步芳的到来。

与此同时，国民党民主派开始进行起义的酝酿工作。5 月，屈武返回新疆，他曾在新疆学院及汉族文化促进会做过两次演讲，报告和谈经过，表示赞成张治中的和平主张，对蒋介石没有和平的诚意隐约加以非议，并公开说共产党领导正确。特务曾附信寄给他两枚子弹向他恐吓，但他毫不动摇。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与共产党有联系，他是陶峙岳的堂弟。5 月他上书陶峙岳，力主陶峙岳率部起义，他在意见书中说：“我认为中共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是社会进步过程中所无法阻止的一种极人道极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不让一部分人吸大多数人的血以自肥。为了新疆十万官兵的生命，不应该再有输钱不输气的打算，以及为独夫效愚忠的观念了。”^①陶晋初“坚决赞成和平，甚至帮助迪化的地下秘密活动，曾用参谋处名义向警察局要出被捕的地下工作者。”^②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新疆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是最忠实于张治中的人，和张是老关系，与陶峙岳、包尔汉也非常接近，马步芳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时，“他曾向马提出必须继续执行张（治中）的亲苏政策及施政纲领，否则

① 刘一村：《一生求索为真理》，《写在天山上的碑文》第 164 页。

② 邓力群给中共中央电报，1949 年 9 月 4 日。

辞职反对，”因为他活动和平最力，“被某些反动分子骂做共产党。”^①

1949年6月26日，张治中发表《对时局的声明》，与国民党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声明甚望“国民党中央和各地负责同志能够善用理智，正视现实，以反省自咎的胸襟，作悬崖勒马的打算，悲天悯人，忍辱负重，为军民减少牺牲，为国家多保元气。现在虽未为最晚，实已到了最后机会，万不宜轻忽地听其错过。”同一天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一篇题为《评张治中声明》的新华社评论，认为“这个声明是值得欢迎的。其中对于国民党内爱国分子的劝告，是向他们指出唯一的光明出路。”^②当时新疆特意把张治中的声明和新华社的评论印了3000多份，到处散发。张治中的声明对新疆国民党民主派酝酿和平起义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新疆和平起义的最关键人物是陶峙岳将军。有的回忆文章把陶的转变写得很轻松，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陶峙岳由主张和平到决心与蒋介石集团决裂，归向人民，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极其痛苦的思想斗争过程。外交特派员刘泽荣曾经说过：“我已经用了两个月的功夫劝陶峙岳和平转变，而这位老先生太好了，不好意思倒戈。”^③陶峙岳虽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在国民党军队中虽然很少掌握真正

① 邓力群给中共中央电报，1949年9月4日。

②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851—852页。

③ 邓力群给中共中央电报，1949年9月5日。

的实权，但他毕竟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在上升，从师长升到军长，继之为集团军总司令，最后当上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副长官。陶峙岳历来注重一条做人的准则，那就是“人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如今一旦要与蒋介石集团决裂，他不可能不在思想上有所犹豫，这就形成了一种无形的精神压力。再者，当时陶峙岳的妻子和二女儿住在重庆，起义之后，国民党将会怎样对待她们呢？还有一个更为不妙的现实，是他的儿子和大女儿已经胁迫到台湾去了，起义之后，国民党能不报复吗？这时的陶峙岳，犹如下了一次炼狱，真正是“秋风秋雨愁煞人”啊！1949年6月7日，陶峙岳离开迪化去兰州，向马步芳述职，然后去重庆探望家属，一去就是47天，实际上是去“观察国内形势”。7月22日返回迪化。“回来后，态度急转，认为国民党已无前途，无力再做军事抵抗，所以倾向和平，积极进行活动。”^①7月23日，陶峙岳举行记者招待会，明确宣布：在新疆必须继续执行张长官执行的政策，对外增进中苏亲善，对内实现民族平等，以确保新疆之和平安定。他坚定地表示，本人“今后惟有竭尽棉薄，坚决执行此项政策。而驻新国军在本人指挥之下，更必能配合政治外交，一本已定方针，努力尽其应尽之职责，为新疆和平前途而贡献其全部力量。”^②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陶峙岳终于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和高度的爱国热情，不顾个人和家属的生命

① 邓力群给中共中央电报，1949年9月4日。

② 1949年7月24日《新疆日报》。

安危，选择了唯一正确的道路，决心带领新疆 10 万官兵归向人民。从此，真正开始了和平起义的策划工作。

7 月 25 日，陶峙岳亲自主持新疆警备总部周会，请省主席包尔汉讲新疆问题。包尔汉表示了走和平道路的决心，他呼吁“在政府的和平政策下，军政应该是一致的，应该共同负起责任来，达成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及人民生活安定的目的。”^①为了新疆军政负责人能协商一致，7 月底至 8 月上旬，包尔汉邀请陶峙岳、刘孟纯、屈武、刘泽荣等以及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萨维诺夫，去南山度夏，对新疆局势非正式地交换了意见。随后，陶峙岳、刘孟纯等又邀请包尔汉等及苏联总领事去迪化郊外湖边避暑，继续交换意见。这表明新疆军政负责人已开始联合起来准备举事。

8 月 19 日，陶峙岳偕供应局长郝家骏、政工处长梁客得，以检查战备为名，邀请驻喀什的新疆警备副总司令赵锡光于焉耆会晤，两人进行了密谈。赵完全同意陶的起义部署，两人约定三条：一是北疆由陶峙岳负责，南疆由赵锡光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待机起义；二是部队交给解放军，部队改编时，不要在三区干涉下改编，因民族问题严重存在；三是部队交出后，陶、赵离开部队，解甲归田，别无他求。^②鉴于新疆与甘肃毗连，酒泉是通往新疆

① 1949 年 7 月 26 日《新疆日报》。

② 《访问陶峙岳同志记录整理材料》，新疆民研所：《访问材料汇编》（一）第 120 页。

的门户，陶峙岳与驻酒泉的西北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早有暗中联络，取得了他们对和平起义的支持。

中共中央最早是从苏联那里得知新疆的一些情况的。1949年6月，中共中央派出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代表团去莫斯科，进行中苏关系的谈判。谈判期间，斯大林提出，据可靠情报，美国人企图将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等撤到新疆，与当地反动势力相结合，组织“大伊斯兰共和国”。此计划如能得逞，将给中国革命带来很大困难，对苏联也极端不利。因此建议我军加速向新疆前进。^①

中共中央得知上述情况后，遂将5月决定的“明春开始经营新疆”，^②提前到冬季占领迪化。6至7月，毛泽东多次电示彭德怀、贺龙、习仲勋，进一步对西北的大进军作了具体部署，并指出：“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毛泽东还指出：“如能于八月上半月完成打马战役休整半月至一月，九月西进，十月占领兰州、西宁及武威、张掖、酒泉，则有可能于冬季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只要平凉战役能歼两马主力，则西北战局即可基本解决，往后占领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问题，没有严重的作战问题。”^③按照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7月11日，第一野战

① 《邓力群同志谈三区 and 新疆和平解放》，新疆民研所：《访问材料汇编》（二）第179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78页。

③ 张平等：《解放战争史话》第431页。

军发起扶（风）郿（县）战役，歼灭国民党胡宗南部主力；7月24日至8月11日，发起陇东追击战，追歼马步芳、马鸿逵部；8月4日，彭德怀发出关于攻取兰州、西宁的作战命令，决定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歼灭国民党军马步芳部。

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向西北的进军，苏联主动提出可以利用新疆三区革命力量，从军事上牵制国民党。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政治秘书邓力群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身份，从莫斯科赴伊宁。中共中央认为，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的紧密合作。在此基础上迫使国民党就范，并使张治中、陶峙岳、刘孟纯等为我服务，使新疆能够和平地少破坏地接收过来，并有秩序地改编国民党军队。这可以说是中央解决新疆问题的基本方针。8月10日，邓力群率随员段恒德携电台一部离开莫斯科，14日到伊宁，15日建立“力群台”。17日，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接见了邓力群。邓向他们说明此行的任务是和此间的政权、军队、团体及其领袖取得联络，将此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情况、地理气候、风俗人情等情况，目前特别重要的是有关军事行动的敌我友各方面情况系统地报告中央，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请他们给予指示和帮助。阿合买提江等表示：“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在复杂和艰巨的任务中，关心到处在偏僻地区的他们，并派人来此联络，使他们感到很大的兴

奋”，他们将尽一切力量来帮助完成任务。^①邓力群在伊宁作了如下重要工作：

（一）邀请三区派出新疆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先由邓力群提出口头邀请，为表示郑重起见，邓力群建议中央发一正式邀请信。8月1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主任的名义，给伊宁特区人民政府阿合买提江写信，邀请派代表去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信中称：“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对这个评价，三区领导人“感到非常的满意”。^②8月20日，阿合买提江给毛泽东复电，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决定派出5名代表：新疆省副主席阿合买提江·卡斯米，三区民族军总指挥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民族军副总指挥达列尔汗·苏古尔巴也夫，新疆中苏文化协会负责人罗志，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8月22日阿合买提江等离开伊宁，计划绕道苏联去北平。8月27日，新疆代表乘坐的飞机飞至伊尔库兹克贝加尔湖地区，因气候恶劣，能见度很低，飞机撞山，5名代表及翻译组人员等共17人全部遇难。三区又通过邓力群向中共中央反映，“此间当局热望新派代表在政协开幕前

① 邓力群给中共中央电报，1949年8月17日。

② 邓力群给中共中央电报，1949年8月20日。

赶到北平，并认为此间代表如不能参加政协的开幕，对他们将是件很大的憾事。”^①9月7日，由赛福鼎、涂治、阿里木江组成的3人代表团，从伊宁出发赴北平参加政协会议。

(二) 就张治中来新疆促陶峙岳起义问题征询三区的意见。三区对此问题回答很慎重，阿合买提江说，张治中来新疆应分开政治和军事两方面来看，在军事上张对国民党军队到今天还保持很大的影响，因此他来迪化，对陶的起义可起很大作用。但在政治上对人民的关系问题上则要郑重考虑。此问题需经三区领导人集体讨论后才能正式答复。第二天三区正式答复说，张治中在新疆人民中已失去自己的声望，人民已不信任他，从政治上谈，他来新疆是没意义的，是不适当的，但他在国民党军队中有不可忽视的声望，依靠这种信任在促成陶的起义中将起很大作用则是应当承认的。为了加速全新疆的解放，为了帮助人民解放军在新疆的胜利，并避免和减少可能遇到的困难，他们赞成中央派他来迪化促成陶的起义，赞成在此间问题上中央的一切主张和决定。^②

(三) 将三区的情况，新疆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及布置情况，迪化方面军政主要人物及政治倾向的材料报告中央，以便中央作出正确决策，并将中央的有关决策及时传达给三区。当时新疆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但在抗日战

① 邓力群给中共中央电报，1949年9月4日。

② 邓力群给中共中央电报，1949年8月20日。

争时期，我党与新疆地方实力派盛世才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1937年至1942年期间，曾有百余名中共党员在新疆工作，他们对马列主义的宣传和所进行的革命工作，哺育了新疆一代革命青年的成长。党与盛世才的统战关系破裂后，一批各族有志青年组织了“战斗社”、“先锋社”、“民主青年团”等进步组织，并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地下活动。他们对迪化方面军政主要人物的思想动态的掌握是比较清楚的，这些进步组织与三区有联系，因此邓力群向中央报告的情况基本上是准确的。

兰州战役期间，马步芳又要马呈祥带兵进关去河西作战。马呈祥、叶成、罗恕人再次把部队内调问题提出来。陶峙岳多次与马、叶、罗恳谈，从全国形势、新疆特点、新疆部队的去向等方面开导他们，陶没有坚持不许进关，但提出实际问题，没有车辆、汽油、现款怎能开动？陶还说：“你们坚持要进关，我不反对，但我是不能走的；还有许多军政部属，不下十万人，我不能把他们扔在戈壁滩上。”^①但马呈祥仍坚持进关，一面把家属先送出新疆，一面赶制包有牛皮角的木质弹药箱，甚至下了开拔令。当先头部队进到迪化东郊的九沟十八坡时，兰州解放的消息传来，马呈祥不得不命令部队折回原地。

三

8月26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兰州，9月5日又解放西

^①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590页。

宁，马步芳、马鸿逵的势力全部消灭，形势的发展更有利于新疆的和平解放。首先，新疆外援断绝，退路不通，运输困难，而且士气低落，国民党军营长以下的军官都不愿意打仗。如果“不争取主动的和平解放，一定会弄到既不能战，又不配谈和的地步”，^①只有被消灭或者投降，邻省甘肃的教训“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镜。”^②其次，新疆各族人民渴盼解放，如大旱之望云霓。兰州解放的消息传到迪化后，“战斗社”就在8月29日晚上10时散发关于兰州解放的传单，同时印有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劝告国民党军投降。新疆“各族工人、学生、公教人员、士兵、中下级官兵、小商人，由于吃不饱，穿不暖，都痛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欢迎解放军早日来解放他们。迪化市现在流行的一个口号就是：‘太阳快出来的’。”^③新疆和平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新疆国民党民主派和极少数反共好战分子摊牌的时刻到了，陶峙岳、包尔汉决定将策划起义的工作公开。

8月31日，陶峙岳召集刘孟纯、刘泽荣和反共好战的高级将领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人举行军事会议，讨论新疆走什么路的问题，马、叶、罗迫于形势，“一致同意和平转变，但不愿在新疆受伊犁方面的改编，而愿意开到

① 《陶总司令告全疆将士书》，1949年10月19日《新疆日报》。

② 《省府紧急会议上包主席致词》，1949年9月28日《新疆日报》。

③ 邓力群给中共中央电报，1949年9月5日。

酒泉等候人民解放军改编”，^①他们答应在9月20日以前撤退到酒泉。当然也不能排除他们的主张中可能包含着表面投降实则抗拒的阴谋。陶峙岳、包尔汗当时打算，一俟马、叶、罗的军队开走，就可以让伊犁方面派两团人来接防，到那时就可发出通电，拥护毛泽东的八项和平主张。会后，陶峙岳、刘孟纯、刘泽荣、屈武等人分别找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萨维诺夫，他们表示，不希望新疆再发生任何流血和牺牲的事情，同时保证对人民解放军方面不做任何抵抗，并要求通过苏联方面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系，开始具体谈判。9月2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由迪化飞伊宁，刘孟纯要求与他一起去伊宁，以便直接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系，刘未成行，就请总领事转告伊犁方面，两个星期以内不要向东进兵，他们将在两个星期之内做好一切接交的准备，并声明这是唯一的要求，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其它条件。

当时，马呈祥、叶成驻绥来、呼图壁一带的军队已开始撤退，但是，“因为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随着国军的撤退，回汉民族一部分人跟着国军向东跑，而其他少数民族一部分人则向特区跑。”^②迪化一带谣言四起，到处传说“又要打仗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推波助澜，乘机煽惑，于是引起各族民众的极度不安，家家惊扰，人人自

① 邓力群给中共中央电报，1949年9月5日。

② 邓力群给中共中央电报，1949年9月9日。

危!”^①马呈祥、叶成、罗恕人更是幸灾乐祸，乘机反扑。他们策划于密室，认为陶峙岳是受了刘孟纯、陶晋初、屈武的包围，决定“清除君侧”，将刘孟纯、陶晋初、屈武拘捕起来，叶成提出应先告诉陶峙岳，马、罗同意了。叶成连夜去找陶峙岳，陶得知情况后，留住叶成，并电话约马、罗来谈。陶峙岳对他们说：“你们要捕人，第二步怎么办？新疆情形特殊，如果一声枪响，能保地方不致糜烂？这样，于你们有甚便宜？”陶表示：“我决不离开新疆，要与全省老百姓和全军将士及其家属共生存。我有这个责任，尽到责任，虽死不辞。”^②第二天，陶峙岳又只身去老满城骑一师师部与3人恳谈。陶晋初等又活动迪化警察局长、罗恕人的至交刘汉东去做3人的工作。此时，马呈祥接其父来电，得知家属已安全逃到广州，已无心留栈。加之叶成此人又非常内惧，他的老婆知道了他们的密谋之后，坚决不让叶成参加。在此内外影响下，马呈祥、叶成、罗恕人权衡利害，最后表示愿交出部队，办清手续，许其循南疆去印度。

为了安定人心，也为了造成强大舆论压力迫使马、叶、罗赶快出走，省政府向民众公开宣布走和平道路。9月9日，包尔汉在省政府中山室邀请各族耆宿及声望人士30余人举行座谈会，详细阐明了省内目前形势及政府保

① 1949年9月10日《新疆日报》。

② 陶峙岳：《导致新疆和平解放的历程》，《文史资料选辑》23辑第6—7页。

证和平的决心。包尔汉说：“本省的和平政策，上有军政机关互相谅解，精诚合作，下有广大群众的一致要求与拥护，本省和平前途的乐观在这里。”刘孟纯在会上也表示：“不管局势如何演进，总是在向这个方向迈进，各方面所表现的努力可以说都是为了和平。”同日，屈武在迪化市各界庆祝第八届体育节暨儿童“体育杯”篮足球赛开幕典礼的讲话中说：“新疆必须是和平的新疆，不是流血与战争的新疆。于此希望大家……以不怀疑的信念，不动摇的决心，拥护陶副长官、包主席正确的领导，使新疆走向光明的道路。”^①9月11日，迪化市商会、市总工会、伊斯兰商会、市参议会、县参议会等各族群众团体举行座谈会，一致表示竭诚拥护政府的和平号召，并酝酿成立了全省性质的拥护和平促进会。

为了加速实现新疆和平解放，中共中央针对新疆的情况，作出几项重大决策：

第一，根据迪化方面与三区的隔阂，中央没有批准三区关于“跟着国军的撤退命令民族军跟着前进接防”的建议，电告邓力群，“新疆问题的解决方案各方均可以提出，但最后须取决于北平中共中央。”^②并令陶峙岳所属部队应照原样在各区各县驻防，不要调动集中，待人民解放军入疆换防时再行调动集中编整，以免秩序混乱。^③

① 1949年9月10日《新疆日报》。

② 中共中央给邓力群电报，1949年9月10日。

③ 中共中央给邓力群电报，1949年9月13日。

第二，9月8日，毛泽东约见张治中，告诉他解放大军已经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他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起义。张治中欣然同意，但不知如何联系？毛泽东说，中共中央已派邓力群去伊宁建立电台，你的电报由他转。9月10日，张治中给陶峙岳和包尔汉拍发了电报，指出：“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9月11日，张治中又致电陶峙岳，详细询问马步芳、马呈祥、黄祖勋、周嘉彬、王治歧等国民党残部的情况及态度，并指出如何调度安排和处理。^①

第三，9月10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陶峙岳、赵锡光等已准备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已派人到伊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邓力群即将进驻迪化，要彭德怀集中注意力尽快向新疆进军。为此，第一野战军发起甘肃河西战役。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政治委员王世泰率部沿兰新公路向西北追击。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率第二军由青海“取捷径进入河西，翻越大板山，涉过大通河，通过无人烟的雪山草地——祁连山脉，9月19日攻占张掖。”^②次日，第一、第二兵团在张掖会师，并以日进数百里的速度，继续向酒泉挺进。

①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581—583页。

② 二军政治部：《一九四九年作战行动总结》，1950年1月8日。

第四，9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邓力群，肯定苏联总领事的意见是正确的，为了尽快与迪化当局接上头，命令邓力群于日内进驻迪化。邓力群于9月14日晨从伊宁飞迪化，15日下午1时到达，包尔汉、刘孟纯、刘泽荣等到机场迎接，邓力群下榻于包尔汉家中。16日10时，邓力群与陶峙岳、包尔汉第一次正式会谈，邓转交了张治中致陶、包两电原文，并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要陶立即派员至兰州与彭德怀副总司令洽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陶峙岳说，河西的黄祖勋、周嘉彬两军已经派人来联络，愿与陶一致行动，向解放军投诚，但派人去兰州一事需等条件成熟，一是等待广州政府飞机运来军饷，发了饷可安定军心；二是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人交出部队，离开新疆。

9月17日，陶峙岳、包尔汉复电张治中，表示已对和平转交审慎筹议，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全省和平、避免无谓牺牲的原则下，选择时机，采取行动，于马等离开后，即宣布与广州政府脱离关系，依照国内和平协定，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同时，陶峙岳还单独复电张治中，答复张治中电询的各项事宜。^①

此时，发生了一个小的周折，有人对陶峙岳放马呈祥等出走提出非议、指责，要求我党命令陶峙岳扣押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反动分子。还有人提出以宽大态度不闻不问，让那些反动分子徘徊观望，我军到达后还有可能

^①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584—586页。

使叶成及其他反动分子归案。是放还是扣？或者是不闻不问？9月19日，中共中央在给邓力群的电报中明确指出：“马呈祥、罗恕人、叶成及其他坏分子，只要有可能，应让他们乘飞机逃走，愈逃得多愈有利。”9月22日，张治中致电陶、包，认为陶峙岳、包尔汉“态度正确，措置适当，至为欣慰。毛主席阅电亦表嘉许。”要陶“即派员与彭德怀司令员接洽联系”，^①陶即派曾震五飞兰州，代表陶面见彭德怀，商谈新疆和平解放大计。

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表示支持陶峙岳的做法，所以要求扣押马、叶、罗的人也未坚持己见。马、叶、罗等人行前要求发给出国护照，发给路费，部分动产和不动产折为黄金，派部队送到国境线，陶峙岳、包尔汉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马呈祥、罗恕人、伊敏、艾沙等于9月24日、叶成于25日清晨离开迪化，经南疆去印度。

9月25日凌晨，陶峙岳召集警备总部紧急会议，宣布人事命令：决定莫我若任整编七十八师师长，韩有文任整编骑一师师长，刘抡才任整编一七三旅旅长，罗汝正任整编一七九旅旅长。要求各尽其职，约束部队，防止变乱。当天下午，以陶峙岳领衔发布起义通电，“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9月26日上午，包尔汉召开省府紧急会议，成立临时人

^①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586—587页。

民政府，发布省政府起义通电，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①

通电起义的消息一经传出，迪化全城一片欢腾，人们奔走相告，各种文字的标语到处可见，庆祝游行此起彼伏。第二天，省政府召开了庆祝和平解放大会，会场上彩旗飘扬，鞭炮齐放，鼓乐喧天，包尔汉发表了长篇讲话。28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给陶峙岳、包尔汉及新疆军政起义人员发来电报，对他们和平起义表示嘉勉，希望他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正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②同日，伊宁举行了3万余人的空前隆重的庆祝大会和游行，欢呼新疆历史的伟大转折。

四

曾震五代表陶峙岳到兰州见彭德怀，提出解放军今冬不宜入新的要求。9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曾震五今冬不要进军的意见，你们也不要驳他，即不要表示今冬一定进军。但在实际上，你们应该确切地于11月1日或10日以前准备完毕，以便在11月上旬或中旬实行进军。为此，中央军委从华东、华北调了500余辆汽车支援运输；东北军区支援皮帽10万顶，皮衣35000件，解

① 1949年9月28日《新疆日报》。

②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第361页。

决入新部队冬装。部队各级司令部并协助后勤部队，筹集了大量物资，供给部队进军途中的需要。如筹集的粮食达33000吨，汽油1600吨，帐篷1000顶，牛肉35吨，还有棉衣、棉鞋、水壶、风镜等大量物资。苏联还派了两个航空团40架里尔型运输机，协助空运部队入新。

新疆和平起义后，绝大多数起义部队能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但也有少数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军官，在哈密、鄯善、吐鲁番、焉耆、轮台、库车、呼图壁、七角井、绥来（玛纳斯）等地制造叛乱，与新疆老土匪乌斯满相呼应，杀人、放火、抢劫、奸淫，危害各族人民，妄图破坏和平起义，保存反动势力。根据这种情况，新疆军政当局同意并欢迎人民解放军迅速开进新疆。10月4日，陶峙岳由迪化乘飞机到哈密，6日到酒泉，向彭德怀副总司令、王震司令员等报告了新疆情况，请示起义部队的改编方案，并研究了部队如何向新疆进军等问题。陶命令国民党第八补给区所有的军用车辆调给人民解放军进疆部队。入新的人民解放军为一兵团二军。六军两个军（缺一个师），一个炮兵团，一个装甲车营。

10月12日，先头部队二军四师和装甲车营从酒泉出发，首先开始了向新疆的进军。装甲车营于10月20日到达迪化，从21日开始六军十七师及军直指队员全部由酒泉乘飞机到迪化，并沿奇台、木垒、阜康、呼图壁、玛纳斯、伊宁等地布防。六军十六师进至哈密，在巴里坤、伊吾等地布防。六军于1950年1月13日全部到达指定的位置。二军四师、五师部队由酒泉出发，乘坐汽车到达部

善、焉耆，由于汽车运输紧张，部队开始步行前进。四师由焉耆徒步走到喀什，走了26天，2390里，于11月26日进驻喀什。五师师直及十四团11月29日到达阿克苏。十五团为了争取早日到达指定地点，他们吃尽了苦头，由阿克苏直穿1585里没有人烟的塔里木大戈壁，于12月22日到达和田。五师独立团先乘车到乌苏，然后徒步往北行进，他们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爬冰卧雪，历尽艰辛，于1950年3月中旬到达布防地承化（今阿勒泰）。进驻新疆的人民解放军把五星红旗插遍天山南北，迅速平息了叛乱，巩固了和平起义的胜利。

新疆和平解放，使新疆各族人民得以避免战争的苦难，加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的进程，使第一野战军能够提前分兵参加解放大西南的战斗，也为起义军政人员铺就了一条光明的新生之路。从此新疆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湖西“肃托事件”

中共济宁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湖西“肃托事件”，是一个有影响的重大历史冤案。几十年来人们对这一事件的性质说法不一，直到1983年12月，经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批转了山东省委《关于湖西“肃托事件”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后，这一历史冤案才得以彻底解决。现在，我们根据已掌握的材料，将事件的全过程叙述如下：

一、“肃托事件”发生前的湖西形势

湖西地区（亦称苏鲁豫边区）是指山东南四湖（微山湖、昭阳湖、南阳湖、独山湖）以西的苏鲁豫皖交界地区。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就建立了党的组织，开展了革命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尤其是徐州失守（1938年5月19日）以后，国民党军队溃退，地方行政官吏潜逃，日军长驱直入，湖西各县城相继沦陷，湖西地区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这危急时刻，共产党员挺身而出，恢复和发展了战前被破坏的党组织，使其成为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抗战的核心力量。1938年7月下旬，中

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决定将徐州西部党组织与鲁西南特委合并，成立了苏鲁豫特委，王文彬任书记，统一领导湖西的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组建了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1938年12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挺进湖西后，一举歼灭了汉奸王献臣部，声威大振，我党我军在群众中的威望空前提高，群众抗日热情高涨，纷纷参军参战，全区呈现出一个大发展的局面。在军事上，苏北两支汉奸武装——一支（王献臣部）被打垮，一支（籍兴科部）起义后，苏鲁豫支队的3个大队（原为3个营）得到迅速发展和壮大，改编为5个大队（每个大队相当于1个团），另外还有1个独立大队（辖3个团）。苏支转战陇海路南北，踏遍了苏鲁豫边区，经过数十次英勇战斗，锻炼成为湖西抗战的中坚力量。苏支还派出一部分干部深入到各县帮助发展地方武装，各县相继涌现出一批新的抗日游击武装力量。在组织上，党的威望的提高使党的组织蓬勃发展，边区各县都相继恢复和建立了党的组织，大量发展新党员，到“肃托”前夕，党员已达1万余人，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也随之发展起来，建立了各级领导机构，初步统一了群运工作。1939年5月中共山东分局指示，将苏鲁豫特委扩大为苏鲁豫区党委（亦称山东分局第五区党委），白子明（现名白学光）任书记，下辖湖边和鲁西南两个地委，肖（县）宿（县）永（城）、金（乡）嘉（祥）巨（野）、沛县三个中心县委，单县、丰县、砀山三个直属县委。1939年7月，在湖边地委所辖的鱼台县建立了第一个抗日县政

府，选举李贞乾为县长。

与此同时，湖西的统一战线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们打垮了伪军王献臣部，促使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沛县的冯子固、丰县的黄体润等向我们靠拢。在他们的部队中都设立了政训处，政训处主任均由中共党员担任，连队中也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湖西形成了以我党为主体的各民主党派、各爱国人士共同参加的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

此时的湖西，虽有日军的“扫荡”及国民党顽固派的磨擦活动，但整个形势是好的，是对我们非常有利的。正是在这种大好的形势下，令人痛心的湖西“肃托事件”发生了。

二、“肃托事件”的发生及其经过

（一）事件的发生

湖边地委成立后，为了解决干部来源问题，1939年6月地委在鱼台县谷亭镇西北约20华里的大田家村开办了一个干部学校，招收地方青年，经过两个月培训，分配到新区去开辟工作。干校的负责人由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兼任，日常工作由非党教员魏定远负责。8月临近毕业分配之际，在一部分学员中流传着毕业后想回自己家乡工作的说法，特别是沛县来的学员，不愿留在湖边工作，有的说：“那里（指沛县——笔者注）有新的共产党可以加入”。同时在学员中发现有“同乡会”的组织。

湖边地委的领导人发现这些情况后很惊慌，怀疑是由

“托匪”的破坏造成的。当时地委书记李毅患恶性疟疾离开机关养病，地委的日常工作交由组织部长王须仁主持。王须仁进行了所谓的调查，发现主持干校工作的教员魏定远对学员中的某些言论和行为抱同情态度，又加上魏定远原在沛县工作过，与沛县的一些学员较熟，王须仁就据此断定，魏定远是事件的煽动者和幕后操纵者。8月下旬，李毅病愈回地委后，王须仁向地委和常驻地委帮助工作的区党委政府工作部副部长陈筹汇报工作时说：“干校发现有‘托匪’活动，散布种种谣言，暗中串通学员毕业后不要服从分配，到沛县××地方去参加新的共产党等等。”王还一口咬定：“这些谣言活动背后是由魏定远唆使和操纵的，因此，干校出现‘托匪’活动，魏定远问题最大。”于是，地委研究决定：通过毕业典礼对学员进行动员后，抓紧分配工作，不再接着招收新学员，干校工作人员回到地委机关整顿，将魏定远调回机关进一步审查。接着，王须仁便收集材料，捕风捉影，列出魏定远的主要“罪状”：1、组织“同乡会”，在学员中秘密活动，煽动学生不服从分配，闹回乡运动；2、本来不是党员，却以党员的面目出现，迷惑群众；3、自由主义严重；4、对自己的妻子，平时感情不融洽，好象有什么秘密不能向妻子透露，等等。根据上述“罪状”，8月底，地委决定逮捕魏定远。地委负责人带着武装人员到了干校，以开干部会议为名，派警卫员吴德勤把魏定远叫到会场，立即逮捕，押回地委，进行审讯。审讯由王须仁主持。

王须仁在审讯中，大搞逼供信。上来就指问魏定远是

不是“托匪”，魏不承认，王就指使人对魏反复施以鞭打、坐老虎凳、灌水、过电（用手摇电话机）等酷刑，魏受刑不过，就按王须仁的指供承认是“托派”，王须仁接着就逼问还有谁，不说就再用刑。于是逼出了所谓托派组织，说“托派组织”有省委、特委、县委、区委、支部、小组等。并编造出湖西地区的“托派组织”称“苏鲁豫边区特委”，是受“托派山东省委”领导的，下辖铜山、砀山、丰县、沛县、金乡、鱼台、曹县等地的“托派组织”。还供出郝晓光等人是“托匪”。根据魏定远的口供接着逮捕了郝晓光。

9月2日，将魏定远、郝晓光一起审讯，参加审讯的有王须仁、袁汝哲等。审讯完，决定公审后枪毙。次日，正逢苏鲁豫边区军政委员会在湖边地委驻地谷亭镇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军政委员会主任、苏支四大队政委王凤鸣，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区党委书记白子明，军政委员会成员、苏支四大队队长梁兴祚，区党委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部长张如等。会议期间，李毅、王须仁向军政委员会汇报了湖边地委发现“托匪”的情况。王须仁在汇报中强调“托匪”如何狡猾，如何伪装，隐藏的如何深，活动面很广等等，并说魏定远已承认是“托匪”，供出了“托匪”的组织、名单、活动等详细情况。在座的区党委和四大队的领导感到事关重大，决定进行“集体会审”。王须仁把魏定远带来，由白子明主审，其他人帮问。魏定远此时已被折磨得半死，在王须仁的威逼下，按原来承认的“口供”重讲了一遍，与王须仁汇报的内容大体相符，于是大家对魏的“口供”信以为真。在商议怎么办时，王须仁说魏供的名单

中，比较重要的是曹广善，又提出应审讯曹广善，与会人员都同意了王须仁的意见，接着便逮捕了曹广善（曹当时从区党委党校毕业后，到湖边地委组织部等待分配工作），由王须仁立即进行审讯，王在审讯中指名问：“××是不是托派？”，不说“是”就反复用刑，直到说“是”才松刑。就这样把曹广善活活打死。王须仁又向区党委和地委领导汇报，说：“曹广善也承认了，又供出了一套托匪的组织、名单和活动情况。”当时魏、曹二人的“口供”并不完全一致，但在白子明的主持下，认为“托匪”组织可能是鲁西南和苏北各一个，因此对两个不完全一致的“口供”，就完全相信了。王须仁还说：“曹经过审讯后已经死了。”当时大家谁也没有追问曹死的原因，谁也没有对王须仁刑讯逼供的做法提出意见，致使“肃托”的事态进一步发展。据《关于苏鲁豫边区肃托斗争的总结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记述：“审讯时，严刑拷打，指名要口供是形成扩大的主因，而牵连到党内的干部，造成大错的开端，由于处理方法不当，不去进行侦察，以求得更多的破获，而施以苦刑将曹广善打死。”根据“口供”，接着又逮捕了王天章、朱新民等。对朱新民没有审出什么结果，就于深夜将其枪决了。

这次“集体会审”的最大恶果，是苏鲁豫边区党委及湖边地委的领导人都认为湖边地委真的发现了“托匪”组织。他们不仅在事实上认可了王须仁刑讯逼供的错误做法，甚至还赞赏王须仁“能干”，这就使王须仁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二) 事件的恶性发展

1、事件由湖边干校很快蔓延到整个湖边地委及鱼台县委、县政府机关，尔后，在湖东郭里集进行了第一次大屠杀。

在区党委同志离开地委前，白子明等叫王须仁搞了一份魏定远、曹广善供出的“托匪”的名单和材料，带回区党委开展“肃托”；同时指示地委在湖边继续“肃托”，随时交换情况。据李毅同志回忆：“我当时感到不好搞，怎样肃法也没有具体研究，就问白子明同志：‘我们没有经验，下一步怎么办啊？’白子明说：‘你有王须仁在这里还愁什么！’”从此，湖边地委在鱼台，区党委在单县同时开展了“肃托”，并且，从一开始，就完全采用了王须仁刑讯逼供的一套做法。

由于指名逼供，又牵连了不少同志，其中包括：湖边地委妇女部长常俊亭，地委干部史谦（史维先），以及单子英、牛藉庵等。

为了在湖边地委和鱼台县委内部大抓“托匪”，王须仁就把常俊亭和鱼台县委书记史为功作为进攻的重点。王须仁不择手段，把“口供”中的史维先硬说成是史为功，并于9月9日逮捕了史为功，9月10日逮捕了常俊亭、史为溪等，照样加以刑讯逼供。据《报告》记述：“审讯是非常盲目的，相信自己的断定，完全相信口供，托匪即因此由党外而党内，由下级而上级，毫无限制地扩大起来。”这样越牵连越多，以至把湖边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军事部长尹夷僧等人都列入“托匪”名单。尤其严重的是，区党委宣传

部长马霄鹏、人民抗日义勇二总队参谋长李发等人也被说成是“托匪”。在这期间，王须仁等还逮捕并杀害了从冯子固部胡子良团来干校学习的营长李高松和政治部干部孙兴民。胡子良团是在我党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部队中有我党的总支委员会，政治处和各连指导员都是我党党员，杀了李、孙二同志，使我党与胡子良团的统战关系受到一定影响。

这时，湖边地委的“肃托”大权已完全掌握在王须仁手中，在湖边党员和群众中造成了很大混乱。据孔令闻同志写的《湖西“肃托事件”始末》（以下简称《始末》）记述：“九月十一日，在谷亭镇召开‘反托大会’，除地委机关外，参加大会的还有鱼台县委、县政府，湖边司令部所属机关，直属部队以及鱼台三区的工作人员。王须仁强逼魏定远、史为功上台讲‘参加托匪的经过’和‘与日寇、特务勾结进行破坏活动的计划’，实际上是王须仁在演双簧。在大会上，王须仁在后边说一句，魏定远在台上学一句，魏回头问王：‘还说什么？’王须仁说还有什么……。这次‘反托大会’之后，马上又逮捕了七、八人。王须仁大造舆论，说‘托匪’如何狡猾，如何耍两面派等。有的同志积极肯干，就说这是伪装，是为骗取领导信任；有的人干劲不足，就说这是仇视抗战，进行消极破坏等等。制造紧张气氛，使同志之间互不信任，互相猜疑，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这时，王须仁既怕被他扣上“托匪”帽子并准备杀害的人逃跑，又怕警卫部队出乱子，便想借用军政委员会主任

苏支四大队政委王凤鸣这把“刀”进行弹压，提出地委机关要靠近主力部队。地委领导人在此情况下已惊慌失措，出于对主力部队的信任，便表示同意。据李毅同志回忆：“湖边地委肃托中，我也是靠王须仁，王汇报情况，我们听信，王提出要抓谁，我也基本上都同意。抓了人就关在‘游击四大队’里（游击四大队同时担任地委的警卫任务），由王须仁审讯。‘肃托’不断扩大，人越牵连越多。后来，游击四大队的教导员也被人供出是‘托匪’了。怎么办呢？地委和在地委帮助工作的区党委政府工作部副部长陈筹同志经过讨论，鉴于地委离区党委比较远，离主力四大队比较近，王凤鸣政委又是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人，就决定向王凤鸣请示。王凤鸣接到报告后，对肃托表示十分重视，指示对‘托匪’必须坚决清洗，马上派特派员（四大队保卫科长）陈友仁前来帮助‘肃托’工作，并接地委过湖去与主力会合。”当时主力部队与地方党之间存有某些矛盾，王凤鸣支持地方上搞“肃托”是别有用心的。据白子明同志回忆：“当时，区党委和四大队之间，主要是因为苏支来了以后，把当地挺进支队编进去了。后来象割韭菜一样，地方发展一茬，被割一茬。因此地方有些意见。王凤鸣曾为此和区党委军事部长张如同志吵过架，王须仁就利用区党委与四大队的矛盾，挑拨离间。”郭影秋同志回忆说：“暗害分子王须仁钻了空子，挑拨部队与地方党的关系，王凤鸣为达到个人目的，成了王须仁的帮凶和工具，‘锄奸事件’的发展日趋严重。”

9月11日，地委由谷亭镇向南阳镇转移。尹夷僧和

袁汝哲主张夜间行军，王须仁借此诬陷尹、袁是“托匪”，搞“阴谋”。王须仁这样写道：“下午我们出发赴南阳，第一步靠近主力，这时托派的阴谋是准备打我们的黑枪（即暗杀之意），所以我们主张白天走，他们（指袁）坚持黑夜行军，我们终于先走，使他们这一阴谋破产了。”

到南阳镇后的第二天（9月12日）中午，镇公所给县政府送来一个报告说：“本镇×户嫁娶，燃放鞭炮，请县府通知各部队和民兵。”王须仁等毫无根据地咬定这是尹、袁搞的阴谋，要组织暴动。他又找了尹、袁二人的一些缺点，任意加以扩大，作为诬陷他们的口实。根据陈筹同志的回忆：这一天“李毅、王须仁、我以及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住在一个院子内。王须仁说，袁汝哲鬼鬼祟祟，在窥探我们的行动，行迹可疑，一定是托匪，要逮捕他。李毅和我们都相信王须仁的观察正确。”于是，王须仁等便利用“请客”的名义，把尹夷僧、袁汝哲二人骗到鱼台县政府逮了起来。李毅同志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谈到：“在过湖经过南阳镇时，王须仁又制造了一起所谓‘暴动计划案’，我和陈筹、陈友仁等都信以为真，又把地委的袁汝哲、尹夷僧等同志株连进去。”9月14日，地委机关、鱼台县委、鱼台县政府、湖边司令部以及所属一大队、警卫营的人员等一起坐船渡过南阳湖，到了邹县西部的郭里集，与苏支四大队会合。

李毅同志回忆：“过湖到了主力部队，我、王须仁、陈筹等向政委王凤鸣作了详细汇报，请他指示怎么办？并希他能通过电台向山东分局报告情况，王凤鸣听后，首先肯

定‘肃托’工作做得好，对王须仁表示赞许。并当场决定：1、从现在起，地委游击大队编入主力部队，地委机关的警卫由主力部队派出；2、对所有在押‘犯人’一律交由主力部队看押；3、今后‘肃托’工作由王须仁和陈友仁负责，王须仁住在大队部（即王凤鸣处）；4、李毅、陈筹和地委专门做地方工作。从此以后，‘肃托’工作就完全掌握在王凤鸣和王须仁手中了。审讯、抓人都在主力部队里进行。”王须仁与王凤鸣进一步勾结，互相利用，更加放肆地大干起来。

王须仁制造新的口实，说有人要组织暴动，暗杀首长（指要暗杀王须仁、李毅、陈筹、李贞乾等），又说湖边司令部及所属一大队也掌握在“托匪”手中了。经过密谋，一场大屠杀开始了。

9月15日，在苏支四大队队部的院子里，召开军队排以上干部和地委、县委、县政府机关干部会议。会场戒备森严，周围布满了苏支四大队的警卫人员，凡参加会议的人，许进不许出，坐下以后连大小便也不许解。会议由王须仁主持，王凤鸣讲话。王凤鸣声称：“托匪钻到我们队伍里来了，谁是托匪要站出来交待”。见无人答话，王须仁说：“那我就不客气了！”他说着掏出一个名单，念了起来，念到谁，就由警卫人员把枪下了，绑起来，王须仁甚至抛开名单，随意点名逮捕。结果，一大队副大队长秦建奎以下七八十人被当作“托匪”逮了起来。没念到名字的人放了回去，把逮捕的人集中起来训话。这时，鱼台县政府秘书刘葆琴再也忍不住，就站起来质问：“难道我们这些人

都是托匪吗？”王须仁一看不妙，说：“他有意见，拉出来审他！”刘被拉出来按在凳子上，打得鲜血直流，又点着香烧他的脸。然后又对秦建奎用刑，直打得皮开肉绽才停止。这是给被捕者一点颜色看，看谁还再敢吭一声。

当天夜里，王凤鸣、王须仁派人在村外挖了一个大坑，把袁汝哲、尹夷僧等人拉到大坑前。王须仁、王凤鸣指挥行刑人员，对这些无辜者下了毒手，刺刀捅、马刀劈，大杀大砍。被害的同志高呼“共产党万岁！”、“民族解放万岁！”、“毛主席万岁！”还有的大骂王须仁是坏蛋，呼喊声划破阴森的夜空。这些同志多数是在没有经过任何审讯的情况下被杀害的。据目击者回忆，这一次就杀害了三四十人。^①被杀害的同志，都被埋在事先挖好的大坑里。

紧接着，又审讯并杀害了金乡县人民抗日武装的创始人、党的领导人翟子超、王鉴览、张宾如等 10 余人。^②

至此，湖边地委、湖边司令部、鱼台县委、鱼台县政府机关及其带到湖东的部队，实际上已不存在了。

2、“肃托”事件发展到区党委内部，制造了于王庄大屠杀，区党委委员马霄鹏惨遭杀害。

王须仁、王凤鸣在进行郭里集大屠杀的同时，又编造说：区党委的各个部长和区党委机关的干部大都是“托匪”，甚至胡说整个苏鲁豫边区的党组织都是“托派”发展

^①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代表刘居英对《湖西日报》记者谈话（1941年11月）。

^②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代表刘居英对《湖西日报》记者谈话（1941年11月）。

起来的。

据《报告》记述：在王须仁自写的报告中这样叙述：“地委、区委几乎是整个掌握在托匪手里，这些两面派分子似乎有计划的安插着配备着，孤立了我们几个真布尔什维克。”又说：“许多两面派分子，脸上变了颜色，行动上起了变化，过去许多事实，添上托匪的供词，一天天暴露了他们的真象。袁汝哲是地委宣传部长，在多方面都起了变化，不自然的微笑，消极怠工，对肃托没兴趣，暗中活动，……从工作团（地委）许多重要托匪口中使我们晓得县政府，地、县委，除少数负责人外，竟一律是托匪，军事系统在托匪手中，他们已经配备的十分美满，使我们格外的提高警觉，而加倍慎重。”王凤鸣则说：“很早以前我就警觉着区党委张如是托匪，我还向陈光师长报告过，陈师长说我胡言乱语，现在供出他真是托匪了。”

据《始末》记述：“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等，在谷亭镇开完军政委员会，带着对魏定远的审讯材料，回到了单东北区党委驻地王寨，向部长们传达了湖边地委发现‘托匪’的经过，赞赏王须仁如何能干，如何有办法，并着手布置在区党委开展‘肃托’斗争，遂将区党委由王寨移驻单东南王小庄、郝楼一带。”

“王须仁等在湖边地委去湖东郭里集之前，根据在审讯中所制造的材料，特别是牵涉到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宣传科长朱华、参谋长李发等人的材料，以地委的名义向区党委写了一个报告，作为绝密件，派负责交通工作的赵芳洲和交通员程义七二人，是夜送区党委。在地委帮

助工作的区党委政府工作部副部长陈筹，也根据从王须仁那里了解到的材料，向区党委写了一个报告。苏支四大队政委王凤鸣也给白子明写了一个内容大致相同的信。区党委书记白子明，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从不同的渠道接连收到内容大致相同的三个报告，而感到问题的严重。他不经过任何调查研究，即抄袭王须仁的一套做法，乱捕乱杀，大搞逼供信。”9月10日，逮捕了区党委宣传科长朱华和教育科长张基隆、《团结日报》负责人魏钦公、吴筱砾等人，并严刑逼供，捕风捉影。对于“白供”，不经核实，信以为真，以此为据，愈益扩大，造成令人极为痛心的恶果。

9月14日，区党委机关由单东南王小庄向丰北转移，靠近主力部队，以为这样可以安全些。转移中，一战士不慎走火，由于大家思想混乱，人心惶惶，部队骚乱起来，幸有军事部长张如严令加以整顿，才恢复了秩序。白子明面对这种情况，不仅不能冷静地分析，反而认为是“托匪”组织“暴动”。恰巧，那一枪响在马霄鹏附近，于是就断定这次“暴动”与马霄鹏有关。

转移到丰北于王庄后，白子明从上述判断出发，再次审讯朱华等被捕的同志，用刑更为残酷，根本不允许申辩，一味折磨，并急急忙忙枪杀魏钦公、吴筱砾、李从文、梁自筹等人（其中魏钦公中弹未死，在群众掩护下逃了出来，后来在伤未愈的情况下，又找到组织继续革命）。这次有目标的严刑逼供，是为搞出这次“暴动”的主持者。严刑逼问的“口供”证实：“这次‘暴动’的主持者是马

霄鹏，具体执行者是参谋长李发、一营营长孟宪琛、二营营长康文彬等人。‘暴动’的力量就是保卫区党委的两个营，目的是为了杀害首长和党的负责人。”白子明等根据严刑逼出的完全虚构、漏洞百出的“口供”，不经分析和研究，就逮捕了马霄鹏、李发、孟宪琛、康文彬等 10 余人，并于当夜审讯马霄鹏。

马霄鹏是 20 年代入党的老党员，理论水平较高，对敌斗争经验丰富，在苏鲁豫边区的广大党员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在被捕之后，虽遭受了百般的毒打和折磨，但仍坚持维护党的原则和利益，始终不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并一再忠告白子明要相信分局，要对党负责，千万不能把自己的同志当作敌人。但白子明等人根本听不进去。据《报告》记述：马至此已遍体鳞伤，尚有一丝呼吸，惨不忍睹，遂活埋于村外。与此同时，又进行了第二次大屠杀，朱华、张基隆、孟宪琛、康文彬等 47 位同志在于王庄被枪杀。许多被杀害的同志，临终高唱国际歌，高呼革命口号，表现了高尚的革命气节。

这次屠杀后，在于王庄召开了县委书记联席会，由白子明作报告，大讲此次“肃托”的所谓正确和胜利。虽有个别同志有异议，但鉴于当时的情况，没敢提出。

3、王须仁与王凤鸣相勾结，武装包围区党委，并制造了谷亭镇第三次大屠杀，区党委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同志惨遭杀害。

9 月 18 日，区党委在于王庄召开“九·一八”纪念大会。据《报告》记述：“天将黄昏，于王庄村北来了一股队

伍，经百姓报告是苏支四大队，区党委同志皆很欢喜，以为主力来到，一切都好办了。但等了许久，始终不见有队伍来，区党委的同志便产生了疑心。于是白子明同张如带警卫员去北门工事上观察，等靠近一看是王须仁和王凤鸣带队伍来，便同张如一起前去。王凤鸣见白、张二人前来，便命令将机枪架好，继而问白：‘肃托的案件处理得怎么样了？’白答：‘大部分结束’。王须仁这时说：‘区党委除你一人外皆是托匪’，白惊慌异常，即说：‘不至于严重到如此地步吧？’王须仁以冷嘲之口吻说：‘你过于相信干部’。并谎称：‘中央命令我同王政委来以紧张的态度处理此事，严防公开叛变！’王凤鸣也随声附和，说完，便将张如逮捕起来，继而问白子明：‘你的警卫员可靠吗？’白说：‘不见得可靠！’于是缴了白警卫员的枪。王、王、白带着张如到离于王庄数里的巩大庄去了。”

“偏巧在扣留张如的时候，被区党委的勤务员看见，便跑到区党委去报告，说白主任（指白子明）被监视，张部长被捕。区党委各部长听后都非常怀疑和惊慌，大家估计可能是游击四大队干的，是托匪要暴动了，由于得不出明确的结论，于是派人去侦察，并加强了警戒。”

“王、王、白到巩大庄后，王凤鸣告诉白说：‘区党委各部长都是托匪。’又说，‘中央有电报命令，叫我们负责处理边区的托派。’白子明半信半疑，但在王、王的威吓下，根本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和领导的责任。于是白子明按王、王的意见写了一封信，内容为：‘王政委来此传达中央决议，请各位部长速来此开会。’派王须仁的警卫员亲自将信

送到区党委。各部长看信后生了疑心，便将王的警卫员吊打审问，得知是王须仁、王凤鸣让写的信，更猜不透是怎么回事。便一方面派巡视员张子敬去查看清楚，一方面由王文彬写了一封信，内容是：‘现彭雪枫来，有许多事情要商讨，请白主任快回来。’王、王接到此信更加怀疑，于是拉队伍到于王庄去解决区党委，路遇张子敬，白对张说：你先回去，我即来。区党委派孙鹤一（保卫局长）去查看，弄清确是苏支四大队来了，王文彬以为是主力则没有问题了，便自己到寨外去，刚走出寨门即被绑起。区党委见王部长不返，知必有变，于是移队伍于寨西青苗中，同时派孙鹤一带组织部长郝中士的警卫员去探听情况，结果也被王、王扣留。晚间，白向区党委各部长写信说王政委来传达中央决议，请速来。于是，区党委青年部长孙衷文、组织部长郝中士，社会部长赵万庆即去了。次日（九月十九日）早晨，逮捕了孙衷文、赵万庆，软禁了郝中士。区党委机关的工作人员除少数被软禁外，其余全被绑起。并带着队伍去谷亭镇。临出发时，白子明发表讲话，说中央有命令，由四大队来全权解决区党委”。这样，区党委就被王须仁、王凤鸣在“肃托”的名义下，用武力解决了。当天，王、王便把队伍带到谷亭镇，进行第三次大屠杀。

这时，由于随时都有被打成“托匪”并被杀掉的危险，在苏鲁豫边区的党员和干部中造成了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恐怖气氛。在严刑逼供下，不少同志被迫承认了“托匪”罪名，有的还咬了别人。这样株连的人越来越多，造成了

恶性发展。白子明这时也害怕自己被王须仁、王凤鸣当作“托匪”杀掉，对王须仁、王凤鸣的破坏行为不仅不进行斗争，反而积极地与王须仁、王凤鸣等一起审讯被捕的同志。

他们首先审讯王文彬和张如。王文彬是苏鲁豫边区党的创始人之一，在边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张如原是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的参谋长，对边区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对这样两位党的高级干部，无论白子明或王凤鸣，不经上级批准，都是无权逮捕和审讯的，更不用说作为下级的王须仁了。而王、王、白却践踏和破坏党的组织原则，不仅加以逮捕，而且在审讯中用刑极为残酷，刑罚达数十种之多，王文彬、张如两同志被打得死去活来。这两位老党员表现了顽强的意志和崇高的革命气节，绝不承认强加给他们的“托匪”罪名。而王须仁、王凤鸣、白子明竟召开“公审”大会，将王文彬、张如两位同志杀害了，并暴尸街头，任凭狗咬。王、王、白竟再次伪造中央名义，贴出布告，谎称“奉中共中央之命”将王文彬、张如处决。其目的在于欺骗和镇压党员群众。接着又杀害了常俊亭、史为功、魏定远等 20 余人，逮捕了区党委组织部长郝中士（原为软禁）和区党委委员兼湖边地委书记李毅等同志。

正在这时，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发来急电，严令王凤鸣等停止捕杀。山东分局也以同样的内容，数次发来急电，严禁捕杀。而杀人杀红眼的王凤鸣、王须仁等拒不执行，反而制造谎言，说中央和分局来电要他们

继续“肃托”。金乡县委书记郭耕夫以及聂超、聂振山等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杀害的。

在谷亭镇的这段时间里，几乎是天天捕人，天天杀人，常常是六七人一批、10余人一批地被杀。在谷亭镇究竟杀害了多少同志，至今尚未查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湖西“肃托事件”在谷亭镇杀人杀得最多。据《始末》记述：“一九四五年，湖西地区在单县建立烈士陵园时，在谷亭的一个坑里就挖出了四十七具尸骨。”

在区党委名存实亡的情况下，白子明、王凤鸣、王须仁等，竟不经上级党组织批准，私自成立了一个所谓“整理委员会”，以代行区党委的职权。白子明为书记（实际是个傀儡），王须仁一跃成为组织部长，其他如李贞乾、梁兴祚、陈筹等作为陪衬为委员，实际上的控制者，仍然是王凤鸣、王须仁。

4. 以办“训练班”为名，进而使“肃托”发展到区党委所属各地县与主力部队，大批干部继续遭杀害。

王凤鸣和王须仁相互勾结搞垮区党委之后，又策划了下一步屠杀的阴谋。他们捏造说，苏鲁豫边区的党是由“托匪”发展起来的，必须斩尽杀绝。为此，又和白子明一起，以区党委书记的名义，于9月下旬向各地委、中心县委、县委和各县地方部队发出通知，命令区委委员以上干部及其所领导的部队都到区党委（实际是苏支四大队）驻地谷亭镇集合“受训”。

各地、县接到命令后，都疑虑不安，十分为难。大家知道在区党委已经杀害了大批干部，去“受训”，肯定是凶

多吉少，然而，不执行命令，违背组织原则，是不允许的。鲁西南地委由于杨得志、崔田民支队的掩护，没有照办。萧宿永中心县委由于县委的抵制，没有参加。故这两个地区幸免于难，遭受损失较小。其它地、县经过反复讨论，还是去参加了。

各地县“受训”人员到谷亭镇后，所带去的部队，均被编并于苏支四大队。

各地县“受训”的干部，加上区党委机关的干部，约300人，全部被关禁闭。“高级”的编为一个队称“教导队”，“低级”的编成一个队叫“训练班”。开学后，白子明就宣布要在训练班中肃托，凡“受训”人员，一律停止党的关系，进行所谓“个别考察，个别吸收”。同时还命令地方各级党组织一律停止党的活动。他在讲话中欺诈说：“你们谁是‘托匪’，名单都在我口袋里，要坦白交待”。王须仁威胁说：“你们都是在我的照妖镜下照过的，谁是‘托匪’，我都看的很清楚，你们每个人都要老实交待。”^①王须仁、王凤鸣还经常察颜观色，看谁不顺眼，就点名当作“托匪”逮捕和杀害。

王须仁、王凤鸣等在谷亭镇进行了一场大屠杀之后，便带苏支四大队和“受训”人员，转移到丰（县）单（县）砀（山）边活动。

在进驻到单东南王小庄之后，王须仁等又制造了一个所谓“托匪”利用女人破坏首长威信案件。王、王、白不顾

^① 孔令闻《湖西“肃托事件”始末》。

一一五师和山东分局一再“禁止捕杀”的命令，逮捕了正在“受训”的妇女干部郭仙云，接着又逮捕了边区妇联主任孔真和副主任金采凡等，并野蛮地进行折磨。通过对这些女同志的摧残，又逼出了新的所谓“托派苏鲁豫省委”。据此，又逮捕了陈筹、孙兆立、郝中牟（李文）和山东分局派来做青年工作的干部刘剑等人，继而又是连日施以“七十二种刑罚”，大搞逼供信。在审讯中，更加居心险恶地逼迫受审人，尤其要供出在主力部队、山东分局以至在中央的“托派”，不达目的，刑讯不止。据《报告》记述：“在审讯时，王等指名字要口供，专要主力中的，专要分局的。主持人象完全疯狂了似的，叫被审者满足他们。”通过刑讯逼供，又逼出一个所谓“三次暴动计划”。将苏鲁豫边区抗日武装创始人之一李贞乾、苏支四大队长梁兴祚、参谋长严世荣、政治处主任景有荣等都当成了“托匪”，进行严刑拷打，强取口供，直到承认“暴动计划”为止。这样就把“肃托”发展到了主力部队中。在此期间，在单县王小庄，郝平房等处又有数批同志被杀害，其中包括区党委社会部长赵万庆、丰县县委书记孙兆立等同志。

他们动用了极其残酷的刑罚审讯李贞乾，要他供出苏支四大队的“托匪”，但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他们便不择手段，又从“训练班”中逮捕了张令仪（女）并严刑诱供、逼供，使其承认自己是“托匪”。并用事先编好的情节，强使其承认利用女色勾引梁兴祚，加入“托派组织”。借此，逮捕了梁兴祚，并严刑审讯。

一些被关押的同志认为等着被杀害不是办法，有的同

志就酝酿对策，组织串连，准备逃跑。郝中士、孙衷文、李毅、耿荆山等人被关在一起，他们互相交挽了意见，认为这样“肃托”是搞错了，应把情况报告给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的首长，请求尽快派人前来处理。于是由孙衷文起草了一个报告，托一个被释放出去的小商贩转交给刘昭筹，刘又找到湖上游击队队长张运海（现名张新华），两人一起到湖东，找到了正来湖西处理“肃托”事件的罗荣桓，呈交了由孙衷文起草的报告。

这时，在“受训”人员中，也有人逃跑。如丰县县委组织部长胡光耀（王光中）和县妇联主任高潮在单县王小庄被宣布为“托匪”后，深夜翻墙逃跑，免遭杀害，后继续革命。当时在更多的同志心中存有一种信念，相信党组织，大家争取活下来，把希望寄托于一一五师和山东分局首长们。据郝中士同志回忆：“在监狱里的同志活跃起来，彼此互相传说、议论着：‘一一五师罗荣桓政委要来边区’、‘现在已到微湖东岸了，大概最近几天就可过湖’、‘大家要准备好意见，等罗政委来了要揭发他们的乱干’。”

王须仁、王凤鸣、白子明等违抗分局和一一五师首长的命令，继续乱捕乱杀。苏支支队长彭明治在听到梁兴祚被捕的消息后赶来，王凤鸣向彭明治编造说：“这个地方的托派非常厉害，部队中的干部变得很快。”彭问：“能有这样多的‘托派’？”王凤鸣说：“这里的党是托派发展起来的。”彭更是不信，他见李贞乾、梁兴祚被打得身负重伤，便对王凤鸣说：“你们要好好伺候，待罗主任（罗荣桓同志兼任政治部主任）来后再发落。”但彭明治没能扭转当时的险恶局

面，王须仁、王凤鸣、白子明等仍继续进行捕杀。^①

郭影秋同志随彭明治到陇海路北后，由于严刑逼问出的“口供”而受累，遭到逮捕。郭影秋是区党委委员，原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政委。王、王、白在审讯郭影秋时，虽用尽各种刑罚，但没有得到什么东西。最后，白子明竟编造分局电报，对郭影秋说郭子华已经自首了，他供出你是托派，不论你承认不承认，都可以定案。白子明、王须仁为了逼郭影秋承认是托派，便把他和民运干事陈景文等几个人带到一个院子里，王须仁首先审讯陈景文，硬逼其承认是“托派”，边问边打，十分残忍，陈景文始终坚持党的原则，严词拒绝王须仁的逼供，最后，王须仁用木榔头把陈景文活活砸死了。然后，恶狠狠地威胁郭影秋等人说：“你们谁不承认，陈景文就是你们的下场”。

三、“肃托事件”的处理

(一) 罗荣桓、郭洪涛、张经武等同志赶赴湖西，采取紧急措施，制止捕杀，扭转危局。

彭明治在得知梁兴祚等人被捕的消息后，马上打电报给一一五师首长，罗荣桓接到电报后，便和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等同志星夜兼程奔赴湖西。11月，他们到达湖西后，在罗荣桓主持下，采取紧急措施，对湖西“肃托事件”进行了初步处理，做出了以

^① 孔令闻《湖西“肃托事件”始末》。

下几条决定：

第一，无条件地释放一切被冤枉的同志，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恢复工作。

第二，解散所谓“干部训练班”，让从各县集中起来的干部一律回到原单位，并将各县、区委的组织恢复起来，开展工作。

第三，改组苏鲁豫区党委。为了稳定当时的局面，白子明仍为书记，郝中士、郭影秋为常委，孔真、刘剑为委员。

第四，逮捕“暗害分子”王须仁（实际上是软禁，枪支未缴，还配有警卫员和马匹），押送一一五师保卫部。把王凤鸣带回一一五师保卫部另行分配工作。

第五，将少数在“肃托事件”中犯有严重错误或问题没有弄清楚的人，送山东分局审查。

上述紧急措施是必要的，果断的。这些措施，从根本上制止了乱捕乱杀，扭转了险恶局势，挽救了大批党员和干部，恢复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正常活动，对这块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罗荣桓、郭洪涛、张经武等同志不可能在湖西多作停留，没有来得及对“肃托事件”的全过程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得出正确结论，致使这一重大案件没有及时得到完全、彻底的解决。

（二）山东分局、一一五师派员进行调查，山东分局发出《训令》，要求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处理“肃托事件”。

罗荣桓、郭洪涛、张经武等同志离开湖西后，1940年3月，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派分局社会部长刘居英带领巡视团到湖西专门调查处理“肃托事件”。经过近3个月的调查，搜集了大量材料，写出了《关于苏鲁豫边区肃托斗争的总结报告》，送交山东分局并呈送中央。报告以大量事实揭露了王须仁、王凤鸣等人任意大搞逼、供、信，任意逮捕残杀大批党员、干部的罪行，批判了白子明等人的严重错误，指出了发生“肃托事件”的根源，总结了经验教训，为党中央和山东分局进一步处理“肃托事件”提供了重要依据。但调查主要采取了秘密的方式，调查了解的面很窄，调查工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出现了片面性和错误看法。特别是当时肯定了存在“真托匪”的问题，由此就自然得出了事件的性质是肃反扩大化的结论；这成为后来正确处理“肃托事件”遗留问题的一个主要障碍。

1940年6月，山东分局在书记朱瑞主持下，发出了《总结第五区党委肃托斗争的训令》。《训令》要求苏鲁豫区党委应从各个方面接受经验教训。其要点是：要加强和整顿党的组织，严防奸细分子混入；在各级党的领导机关中，要认真实行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包办；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甚至下级组织逮捕上级领导人员、下级组织摧毁上级组织的行为；要加强党对肃反工作的领导，反对把肃反大权委于个人包办而排斥党的领导的行为等。《训令》表示了对坚持党的立场、至死不屈者的哀悼，提出了对王须仁、白子明、王凤鸣、对一些

“失节”、“自首”、“失去党的忠贞人格”的人员的处理意见，同时要求对已证实的托匪，公布其罪状等。

1940年冬，潘复生奉山东分局之命，到湖西贯彻《训令》精神，他在干部会议上宣布了王须仁的罪恶，对坚定不屈者给予了表扬。但在处理中肯定了“肃托是正确的，错误在于扩大化”，根据这个结论调白子明去山东分局另行分配工作（当时没有宣布处分）；对在严刑逼供、假供、指供、骗供下被迫承认自己是“托派”或牵连到别人的大批被冤枉的同志，扣上“自首”、“叛变”、“丧失气节”等帽子，分别给予永远开除党籍、停止关系、严重警告、警告等处分。因此，许多负责干部，被从领导岗位上撤了下来；许多在“肃托事件”中受了冤枉和迫害的同志，又受到不应有或不适当的处分，精神上再次受到打击。这次处理不仅不彻底，而且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许多同志背着处分，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反复受到审查以至遭受迫害，一些遗留问题长期得不到彻底解决。

（三）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山东分局再次处理“肃托事件”。

1940年，山东分局到延安准备参加“七大”的代表郭子化和孙志谦，将湖西“肃托事件”的经过向党中央作了详细的汇报。中央对此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以陈云为首的5人领导小组，负责事件的了解和处理工作。

领导小组召集山东的同志，开了几次座谈会，作了重要指示。194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了《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在残酷的

紧张的民族战争和阶级斗争面前，革命的一切敌人（民族敌人与阶级敌人）对于革命政党与革命群众，不仅采取公开的逮捕破坏，而且还采用暗害手段，派遣暗害分子混入组织，伪装革命，利用党内某些弱点来实行暗害，以遂其借刀杀人的毒计。”“湖西肃托事件，便是这种暗害行为的一个证明。”《决定》还指出了湖西“肃托事件”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和恶果，详尽地分析了造成这一事件的基本原因及应吸取的经验教训。《决定》对事件的善后处理做出了6条决定，主要内容为：1、对王凤鸣应撤销工作，开除党籍，送交军法处判处有期徒刑。对白子明应撤销工作，由正式党员降为候补党员。2、彻底调查登记，并审查此次被杀者，对无辜牺牲者，在党内召开一定范围的追悼会，予以昭雪。3、对烈士家属进行安慰和抚恤。4、对被诬同志因严刑拷打、被迫自首的，不能当叛徒看待，不能一律开除党籍，应按情节轻重，给以适当处分。5、在湖西党内应进行有计划有系统的审查干部，清理内奸分子，保证党的巩固。6、责成山东分局，将此次事件的经验教训，写成简明文件教育全党，并派人专门做好善后处理工作。中央在作出决定后，又征求了郭子化、孙志谦同志的意见，中央书记处并将他们提出的两条意见，于1941年7月15日电告朱瑞同志并山东分局。

1941年秋，山东分局根据中央的决定，又作了“对湖西锄奸事件的总结”，并派刘居英到湖西进行再次的善后处理。刘居英到湖西后，在单县东部的辛羊庙召开了隆重的平反追悼会，并发了大会《致中共中央及山东分局的通

电》，召开了一系列的干部座谈会和被难烈士家属座谈会，印发了《中共中央暨山东分局为湖西锄奸事件告边区同胞书》、《中共中央暨山东分局致苏鲁豫边区锄奸事件中被难家属书》，着重指出了暗害分子“借刀杀人”的罪行，指出了王凤鸣、白子明的错误及党给他们的处分。宣布除魏定远、曹广善、朱华、朱新民、王天章、单子英、牛藉庵7人为“真托匪”外，其他被捕、被杀者均为好同志，颁布了被难烈士家属抚恤条例，颁发了“湖西锄奸事件”被诬牺牲烈士家属优待证书，对烈士家属进行了抚恤。1941年10月，湖西地委（此时湖西区党委已改为湖西地委）发出了“给县委的指示”。这次处理基本上是正确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恢复了党的威信，挽回了影响。但对一些在严刑逼供下承认自己是“托匪”或咬别人的同志，仍给了过重的处分，许多被冤枉的同志没有充分申述自己的意见，仍然背着不应有的包袱。特别是这次处理了7个“真托匪”，致使事件的性质长期得不到正确的结论。

（四）刘少奇、朱瑞、黄敬等同志对湖西“肃托事件”处理问题所作的指示。

1942年秋，刘少奇回延安路过湖西，郭影秋就“肃托事件”的处理问题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作了重要指示，认为大批受处分的同志是冤屈的，他说：“你们要好好工作，我向中央汇报，一定给你们处理。”^①

1943年11月，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到湖西，在地委会

^① 孔令闻《湖西“肃托事件”始末》。

议上，就“肃托事件”的处理，提出了4条原则：1、强调领导者的责任，应原谅一般同志的政治脆弱与幼稚；2、对任何被累同志的处理都不能高于白子明、王凤鸣；3、一般被累同志，所犯的错误的性质相同，没有原则区别，所以处分不能有大的不同；4、处理党员，对党员来说，比生命还重要，要万分慎重。根据朱瑞的指示，地委又做了一些处理，使一部分同志的处分减轻了，但仍存在一些偏差和遗留问题。

1944年5月，郭影秋代表湖西地委向平原分局（1942年10月湖西已划归冀鲁豫边区）报告了湖西“肃托事件”的经过，并提出了对过去处理的意见。当时的平原分局书记黄敬指出：湖西“肃托”的错误，主要应由白子明、王凤鸣负责，被冤枉的同志被逼承认自己是“托派”并供了别人，当然是错误的，但这与在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的法庭上的“自首”具有不同性质，不能同等对待，应当原谅他们，教育他们。平原分局的这个指示是正确的，但由于地委领导人的认识问题没有解决，这个指示没有得到贯彻落实。

（五）孙志谦出席“七大”会议后回湖西，传达贯彻了中央指示，再次处理“肃托事件”。

1945年底，原苏鲁豫边区党委组织科长孙志谦参加了党的“七大”后回到湖西，向湖西地委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湖西地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单县东部的薛孔楼召开会议，就再次处理湖西“肃托事件”做出决定：

关于事件的责任问题，明确指出应由白子明、王凤鸣

来负。暗害分子王须仁借刀杀人，这个刀，就是白子明、王凤鸣借给他的。

关于被诬陷的同志在严刑逼供下讲了假话、错话，咬了别人的问题，不能视为“变节”、“自首”、“叛变”。

在组织上作了再次处理：

1、决定撤销对郭影秋、郝中士、张子敬、孟静之、郝中牟、罗伯行、苗春亭、齐温如、胡光耀、赵芳洲等人的处分。

2、决定取消对孙鹤一、金彩凡、耿荆山、孟子明、刘秋芳等人的处分。

3、决定停止过去对孙衷文、陈筹、刘剑、李毅等人所给的处分。

上述决定，凡在湖西工作的，立即执行；已调出湖西地区的，向其所在地区提出建议，予以改变。

这次再处理，是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但仍没有解决诸如“真托匪”等遗留问题。

（六）郭影秋同志就湖西“肃托”问题给中央组织部写信，邓小平同志亲自批示作了处理。

1955年，郭秋影同志就湖西“肃托”问题写信给中央组织部，要求正确处理遗留问题。邓小平同志亲自作批示，并责成中组部办理。

邓小平同志的批示指出：中央既已有了明确的决议，就应该说在政治上已经解决了，对历史的责任问题等，就不必再提；要按中央的文件精神处理好这个事件，对7个“真托匪”的问题，要查清情况，做出明确的结论；对事件

中被牵连同志的历史鉴定问题，应按中央精神，不作为历史关节对待；对死难烈士的家属应作好安排。

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次处理的意见没有最后得到很好落实。

(七) 经中共中央同意，中组部批转山东省委报告，使湖西“肃托事件”的遗留问题最后得到妥善解决。

1982年3月，郭影秋、郝中士、陈璞如等9位同志联名写信给山东省委，要求解决湖西“肃托事件”这一重大历史悬案。1983年5月，中共山东省委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对湖西“肃托事件”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1983年12月，经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转发了山东省委报告，湖西“肃托事件”的遗留问题从而得到彻底解决。

中组部批转山东省委的报告明确指出：

1、湖西“肃托事件”的性质，是一起重大的历史冤案，不是扩大化错误，应予彻底平反；

2、原定单子英、牛藉庵、朱华、朱新民、王天章、曹广善、魏定远等7位同志为“真托派”是毫无根据的、完全错误的，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3、对在湖西“肃托事件”中被错杀、错处理尚未平反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昭雪，对受株连尚未纠正的家属、子女，予以彻底平反，消除影响，1941年中央对被难家属已按烈属对待，这些家属以后仍可享受烈属待遇，对受冤枉同志所戴的各种政治帽子和给予处分的，凡未纠正或纠正不彻底的，一律予以彻底纠正，他们档案中如存人有

关“肃托”的结论、处理材料等，应由组织部门清理销毁。

报告还提出：“考虑到湖西‘肃托事件’的当事人和受害者以及受株连的家属、子女现已分散在全国各地，建议中央通知各地，以彻底消除影响。”

至此，湖西“肃托事件”的处理乃告结束。

四、“肃托事件”的危害

1941年，中央在《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中曾经指出：“一九三九年八月湖西地区（山东微山湖以西地区）在所谓肃托斗争中，曾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在暗害分子王须仁的阴谋之下，采取非刑拷打，指名问供，有供即捕等诬陷手段，其结果不仅造成了乱打乱杀的恐怖，而且使湖西地区党、政、军、民的工作，都受到极大的损失。地方党在该地区内辛苦缔造的工作基础悉被摧毁，忠实的党员和群众遭受无辜的牺牲，我党我军的政治威望也受到极大的损害；同时反共分子和日寇则乘机造谣，挑拨我党我军与群众的关系，煽动群众组织杆子会以反对八路军。”

“肃托事件”对我湖西根据地所造成的危害，正如中央决定中所指出的那样，是相当严重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批忠实的干部被捕被杀，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这次事件中，我党政军干部约五六百人被捕受审，大批好干部（其中绝大多数是区级以上的领导骨干、

当地抗日武装的创始人和各级指挥员，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惨遭杀害。《报告》论述：自区党委部长到分区委员，自党内干部到群众团体、动委委员所剩无几。所留者除个别人跑掉或个别叛变投敌外，皆入公开之禁闭室或入集体“监狱”。一些幸存者，在精神上受到消极影响，一时难以恢复元气，致使边区党的各级组织曾一度陷于瘫痪。

（二）我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受到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受到很大挫伤。“肃托”前，是个大好的形势，局面发展很快，我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得到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他们踊跃参军参战，送粮送鞋，慰问部队，边区军民建立了血肉关系。由于“肃托”，乱捕乱杀，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恐怖气氛，较长时间内群众惶惑不解。“肃托”前我党领导的各级群众组织已发展到40万人的队伍，而经过3个月的“肃托”则一无所存。敌人乘机造谣，挑拨离间，一时谣言四起，说什么：“老八路杀新八路”，“外地人杀本地人”，“知识分子杀工农干部”等等。群众对我们存有很大疑虑，畏而远之，有的甚至拒绝我们工作人员进驻，使工作开展非常困难。

（三）党的统战政策被践踏，统战关系遭到破坏。区党委统战部长王文彬被杀害，国民党顽固派以此为口实大肆攻击我党统战政策，一些统战对象发生了动摇。这时国民党正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顽固分子便利用我们在执行统战政策中出现的某些错误（由开始的右转到“肃托”开始后的“左”），极力加以扩大，制造磨擦，致使我党与国

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关系全面破裂。如《报告》指出：“在肃托前，中间力量是团结在我们周围，顽固分子在孤立和灭亡中，友党的力量薄弱，青年到我处者络绎不绝，而三青团则为一空架子。但肃托后，则是中间力量团结在顽固分子的周围，……而同情者或远而敬之，或逐渐顽固，而顽固分子则乘机攻击八路军共产党，使我党在政治上受到空前的打击和损失。”国民党顽固派乘机打击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他们采取种种手段，将我党工作人员从其部队中排挤出来；把一部分中间分子以至原来跟我们走的知识分子，笼络到他们手下；吞并我抗日地盘和武装；他们甚至以帮助共产党“肃托”为名，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1939年11月21日，丰、沛、铜3县顽军在国民党铜山县长耿继勋指挥下，蓄意制造的“千里井惨案”就是突出的事例。

（四）边区丧失了唯一的县级政权——鱼台县抗日政府，政权建设和经济等工作受到严重影响。由于“肃托”，县政府的人员自上而下遭逮捕和杀害，“肃托”一开始县政府即被整垮，后来县长李贞乾被捕，连鱼台流通券也不能通用了，部队的供给问题受到很大影响，相当长时间没有恢复。

（五）我武装力量遭受严重损失，抗日根据地大大缩小。《报告》论述：“在武装上的损失，肃托自开始至终了，继续不断的牵制〔连〕部队中的干部，以至将地方部队的连以上的干部全部肃光了，主力四大队的干部全扣留禁闭了，地方部队今天被人缴枪，明天被人包围，部队陷

人紊乱恐慌状态中。……部队逃亡现象极为普遍，有的跑到友军中去干的，有的回家不出来了。只主力四大队统计，在肃托三个月的过程中逃亡数目字九百余人，平均每日十人。地方武装除仅留被编者以外，全部垮台了。”因此，直接削弱了我反“扫荡”的力量，日军、汉奸乘机加紧对我根据地的“扫荡”，使原来为我控制的一些地区或伪化，或为国民党顽固派所抢占，大大缩小了我活动地区。

（六）杆子会暴动，我工作人员遭杀害。敌伪顽和当地封建势力，利用我在“肃托”中的错误，大肆造谣，煽动落后群众，曾先后数次煽动杆子会暴动，反对我党我军，包围我抗日政府，杀害我工作人员。1939年10月的鱼台杆子会暴动就是一例。

总之，从“肃托事件”结束到1940年上半年的这段时间里，由于“肃托”造成的严重恶果，敌伪顽的破坏和进攻，杆子会暴动等因素，加上我们统战工作上犯有“左”的错误，四面出击，树敌过多，在沛县、丰县先后发生了“六·一三”、“六·一四”事件，^①使我们面临的斗争更加残酷了。到1940年下半年，形成了敌、伪、顽、匪、会联

^① “六·一三”事件指1940年6月13日沛县发生的顽沛县县长冯子固，将我沛五区区长李剑波撤职，并委派反共分子任新区长。我召集1万多群众集会游行示威，向县政府请愿，反对撤李区长，冯子固下令向群众开枪，同时将沛县警卫营包围，屠杀我党政军干部和抗日群众的事件；1940年6月13日丰县顽军将两位有声望的抗战老人王茂龄、张德方逮捕，向我挑衅，14日我黄支在孙庄便宜集将国民党丰县常备队包围，歼其大部（1000余人），时称“六·一四”事件。至此，湖西、苏北两党抗日统一战线完全破裂。

合向我夹击的局面，根据地范围大大缩小，形势愈来愈恶化，进入抗战时期最困难的阶段。为了适应当时对敌斗争的形势，加强我根据地各项恢复工作的领导，1940年底将区党委降格为地委，所辖地区也作了调整。

湖西“肃托事件”虽然已过去50年了，但是其教训是深刻的。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更应汲取其教训，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搞逼、供、信，搞肃反扩大化，应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尽可能多的人们，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而奋斗。

参加调查整理人员：

王传珊、王永仁、李本森、
杨新力（执笔）、张如兴、
张玉德、李启斌、张昶奎、
汤云池。

1927年至1937年间的 中共陕西省委组织概况

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陕西省档案馆

中共陕西省委是1927年7月在原中共陕甘区委的基础上成立的。其活动范围，包括陕西省的全部和宁夏银川、甘肃兰州以东的广大国民党统治区。在陕西省委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遍布全省各地，先后建立过1个市委、13个特委、5个中心县委和40个县（工）委。

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期间，陕西省委曾先后经过8次大破坏和4次小破坏，重建和改组17次，换过14位省委书记。陕西党组织和革命运动处于时起时伏、曲折前进的状态。

陕西省委于1927年7月上旬在西安红埠街正式成立。时值冯玉祥在陕西掀起反共逆流，白色恐怖严重，无法召开党代表大会进行选举，故由中央任命的省委主要领导人和原中共陕甘区委领导成员共同研究，决定由耿炳光等13人组成中共陕西省委员会。为了适应急剧变化的政

治形势，决定：将党的活动方式由半公开转入秘密状态；暂不反冯，停止斗争，保存实力；减少省委与下级党组织的联系，将全省划分为六路，省委委员作为特派员分赴各路指导工作。^①会议还决定，将西安地委改组为市委，将渭南、绥德等地委改为县委。省委成立后，隶属中央直接领导。下辖西安市委和绥德、肤施（延安）、长安、渭南、三原、五一、华县等7个县委，泾阳、岐山、乾县等3个区委，以及兰州、宁夏、平凉、潼关等20个直属特支和支部，共有党员1681名。机关设在西安红埠街9号。

陕西省委成立不到10天，冯玉祥即发表了“清党”反共的3条具体办法，并命令其参谋长石敬亭（兼陕西省府代主席）缉拿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人；取缔陕西省工会、农协、学联、妇联等革命群众团体；在西安遍布密探，追踪行人，检查邮电，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这种形势下，陕西省委派李子洲前往武汉向中央请示对策。此时，正值党的“八七”会议刚刚结束，中央指示陕西省委“要在组织民众的基础上形成反冯势力”。^②李子洲回陕以后，于9月26日夜在西安马神庙街向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会议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陕西的影响，纠正了省委内部

^① 见陕西省委（曾克文）1927年7月11日、8月6日、8月12日给中央的报告。

^② 摘自《中央在听取李子洲1927年8月12日给中央的报告后的指示》。

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提出“党到农村中去”，“党到军队中去”，“武装农民”，“准备总暴动”等口号。会议正式改选了陕西省委，选举耿炳光等6名正式委员和张含辉等2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省委。10月1日，中央决定成立长江局，陕西省委划归长江局领导。12月，长江局撤销，陕西省委又归中央直接领导。

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导下，陕西省委于1927年10月组织和领导了清涧起义，在陕西境内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与此同时，由于各路党组织的积极工作，全省党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28年初，建有党组织的县达44个，县委增加到10个，党员总数由1681人发展到1820人。1927年10月，省委决定成立陕南特委；翌年1月，又决定建立陕北特委，以加强两地党的领导。

1928年1月初，陕西省委连续接到中央两份指示信，信中指示陕西省委：“目前，你们应马上注意到尽可能的发动农民暴动……，直到推翻整个的反动统治，拿到政权”，“省委应特别注意，立即改组各级党部。对于工作不积极，观点不正确的人，要坚决地取消其领导地位，甚至清洗出党”。^①省委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于元月4、5两日，召开第三、第四次全体会议，学习讨论并检查陕西的工作。会议认为，省委书记耿炳光“没有脱离右倾机会主

^① 摘自中共中央1927年11月6日《致陕西省委公函——陕字第7号》。

义的指导”，“对组织农民暴动持消极态度”，提出对耿“执行政治纪律”，决定取消耿炳光省委书记和张含辉省委候补委员职务；由潘自力代理省委书记；并根据中央关于“提拔勇敢的工农同志加入党的指导机关”的指示，增加工农出身的党员王松年、胡宪之为正式委员，张振海、郭世英等为候补委员。

1928年春，陕西省委为了开展游击战争，组织武装暴动，决定将陕东、东府地区划为两个暴动区，并于二三月间先后成立了东府特委和陕东特委。与此同时，陕北特委也于1928年4月新建了榆林、清涧两个县委；关中地区又新建了韩城、蒲城、富平、兴平、户县等县委。全省党员总数发展到近3000名，共青团员也从1927年7月的1924名猛增到3678名。此时，陕西省委认为陕西的革命形势已经“到了直接革命形势之阶段”，“必须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没收土地”，“由局部的暴动汇合而成全省的总暴动，造成陕西割据的局面，直到建立陕西统一的苏维埃政权”。^①于是在四五月间分别组织和领导了渭华起义、旬邑起义和三原、礼泉、泾阳、澄城、淳化、咸长、永寿等县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在革命处于低潮和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下，除澄城起义取得暂时胜利外，其它起义均告失败。

渭华、旬邑等地的武装起义，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1928年5月以后，国民党当局层层设立“清乡团”或“铲共团”，实行“连坐法”和“联保法”，捕杀共产党

^① 摘自1928年2月23日《陕西CP目前工作方针》。

员和革命群众，许多地方党组织被破坏。

1928年7月，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党中央在10月8日写给陕西省委的指示中指出：“过去党的暴动政策犯了极深的盲动倾向，必须严厉纠正”，“六大大会决议案是目前党的一切工作的准绳”。陕西省委接到中央的指示信和“六大”文件后，于1929年1月底在富平县美原小学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进行传达学习，并改选了省委，曹趾仁任书记。会后，团省委书记马云藩等被捕叛变，供出了党、团省委机关。2月6日，党、团省委遭到严重破坏，省委委员大部被捕。到1929年春，陕西省委下辖的党组织，除陕北特委及所属的6个县委外，关中地区只剩下了渭南中心县委和韩城、乾县、蒲城、富平等县委。全省党员从近3000名锐减到1300多名。关中地区只剩下200多名党员。陕西地区的革命形势从此转入低潮。

党、团省委被破坏后，在外县活动幸未被捕的省委委员张国藩、薛永寿在报纸上看到省委机关被破坏的消息后，立即到渭南与王芾南商讨对策。他们决定以省委3委员的名义，召集渭南、蒲城、华县、富平、长安等县的党、团负责人，于1929年3月1日在渭南召开紧急党、团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临时省委和临时团省委。会议选举王芾南等7人为临时省委委员；^①3月23日，又增补杜衡、章子文为委员。会议选派杜衡、王芾南、薛永寿3人

^① 见中共陕西临时省委1929年3月3日给中央的第一号报告。

组成代表团去中央汇报、请示工作。6月22日中央作出《关于陕西问题决议案》，对陕西省委被破坏后，立即成立临时省委表示满意，^①指示陕西省委“缩小机关，常委会只需3人，省委兼市委”等。7月，代表团回到渭南，立即召开临时省委全会，对临时省委又作了调整，选举杜衡为临时省委书记。

1930年2月26日，中央发出第70号通告，提出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和扩大红军等“中心策略”。为贯彻70号通告精神，临时省委于1930年7月1日至9日在蓝田县巩村小学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并决定将临时省委改为正式省委，杜衡任书记。同年10月，陕西省委和陕北特委划归北方局领导。12月，北方局撤销，陕西省委和陕北特委划归河北省委领导。1930年11月，中断1年半活动的陕南特委重新组建起来，并成立了中共宁强县委。

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前后，中央出现了以罗章龙为首的分裂主义集团。与此同时，共青团河北省委以曹策为代表的“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与罗章龙等相呼应，宣布脱离中共中央领导，并派人来陕进行游说。陕西省委内部对罗章龙分裂主义的认识发生了分歧和争论，工作陷于停顿。1931年3月29日至31日，省委在渭南田家村召开第六次全体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会议围绕拥护与反对四中全会展开了激烈

^① 见中央1929年4月16日给陕西省委的指示信。

的斗争，最后决议：拥护党中央关于开除罗章龙党籍的决定；反对罗章龙领导的“非常委员会”和“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分裂党的活动；批判了杜衡在立三路线时期所犯的 error，决定改组省委，由高维翰担任省委书记。5月9日，河北省委应陕西省委的请求，报经中央批准，同意陕西省委由中央直接领导（陕北特委仍由河北省委领导）。^①

1931年7月，中央巡视员刘少文（又名刘国璋）来陕，批评陕西省委从省委第四次全会以后犯了“政治动摇”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于8月初召开省委全会，改组了陕西省委。刘少文认为杜衡“在政治上比较坚定，并有督率一切工作的能力”，决定由杜衡担任省委书记。

1932年夏，中央为了配合江西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的斗争，于6月26日在上海召开了北方工作会议，作出《关于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会议将建立陕甘边区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作为北方党组织的“第一项基本任务”，决定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派孟坚接任省委书记职务。^②。孟于8月份到西安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决定尽快成立陕甘边区特委和渭北特委，并改组了陕西省委，孟坚任书记。从此以后，陕西省委便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派出一批干部分赴陕北、陕南、陕甘边以及甘肃兰州等地，发展党的组织，建

① 见中共河北省委殷鉴 1931年5月9日给中央的报告。

② 见中央 1932年8月1日给陕西省委的指示信。

立工农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

10月，省委派高维翰、汪锋等到三原县，建立了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并先后组建了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第二大队，掀起了抗粮、抗捐、抗税、抗丁的斗争。

1932年12月18日，原省委书记杜衡到达宜君县转角镇，在刘志丹、谢子长等创建的陕甘边游击队的基础上，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正式诞生。1933年3月，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

1932年12月，省委派吴鸿宾、孙作宾、常黎夫等，在兰州建立了甘宁青特委，统一领导甘肃、宁夏、青海3省党的工作。翌年3月，甘宁青特委组建了一支约400人的西北抗日义勇军。

与此同时，陕南特委在红四方面军的帮助下，建立了陕南第一游击大队、川陕边区游击队和红二十九军。

1932年到1933年上半年，关中各县的党组织也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韩城、澄城、三原建立了中心县委；蒲城、户县、华阴、临潼、渭南等县委，重新建立并恢复活动。到1933年7月，陕西省委所辖的党组织有：西安市委、陕甘边特委、陕南特委、甘宁青特委、西路临时特委和三原、韩城、澄城3个中心县委，以及蒲城、渭南、华阴、临潼、户县等直属县委，共有党员1300多名。

1933年1月，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杜衡的错误领导下，在陕甘边区攻打与游击队有统战关系的夏老么民团，红二团损失很大。省委得悉后，写信指示杜衡：将剩余人

员缩编为若干小分队，开展游击活动，逐步恢复红二团。杜衡表示坚决反对，认为这是“取消红二十六军”，“违反中央北方会议精神”，“从机会主义发展到取消主义”，他立即返回西安，提出改组省委。3月23日，在省委会议上，经过激烈争辩，杜衡非但不接受批评，反而占了上风，会议接受了杜衡改组省委的意见，决定由袁岳栋、杜衡、孟坚组成常委会，袁岳栋任书记。^①

1933年7月28日，省委书记袁岳栋、省委委员贾拓夫、杜衡和高岗在西安福盛楼饭馆开会，研究王泰吉骑兵团起义后的有关问题，被国民党特务发觉，袁、杜2人当场被捕，贾、高2人乘机逃脱。袁、杜被捕后，立即叛变革命，供出他们知道的所有组织和党、团员，使全省党、团组织遭到空前严重的大破坏。7月底，党、团省委和西安市委同时被破坏。不久，甘宁青特委、西路临时特委，三原、澄城中心县委和户县、华阴、蒲城、渭南等县委也被破坏。仅在渭北地区，就有5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或被杀。关中幸存的党组织，只剩下韩城、临潼两个县委。陕西地区的革命形势，从此又转入低潮。

1933年8月，前省委委员、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刘映胜，从陕甘边返回西安，联系同志，召开会议，于8月底组建了党和团的临时省委。9月19日，又遭国民党破坏。

1933年9月，从外地回到西安的共产党员孙作宾、

^① 见陕西省委1933年3月23日给中央的报告。

崔廷儒、史唯然、陈子敬等，与前省委发行部长余海丰取得了联系。经过讨论筹备，于10月初再次组建临时省委，余海丰为书记。正在开展工作之际，余海丰又在11月间被捕。临时省委由孙作宾负责，继续坚持斗争。

1933年11月，共青团中央派韩学亚了解陕西党、团组织被破坏的情况，并授命“如有可能，就把各地组织尽快恢复起来”。^①韩回陕后，通过其老同学、共青团三原县委书记魏光波与关中各县党、团负责人取得联系，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渭南县召开党、团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西党、团共同恢复工作委员会，韩学亚任书记。工委成立后，即派魏光波去上海中央局汇报情况，因故未能接上关系。翌年1月，工委委员秦武山、赵应魁等被捕，韩学亚于2月10日赴沪向上海中央局汇报请示工作，上海中央局于2月28日对韩、魏作了具体指示，命韩先回陕西。韩回陕后，慑于白色恐怖，不敢出面活动，工委遂停止活动。

1934年3月，魏光波从沪回陕，与孙作宾接上关系。接着，由孙作宾主持，在西安盐店街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决定将临时省委改为中共西安中心市委，代行省委职权，魏光波任书记。并决定不再恢复团市委，由组织委员严克伦兼管团的工作。同年10月，魏光波、严克伦先后被捕，其他委员分别转移、隐蔽，中心市委遂停止活

^① 见1934年2月28日陕西党、团共同恢复工作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

动。

1935年夏，从外地回到西安的共产党员高克林与在西安的孙作宾、崔廷儒接上关系，3人决定重建临时省委，高克林任书记。同年10月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临时省委先后派谈国帆、崔廷儒、孙作宾等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从此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本届省委在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一直活动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为止。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中共中央及时派出贾拓夫、欧阳钦、张德生等一批领导干部来到西安。12月25日，在中央（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代表团领导成员秦邦宪（博古）、罗瑞卿的参加下，在西安二府街召开会议，由秦邦宪传达党中央关于重建陕西省委的决定及省委的人事安排，贾拓夫任书记。省委机关先设在二府园，后迁到纸坊巷。省委恢复后，立即派出各路巡视员，分赴各县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恢复与发展党的组织。到1937年1月，蒋介石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率军入陕，取代张学良、杨虎城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省委机关迁到泾阳县云阳镇，在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保护下，领导全省国统区党的工作。5月，已有26个县重建了党的组织，全省国统区党员已逾千名。

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期间，陕西省先后有655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壮烈牺牲。还有数百人牺牲时没有留下姓名和籍贯。他们之中，有陕西党组织的创始人李子洲、魏野畴；有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刘志丹、谢子

长、金理科、李妙斋等；有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和旬邑起义的领导人唐澍、吴浩然、白明善、许才升等；还有为革命顽强奋斗，坚毅不屈的李良、焦维炽、陈浅伦、杜润芝等，他们的光辉业绩将永垂青史。

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中共陕西省委的更迭、变化情况和领导人名录如下：

1927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陕西省委，并于5月14日和20日分别指定耿炳光为省委书记，李子洲、黄平万^①为省委委员。由于当时局势恶化，不能召开党代表大会，遂由中央指定的省委负责人于7月上旬在西安开会研究决定由13人组成中共陕西省委员会。

书 记 耿炳光

常 委 耿炳光 李子洲 崔孟博

委 员 （常委均系委员，从略，下同） 魏野畴^②

亢维恪 张金印 张国藩 蒲克敏 陈嘉惠

张秉仁 李子健（李秉乾） 杜 衡（杜振

庭） 何挺杰（何清楷）

组 织 李子洲

宣 传 崔孟博（崔物齐）

农 运 亢维恪（亢心栽）

军 事 魏野畴

① 黄平万回陕传达了中共五大精神之后，即被中央调到外省工作。

② 魏野畴，陕西兴平县人，1928年4月，在领导皖北暴动中牺牲于阜南。

1927年9月26日，省委在西安马神庙街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这次会议，正式选举了省委领导成员。选举结果如下：

书 记 耿炳光
常 委 耿炳光 李子洲 李子健 刘继曾 张金印
委 员 亢维格
候补委员 张含辉^① 潘自力 苏士杰^②
秘书长 刘继曾
组织部长 李子洲（兼军事）
宣传部长 李子健
农民部长 亢维格（1927.8 被捕入狱）
 潘自力（1927.11~1928.1）
军事部长 苏士杰（1927.11~1928.1）

1928年元月4日和5日，省委连续召开第三、第四次全会，会议认为耿炳光^③犯了“右倾”错误，决定“执行政治纪律”，撤销了耿的省委书记职务，改组了省委。

代理书记 潘自力
常 委 潘自力 李子洲 徐梦周 刘继曾 张金
 印 王松年 张振海（1928.2~1928.6）

① 张含辉，又名张松林，兴平县人，1934年5月被国民党杀害于南郑县两河口。

② 苏士杰，谓南市人，1947年被国民党杀害于新疆。

③ 耿炳光，又名耿景山、耿坚白、澄城县人。1928年1月省委分配他任陕南特委书记，因耿不愿去陕南工作，遂离陕去北平。同年9月，被省委开除党籍。

委 员 李子健 亢维恪 胡宪之 苏士杰
 候补委员 张振海 郭世英 李茂森
 秘书长 刘继曾
 组 织 部 徐梦周
 宣 传 部 李子健
 农 民 部 亢维恪
 军 事 部 李子洲
 职工委员会 胡宪之
 交通科主任 景 云 (1928.1~1928.4)

1928年6月13日，省委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全陕暴动计划决议案》并改选了省委领导机构。改选结果如下：^①

书 记 潘自力 (1928.11 被捕)
 李子洲 (代理, 1928.11~1929.1)
 常 委 潘自力 蒲克敏 李子洲 杜 衡 曹趾仁
 委 员 张振海 王松年 张秉仁 刘继曾 徐梦
 周 萧 明
 秘书长 徐梦周
 组 织 部 李子洲
 宣 传 部 蒲克敏
 职工委员

① 本届省委文件，多年查找无着。这里所收录的名单及分工，系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和叛徒杜衡 1933 年在《陕西共党沿革》中所供情况收录的。

杜 衡
会 书 记

交通科主任 陈云樵 (陈冠英, 1928.4~1928.7)

1929年1月底,省委在富平县美原小学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六大”文件,并改选了省委。

书 记 曹趾仁^①

委 员 曹趾仁 李子洲 蒲克敏 徐梦周 马云藩 张国藩 薛永寿 王芾南 (王林)

秘 书 长 徐梦周

组 织 李子洲^②

宣 传 蒲克敏^③

1929年2月6日,陕西省委遭到大破坏,在西安的省委委员均被逮捕。3月1日,在外县工作幸未被捕的张国藩、薛永寿、王芾南以省委3委员的名义,在渭南县固市陈家滩召开党、团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西临时省委。

书 记 杜 衡

常 委 杜 衡 王芾南 张蔚生^④ 薛永寿

候补常委 刘志丹 (1929.7~1929.8)

① 曹趾仁,又名曹志麟,延川县人,1929年2月6日被捕后,已不是党员。

② 李子洲,绥德县人,1929年2月6日被捕,同年6月18日病卒于狱中。

③ 蒲克敏,又名蒲子政,蒲城县人,1939年10月,在宜川县遭日本飞机轰炸而牺牲。

④ 张蔚生,又名张雨森、张生才,西安市人,1930年6月被国民党逮捕,7月6日被杀害。

徐振化 (1929.7~1930.7)
委 员 张国藩 章子文 (张一悟) 李凌云 (李惠民)
吉国桢 (1929.8~1930.7)
闵纪騫^① (负责宣传, 1930.6~1930.7)
梁益堂^② (任秘书长, 1930.6~1930.7)
候补委员 刘树模 张养诚 (1929.8~1930.7)

1930年7月上旬, 省委在蓝田巩村小学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 传达贯彻党中央第70号通告精神, 决定将临时省委改为正式省委。同年10月, 省委全会对委员的分工作了部分调整。

书 记 杜 衡
常 委 杜 衡 吉国桢 王蒂南
高维翰 (1930.10~1931.3)
委 员 焦维炽 陈 征^③ 张文华 陈云樵
候补委员 赵伯平 黄子文
组 织 吉国桢^④ (1930.10~1931.3)
宣 传 王蒂南
军委书记 高维翰

① 闵纪騫, 又名闵醒亚, 渭南市人, 1930年10月以后已不是党员。

② 梁益堂, 别名杨子才, 三原县人, 1935年以后已不是党员。

③ 陈征, 又名陈范, 1933年被捕牺牲。

④ 吉国桢, 又名吉凤州, 华县人, 1932年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 同年8月20日被国民党杀害于开封市。

1931年3月底，省委在渭南田家村召开第六次全会，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批评了杜衡执行立三路线的错误并改组了省委。

书 记 高维翰（兼管宣传）
常 委 高维翰 杜 衡（兼管组织）
委 员 黄 平
秘 书 长 焦维炽^①

1931年8月，中央巡视员刘少文来陕视察工作，批评陕西省委犯了“右倾”、“动摇”错误，再次改组陕西省委。

书 记 杜 衡（兼管组织）
常 委 杜 衡 高维翰 刘万海
委 员 李 良 刘映胜（杨声）
宣 传 李 良（1931.8~1931.9）
雷××（1931.10~1932.8）

军委书记 高维翰
巡 视 员 刘万海

1932年8月初，党中央为了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红二十六军，指定杜衡任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派孟坚来陕担任省委书记，省委遂进行了改组。

书 记 孟 坚（孟用潜、曹长清）
常 委 孟 坚 李 良 王松年

^① 焦维炽，又名焦仲明，子长县人，1932年8月在蒲城县永丰镇领导民团起义时被捕，8月9日惨遭杀害。

委 员 贾拓夫 刘映胜 汪 锋 杜 衡 杨荫川
秘 书 长 杨荫川 (1932.8~1932.12)
组 织 李 良 (1932.8~1932.12)
宣 传 贾拓夫
军委书记 汪 锋

1932年12月，省委成员又作了较大调整：

书 记 孟 坚
常 委 孟 坚 贾拓夫 刘映胜
委 员 杨佑章 李茂堂 (李自靖) 金理科 杜
润芝 杜 衡 袁岳栋
组 织 刘映胜
宣 传 贾拓夫
军委书记 杜润芝
职 运 杨佑章
秘 书 樊德音

1933年3月23日，省委全会接受了杜衡提出的改组省委的错误意见，对省委重新进行改组。这次省委改组后，陕甘边区特委和三原中心县委认为杜衡屡次害怕艰苦，借故不愿到红二十六军工作，坚决反对杜衡留在省委工作；加之孟坚一再要求离开陕西，省委乃于4月9日召开全会，同意孟坚离陕的请求，免去杜衡的省委常委职务，命其立即返回红二十六军工作。

书 记 袁岳栋
常 委 袁岳栋 杜 衡 孟 坚 李世英
委 员 贾拓夫 刘宗沛 刘映胜 金理科 李茂堂

组 织 杜 衡 (1933.3~1933.4)

程建文^① (1933.4~1933.6)

宣 传 贾拓夫

军委书记 李世英

1933年7月底，省委书记袁岳栋、省委委员杜衡被捕叛变，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前省委委员、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刘映胜迅即回到西安，于8月底主持组建了临时省委。

书 记 刘映胜

委 员 刘映胜 李冲霄 张新发 (张鼎安)

雷振东 (雷致远) 樊德音

组 织 李冲霄^②

宣 传 张新发

青 年 雷振东

秘 书 樊德音

1933年9月19日，临时省委在西安大差市东十道巷召开会议，研究如何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问题时，被国民党打进省委机关的坐探告密，全体委员被捕。10月初，由余海丰、孙作宾、崔廷儒等研究决定，再次组建了临时省委。

书 记 余海丰

① 程建文，1933年6月被捕叛变。

② 李冲霄，又名李鼎新，蒲城县人，1933年9月被捕后，已不是党员，1949年参加了绥远起义。

委 员 余海丰 孙作宾 咎玉祥 崔廷儒 胡振家
秘 书 长 崔廷儒 (崔景岳)
组 织 孙作宾
宣 传 咎玉祥①
军 事 胡振家
秘 书 刘惠芳

1933年11月，团中央派韩学亚来陕，了解陕西党、团组织被破坏的情况。韩于11月19日在渭南背坡村召开关中各县党、团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西党、团共同恢复工作委员会。

书 记 韩学亚
委 员 高维翰② 王好勤 赵应魁 刘 庚 魏
光波 樊德音 秦武山 韩学亚
组 织 魏光波
宣 传 樊德音③
武 装 秦武山

1934年3月，陕西党、团共同恢复工作委员会处于瘫痪状态，由孙作宾、魏光波主持，在西安盐店街召开党、团活动分子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安中心市委，代行省委职权。

书 记 魏光波

① 咎玉祥，1934年2月被捕叛变。

② 高维翰，又名李杰夫，长安县人，1934年叛变。

③ 樊德音，又名樊少乙，韩城市人，1933年11月被捕后叛变。

委 员 魏光波 严克伦 崔廷儒 孙作宾 苗建平
严克伦 (组织兼青年)
崔廷儒 (分管军事)
孙作宾 (分管陕南工作)
苗建平 (分管西安工作)

秘 书 刘秀珍

1935年夏，高克林、崔廷儒、孙作宾等，鉴于西安中心市委书记魏光波等1934年11月被捕，其他委员转移外地，中心市委停止活动，各地党组织处于无领导状态。为了持续不断地领导各地党组织进行革命斗争，于8月重新组建了临时省委。

书 记 高克林 (分管西安和东路工作，1935.8
~1936年春)

委 员 高克林 崔廷儒 孙作宾

秘 书 长 崔廷儒 (分管西路工作)

组 织 孙作宾 (分管杨虎城部队中地下党工作)

秘 书 萧佩芳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中央及时派贾拓夫等领导干部来到西安，于12月25日正式恢复了陕西省委。

书 记 贾拓夫 (关烽)

常 委 贾拓夫 欧阳钦 (杨清) 张德生 (心余)

朱理治 李一氓 彭加伦 惠子俊

委 员 李初梨 崔廷儒 危拱之 谢 华 王 俊

秘 书 长 彭加伦 (1936.12~1937年春)

崔廷儒 (1937年春~1937.7)
组织部长 张德生
副部长 谢华 (1937.2~1937.7)
宣传部长 李一氓
青年部长 王俊
妇女部长 危拱之
东北军工 朱理治 (1936.12~1937.3)
委书记
西北军工 欧阳钦
委书记
民运委员 赵伯平
会书记

(执笔: 李 晖)

~~000015~~

002515

B967
2/32

本刊第30辑正误表

页行数	正	误
45页倒7行	转 <u>人</u> 农村	转 <u>人</u> 农村
57页12行	组织上 <u>人</u> 了党	组织上 <u>人</u> 了党
57页13行	<u>人</u> 党	<u>人</u> 党
76页4行	家具用材	家俱用材
77页3行	家具	家俱
134页倒7行	周立 <u>波</u>	周立 <u>皮</u>
136页11行	一帮 <u>娃</u> 娃	一帮 <u>娃</u> 娃
143页12行	《陕公校 <u>歌</u> 》	《陕北校 <u>歌</u> 》
156页倒9行	粉 <u>粹</u>	粉 <u>粹</u>
166页6行	“过了两天，”后应加“到6月2日，”	
166页11行	行首“早晨”前应加“2日”	
171页倒1行	冀鲁豫 <u>军</u> 区	冀鲁 <u>军</u> 区
172页7行	准备向边区发起进攻	向边区发起进攻
180页12行	傅作义集团	傅作义集团 <u>军</u>
180页倒2行	扶 <u>植</u>	伏 <u>植</u>
214页11行	派 <u>人</u>	派 <u>人</u>
218页7行	隐 <u>蔽</u>	荫 <u>蔽</u>
228页倒2行	为 <u>人</u> 民服务	为 <u>人</u> 服务
231页12行	亲 <u>自</u> 实地察看	亲 <u>口</u> 实地察看
240页5行	研究 <u>人</u> 员	研究 <u>员</u>
245页9行	1969年11月被处决	1969年11月被依法处决